神仙湖时光

WINTER 2022

THE FAIRY LAKE

Eureka!

哇！灵感！

2022 年 12 月 第 4 期 总第 8 期
Winter 2022

感谢校长徐扬生教授亲笔题赠书法刊名《神仙湖畔》

主管
Authorities in Char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主办
Sponsor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顾问
Adviser
徐扬生
President Yangsheng Xu
邓康延
Deng Kangyan

出品人
Producer
马明霞
Ma Mingxia

主编
Editor-in-Chief
北海
Beihai

英文编审
English Editor
陈俊豆
Chen Jundou

中文编审
Chinese Editor
李佳阳
Li Jiayang

视觉监督
Visual Design
陈鸣
Chen Ming

排版设计
InDesign
陆艳钰
Lu Yanyu

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Executive Proprieter
金珠淇 Jin Zhuqi

学生主编
Chief Editor
高　逸 Gao Yi
蒲严博 Pu Yanbo
魏　禾 Wei He
匡子娴 Kuang Zixian
董楚珮 Dong Chupei
吴一鸣 Wu Yiming
杜　可 Du Ke

栏目编辑
Editor
李行健 Li Xingjian
周诗璟 Zhou Shijing
张诗悦 Zhang Shiyue
罗雯静 Luo Wenjing
洪悦彰 Hong Yuezhang
季伊忱 Ji Yichen
温诗玥 Wen Shiyue
张艺骅 Zhang Yihua
黄若瑶 Huang Ruoyao
李一扬 Li Yiyang
叶润博 Ye Runbo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李玮颀 Li Weiqi
裴嘉琨 Pei Jiakun
张育玮 Zhang Yuwei
李一扬 Li Yi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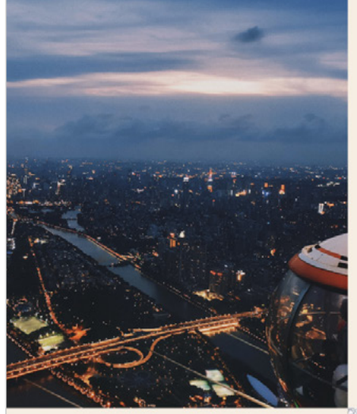
学生记者
Reporter
文玄亦 Wen Xuanyi
臧元仪 Zang Yuanyi
周诗璟 Zhou Shijing
胡曦匀 Hu Xiyun
刘玥彤 Liu Yuetong
王　焰 Wang Yan
戴一诺 Dai Yinuo
王　菁 Wang Jing
丁凯伦 Ding Kailun
林嘉译 Lin Jiayi
周凯怡 Zhou Kaiyi
谭芷韵 Tan Zhiyun
唐诗怡 Tang Shiyi
唐可馨 Tang Kexin
蒋紫涵 Jiang Zi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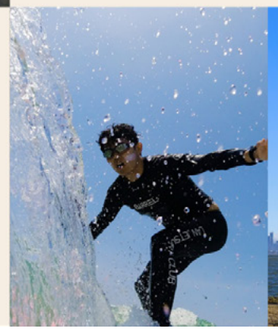
流程编辑
Process Editor
陈　铖 Chen Cheng
余　尔 Yu Er
柯承宇 Ke Chengyu
肖毅然 Xiao Yiran
唐如璟 Tang Ru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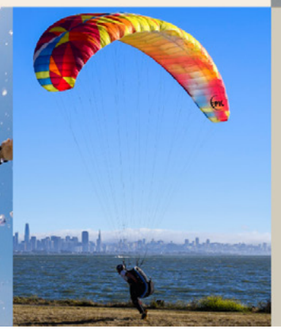
宣传部
Publicity Department
刘广悦 Liu Guangyue
崔　畅 Cui Chang
周语璇 Zhou Yuxuan
高　雅 Gao Ya
张馨元 Zhang Xinyuan

封面绘制
Cover Design
陈彦升 Chen Yansheng

撰稿人
Writer
柯舒麟 Ke Shulin
蔡子玥 Cai Ziyue
贾楚煊 Jia Chuxuan
刘熙越 Liu Xiyue
臧元仪 Zang Yuanyi
马　车 Ma Che
谭钰霖 Tan Yulin
魏子贺 Wei Zihe
王伊依 Wang Yiyi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 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 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 719 室　**Address:** W719,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2022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2 **年** 12 **月深圳第 1 版**
December 2022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215mm × 285mm
Format 215mm × 285mm

CONTENTS

目录

科学说

再探量子世界：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真理？ 08

演 讲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在第七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6

主题报道

Eureka

一、维纳斯的诞生——创作与作品 24

专访当代著名画家郑百重教授：谈艺术创作与中国审美 25

心游于艺，道不远人——专访影像记录者陈彦升 30

作为语言之外的语言，这就是音乐最为奇妙的地方 38

二、缪斯的奇幻漂流——创作与接收 42

追寻时空的回响——在《悠悠岁月》围读会中探讨创作者和接收者 43

与创作的二三事——对话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何薇 46

三、Echo ｜群山回唱——观众与误解 50

掷下音乐的骰子：如何看见音乐的一体多面
—— 专访音乐学院潘行紫旻教授 51

为一个句号争辩不休：驻校艺术家邓康延专访 56

诗社在湖畔：被读的与被误读的 58

人 物

重拾对数学的敬畏——专访理工学院潘兴斌教授 68

寻找书本外更大的世界——专访医学院叶德全教授 76

做一个有温度的向导——专访经管学院杨世杰教授 80

魏祥奇：做艺术的摆渡人——专访“水墨更开新象”策展人 85

创业路上的双生子：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
——专访 APARTSA 学生创业团队 88

i 思 享

刘已达家族史：传统士绅在时代变迁之下的盛与衰 96

跳脱出男性凝视，就摆脱女性困境了吗？
——试析电影《我的姐姐》展现的当代女性境遇 102

校长专栏

冬天的白马湖 110

书 院

我心光明——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院士邓学勤先生 118

湖 畔

书评 ｜从《死亡赋格》说开去：诗歌音乐性的一些想法 124

光影 128

诗歌 ｜唱离散的歌——与 Nicole，浩轩，师兄于大理 142

“幻想”——逆境中的坚强 144

散文 ｜在港中深的这四年 146

A br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ontier of science

科学说

科学前沿　浅显解读

SCIENCE FOCUS

再探量子世界：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真理?

记者、编辑 / 周诗璟
主编 / 高逸

张建辉

张建辉教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2 年），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5 年），慕尼黑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9 年）。 之后，张教授在法国萨克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德国雷根斯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加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于 2020 年起任教授。2022 年，他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副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微扰和非微扰量子色动力学 (QCD)，尤其是强子结构研究及其与电子 - 离子对撞机等高能对撞机上的现象学间的关联。他对发展应用于第一性原理格点 QCD 计算以及对撞机现象学的新方法也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张建辉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陈鸣 / 摄

2022 年 10 月 4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2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John F. Clauser）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蔡林格（Anton Zeilinger），以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实验、验证违反贝尔不等式和开创量子信息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今年的物理诺奖，使得“量子力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曾是大众眼中对于一切“不确定性”的代指，是理论物理深奥的象征。

如今的量子物理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它同我们对“量子力学”的常见认知有怎样的差别？本期“科学说”栏目，我们邀请到了理工学院的张建辉教授，聊聊他眼中的量子物理，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玄妙的量子现象。

以下为张教授接受采访的语录整理。

一、证实理论的艰难道路

在开始讨论量子物理相关的事情之前，我想先来说说物理这门学科的特点。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原则上，所有的理论模型和预言一定都要通过实验来验证。如果验证不了，即使这些理论在数学上是自洽的，它们也不能够正确地描述自然界中存在的真实物理现象。

以我所在的研究领域为例。整体来说，我所在的领域集中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世界上大部分物质由原子构成，而原子又由为电子、质子和中子。研究表明，质子和中子还可以进一步拆分为夸克和胶子，它们通过某种相互作用被束缚在一起。夸克和胶子相互作用的理论，同样也需要实验去验证，而这个验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非常长的。我所做的研究方向，即量子色动力学，正是描述这样相互作用的理论。从最开始夸克模型的提出，到后来的规范场理论，包括实验的验证，这个过程同样也有几十年的时间。

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从理论提出到实验验证，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比如“上帝粒子”，即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这种粒子通过希格斯场的作用，为所有其他的基本粒子产生质量。这个粒子的提出大概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但是真正的发现是在 2012 年。这中间也经历了大概半个世纪。引力波的证实时间则更长，大概经历了一个世纪，因为相关的实验设计非常难。

实证的难度，和实验技术革新的周期有关系。举个例子，现代物理常用的检测手段为“粒子对撞机”，它的原理和电子显微镜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粒子本身的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快，其物质波波长也会越小，能够分辨的空间尺度也越精细。因此，想要探测更小时空尺度的物理现象，就像探针一样，必须要找高速的粒子进行对撞。但是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时，人们在技术上才能实现高速的粒子束，开始真正研究质子内部的结构分布。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不同的探测粒子内部结构的方法了，比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它便是以非常高的能量，加速两束质子束，让它们对撞，然后检测对撞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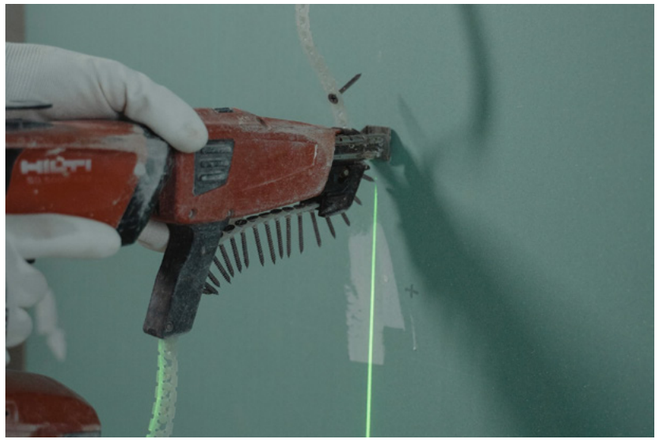
按照我们对物理学的认知来看，物理研究中实验验证是必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理论的发展进程远远超出了实验验证的发展进程，所以，我们很难通过实验来验证现在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实际上，我们希望实验方面能有新的发现和观测结果，既是检验理论模型的真伪，也能为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比如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在这个理论提出的第二年，杨振宁先生便去做了相关实验，证实了宇称确实是被破坏了；这一重大发现让他们在下一年就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仅仅是特例，通常情况下，从理论提出到实验验证，还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不光是实验，物理理论同样也大幅度超越了工业应用。比如激光——它是量子力学中一个实际应用的领域。从爱因斯坦最开始提出受激辐射的理论，到大家真正把激光器做出来，实际上也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那有没有反过来的情况？比如说，实验先观测到一些东西，然后再从理论上去解释呢？也是有的，比如量子力学理论的起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量子力学的具体讨论，它的起源就是“黑体辐射”这个实验现象。在经典力学的框架里，黑体电磁波的辐射分布无法得到解释——你可以解释一部分区域，比如高频区和低频区，但是很难对整个频谱有一个统一的解释。这也是马克斯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的动机：当他假设辐射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而非连续能量时，他能够解释辐射分布。

而量子纠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玻姆的“局域隐变量”理论。那时的量子力学引入了“概率诠释”，这意味着很多物理现象本质上是不能被预测的。“局域隐变量”理论就是为了反驳概率诠释，说明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而后来的“贝尔不等式”则指明了如何用实验证实“局域隐变量”理论。

正如我刚刚所讲的物理学实证研究的艰难历程一样，物理学家在做这个验证“局域隐变量”理论的实验时会有很多漏洞，需要不断地修补。这也是为什么相关的实验，从 1964 年贝尔提出这个不等式开始，一直做到了 21 世纪。最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是约翰·克劳泽，他通过证伪“贝尔不等式”，说明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而阿兰·阿斯佩与安东·蔡林格则发现了他实验中的漏洞，并作了相应的填补。一直到 2017 年时，蔡林格的工作基本上补全了所有的实验漏洞，人们也可以由此断定量子力学的完备性。



二、前沿量子物理的理论与方法

量子色动力学

我接下来拓展一下讨论的纵深。一般来说，我们使用的物理理论要考虑实验对象的适用范围。不同的对象和尺度会有不同的理论。原则上来说，物理的终极目标是要找到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来解释所有尺度的对象及它们身上的物理现象，然后在这些基本理论上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理论，来描述超出这个基本尺度上的物理现象。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当我们开始拓展研究的边界，我们经常会发现已有的理论不再适用，只能创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它，我用以下的物理学发展思路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日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都是宏观的物体，它们的运动速度也不是很快；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用牛顿力学就足够解释它们身上的物理现象了。当我们将这些物体加速到非常快的时候，比如说接近光速时，你就会发现牛顿力学不够用了，或者说实验看到的现象和你的预测已经不太相符了，这时我们就要用到相对论的理论来解释它们身上的物理现象。

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我们去研究物质微观结构的时候。在非常小的空间尺度里，物体的运动现象也不满足牛顿力学定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如果观测方式造成的扰动非常小，那么我们只需使用非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

但事实是，想要看到越小的结构，我们所需要的粒子束的能量就越高。达到一定程度时，相对论效应又出现了：它告诉我们，能量和质量可以相互转换。所以粒子束撞击之后，往往会产生新的物质粒子。也就是说，当空间尺度非常小，运动速度非常高时，量子力学也不够用了，此时已经需要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结合起来，这个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的理论叫做“量子场论”。“量子色动力学”是量子场论的一种，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场论，比如描述电磁相互作用的“量子电动力学”。

展开讲“量子色动力学”就必须先解释下强相互作用，它是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最强的一种。最早研究的强相互作用是核子（质子或中子）之间的核力，它是使核子结合成原子核的相互作用。自 1947 年发现与核子作用的 π 介子以后，实验中陆续发现了几百种有强相互作用的粒子，这些粒子统称为强子。在强相互作用中也带一种荷，它同电荷不太一样，但是有相似的性质，物理学家把这种荷叫做“色荷”。描述这种带色荷的粒子的作用的量子场论，便叫做“量子色动力学”。

“量子的色动力学”和“电动力学”之间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色动力学中的“渐进自由”。它的意思是，在质子中，夸克和胶子的相互作用很强。在用能量非常高的粒子束去攻击它时，检测到的有效相互作用是弱的。而解释这种弱相互作用，我们有一套很好的理论工具，低能量时的强相互作用则不太好解释。他们的研究说明，色动力学和电动力学存在一些本质的差别，这些差别在我们研究对撞机和高能物理的现象上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象学

有时候理论预测和实验观测会有差别，而这差别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理论不完备，也有可能是实验出现了问题。很多现象学的理论家就是在此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去解释当前理论预测和实验现象的差距。

比如实验上看到数据上有一个异常凸起，这就意味着现有的理论和实验对不上。有可能是理论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实验的统计误差，因为实验上也要有足够多的统计量，才能说明测出的结果是否真是如此，比如统计涨落效应，最后数据量多了之后一平均，凸起消失掉了。如果真的有那个凸包，就需要理论家打造新的理论模型去解释它。

现象学和实验的联系非常紧密。一方面，要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做尽量精确的预测；另一方面，要验证现有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正确的理论。还有一点，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可能存在的新的物理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想知道新的物理现象，就一定要把旧的理论预测中的物理现象描述得非常准确，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找可能存

在的偏差——新的物理都在偏差的现象里。

可以用很多的模型去解释这个误差，但是适用的模型有一个通用的准则——首先这个模型能解释旧的理论描述的所有物理现象，然后它能够预测旧的理论不能预测的现象。理论模型与实验的动态关系在于：在多次实验后，如果那个误差消失了，那么之前做的模型很多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误差还在，那么我可以在现有的模型里做一个筛选，也许有些理论对这个现象可以描述，而在数据越来越多时，就可以筛选出越好的理论。

三、理论物理的发展展望

学科交叉

我想谈谈交叉学科。我目前所在的研究领域已经是一个非常特定和专攻的领域了，但是，当我们的研究走向纵深遇到一些瓶颈与困难的时候，交叉学科的作用就会被体现出来了——来自另一个学科的人所能提供的知识与见解可能恰恰会成为解答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甚至可能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这对任何研究领域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想举一些具体例子。譬如，现在的深度学习便在物理中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现在的物理研究，想要通过实验数据来间接刻画特定的物理现象是比较困难的；并且，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实验操作的难度也越大，很难收集海量的实验数据。深度学习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训练，做出部分预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应的现象。

除了和深度学习技术的结合，物理也可以和化学、通信这样的具体学科有交叉。比如化学中“量子化学”的分支，正是物理和化学的结合。而“量子通信”这个分支，则在原有物理理论基

础上，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通信加密算法。类似的学科交叉都会产生许多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学科交叉也并非易事。这需要一个学者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储备。而当今，许多学科都由“拓疆”变为了“深耕”，一个学者很难同时精通几个不同的方向。所以，现在我们的学科交叉，更多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交流解决问题的思路；因为，尽管研究的问题不同，但是这些问题的本质有相似之处。有时将其他领域的方法运用到本领域的研究中，可以产生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

诠释问题

接下来，我想再谈谈物理的诠释问题。它指的是，对于同一个物理现象，物理学家可以用几种完全不同的模型进行解释；但只要这些模型都能够对物理现象作出正确预测，那么我们便允许这种解释上的差异性。

我们大众津津乐道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正是来源于薛定谔对“哥本哈根诠释”的反驳。“哥本哈根诠释”认为，所有的量子运动都无法被精确预测，只能通过“波函数”来描述它的概率分布，而人们对于量子的观测则会导致“波函数坍塌”。在“波函数坍塌”之前，量子会处于不确定的叠加态。以“薛定谔的猫”为例：在这个思想实验中，我们用一个密闭的盒子，将一只猫和一个量子装在一起，并通过某种方式，让量子的状态决定猫的生死。那么按照“哥本哈根诠释”，当我们不打开盒子观测时，盒子中的猫将会处于“既生又死”的叠加态。

事实上，“哥本哈根诠释”并不是量子力学的唯一诠释。“多世界诠释”与之不同，认为世界上存在无数个平行宇宙，而“量子的观测”不会导致“波函数坍塌”，而是让观测者进入其中一个平行宇宙。仍然以“薛定谔的猫”为例：在打开盒子之前，世界上存在着“猫生”和“猫死”两个平行宇宙；当我们打开盒子时，我们会随机地进入其中一个分支。这两个平行宇宙同时存在，只是不能相互交换信息。

不过，从预言的角度而言，选择哪一种诠释，对于实际结果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不同的物理学家有不同的世界观，在诠释的选择上会有自己的倾向。只要能作出正确的预言，诠释的选择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物理发展的动力

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诠释问题，我们研究物理的唯一准则，是理论要与实验结果相匹配。在此之上，物理理论的发展可以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时一个人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不过，无论多么个性的理论，只要能够经受实验的检验，便都可以被物理学界接受；而物理学也正是在这样个性的发展中不断进步的。

物理学家发展一个理论，往往会有不同的动机。在现在理论超前实验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考虑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发展出新的理论。比如，杨振宁先生就更加关注物理理论是否具有结构上的美感，而他发展出来的“杨－米尔斯理论”则是一个结构美的典范。“弦理论”则试图以更加抽象的模型，成为现代物理的大一统理论。不过，相较于“杨－米尔斯理论”，“弦理论”基本上不可能以现阶段的技术进行实验验证。

但是，无论如何，物理理论只有经历了实验的验证，才能真正展现出它的意义。让我们回到“贝尔不等式”。在“贝尔不等式”被证伪之前，人们对于“量子力学”的争论更像是哲学争论。有一派物理学家不认可量子力学的“概率诠释”，仍然相信世界遵从“决定论”，即可以通过充分的测量与计算，精确预言世界万物的发展。然而，“贝尔不等式”的证伪，证实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这个世界，从本质上便是随机、不可预测的。这个事实也可以被视为物理学一次非常深刻的科学革命。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ideas

演　讲

分享观点　碰撞思想

SPEECHES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在第七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12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第七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于 11 月 26 日上午在中央大道隆重举行。远在海外的 201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通过视频送上给毕业生的祝贺和寄语。科比尔卡教授分享了他的科研生涯经历，同时希望同学们能认识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的诸多挑战，希望毕业生中能有人勇挑重担，投身于解决贫困、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事业。

Dear President XU, Dean Cheng and graduat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It is my pleasure to address this graduation ceremony. Your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your future. While I don't have any words of wisdom that will guarantee success going forward, I can tell you what worked for me.

I'm here because I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is a recognition that I have achieved a measure of success in doing what I love. It's very gratifying knowing that my colleagues appreciated my work enough to lobby on my behalf. However, I don't consider myself to be exceptional in any way.

I believe my career to date is an example of how an average individual can achieve a measure of success by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at include hard work, resistance, an element of luck, and a great deal of help from famil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hen I look back at my career, I'm amazed at how often I've been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people. I've thought about my career and tried to find some message for today's graduates. I believe four factors have played a role in my career. First, I found my passion, something I loved to do and a challenging goal that I wanted to pursue. Second, I was able to find role models and mentors who provided guidan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my career. Third, I recognized m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 found ways to leverage my strengths and accommodate for my weaknesses. Fourth, I had balance in my life. That is a fulfilling family life outside of my academic career.

My first role model was my father. Growing up in Little Falls, Minnesota, a town of about 7,000, I had a pretty unremarkable childhood. My parents were loving and supportive. Neither of my parents had a university education. My father owned a small bakery. My mother was a housewife and worked part-time at the bakery as a cake decorator. I don't remember any pressure from either of my parents for me to do well academically or to enter any particular profession. I consider this one of their most important gifts to me. They gave me a blank canvas to paint my own picture at my own pace. As I've grown older, I realized how much of an impact my father has had in my life. I admired his work ethic, his skills in dealing with people, his sense of humor and his devotion to his family.

His bakery was a relatively complex small business that operated 24 hours a day, six days a week. It prospered by producing large variety of excellent baked goods. To make all of this work, my father had to be able to do every job in the bakery because when someone called in sick, he had to be able to fill in day or night. He did everything from baking bread to managing accounting and payroll to running the dishwasher if necessary. I believe his success was due to his versatility, his work ethic, good humor, and the ability to motivate people to do their best. I've tried to emulate his approach to business in managing my research group.

I decided I wanted to become a doctor at a very early age. I saw that my small rural community held physicians in the highest regard. They were well educated and were able to help the sick, elderly and weak in ways that no one else could. I particularly admired my pediatrician. This interest in medicine led to an interest in science in general. I entered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uluth in the fall of 1973 to study biology and chemistry in preparation for medical school.

During my first quarter, I encountered my second most influential role model, my professor of biology Conrad Firling. Professor Firling encouraged undergraduates to get involved in research and welcomed me into his lab to work on projects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While he had little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had to spend most of his time teaching, he was passionate about research and very creative in his choice of projects and the use of his limited resources. I soon found that I really enjoyed the challenge of working out relatively simple technical problems and generating data.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topic wasn't completely satisfying because it was primarily descriptive. I enjoyed the process but hadn't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the particular question being addressed.

In spite of my new found interest in basic research, I applied to medical schools as well as a few graduate programs. I still envisioned a career as a physician and the graduate programs were a backup option if I didn't get into medical school.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I received an acceptance from Yale. At Yale, all medical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write a thesis based on original research. For my thesis project, I studi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Rotaviruses, a common cause of gastroenteritis in children. Again, the project was largely descriptive and not very fulfilling. However, being at Yale I was exposed to research from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cientists from a broad range of disciplines. I began to see that if I could devote enough time to research, I could try to answer important biological questions at a mechanistic level and in molecular detail.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I decided I wanted to explore research as a career. However, this opportunity would have to wait. During my clinical training at Barnes Hospital, I becam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Patients admitted to one of the intensive care units were typically very unstable, requiring urgent intervention, often with medications acting on several different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a special class of proteins that would ultimately become the focus of my research career. Drugs acting on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were used to control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and relieve pain.

My interest in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led me to apply to cardiology fellowships. I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a program at Duke University, which allowed fellows to work for several years in a basic research lab before completing their clinical training. Moreover the laboratory of Robert Lefkowitz at Duke, with whom I would ultimately share the Nobel Prize, was doing pioneering research on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that responded to adrenaline. This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basic research in an area relevant to cardiovascular and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My first few weeks in the Lefkowitz lab were a bit awkward and hard on my self-esteem. I went from being an experienced and competent physician to a novice among a group of very talented and experienced young scientists. The Lefkowitz lab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my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the Lefkowitz style of mentoring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Conrad Firlings. There were over 20 postdoctoral fellows and a few graduate students. The lab was very well funded.

During the first months in the lab while learning basic techniques, I became aware of the effort to clone the gene for the Beta-2 adrenergic receptor. This was exactly the kind of project that I was looking for. It was a chance to isolate the gene for one of the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 had been targeting in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t was a chance to begin to learn how one of these proteins worked at the molecular level.
For the next two years I struggled to learn molecular biology and all of my efforts to isolate the gene failed. While Professor Lefkowitz was not experienced in molecular biology and couldn't help me with experimental details, he was a great motivator and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he believed I would succeed. He taught me that it was okay to try and fail as long as I learned something in the process.

We finally succeeded in isolating the gene for the beta-2 receptor in 1986. This was a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that gave us the first piece of the puzzle that would ultimately reveal how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work.

I knew at the time I wanted to see the whole picture, how all of the proteins fit together in molecular detail. In 1986, I found my passion and began pursuing the goal that would form the basis for my research for the next 36 years.

In 1990, I started my lab at Stanford and continued to work on this very challenging project. 17 years later in 2007, my lab obtained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beta-2 adrenergic receptor, providing another important piece of the puzzle. In 2011, we were able to complete the puzzle with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beta-2 receptor activating its cytoplasmic signaling partner. I owe thes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to the hard work of many talented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s and collabor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 have benefited from mentorship, advice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colleagues from a broad spectrum of disciplines. I have been particularly privileged that my wife Tong Sun has worked with me in the lab on and off for more than 30 years, providing technical,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My career in research has been very rewarding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discovering new knowledge, working with many brilliant and often intimidating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s, developing friendships with scient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having the flexibility to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While my career path led to basic biomedical research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s may lead to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The world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evolution of viruses that may spark the next global pandemic. Wa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at don't appear to have an end in sight. The threat of nuclear confrontation with North Korea and Russia. Poverty...Nearly 800 million people don't have enough to eat or medicines for treatable diseases. An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climate change. This is perhaps our greatest challenge. While we may end wars, prevent a nuclear confrontation and reduce world poverty, climate change may be irreversible. My generation has ignored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leaving the problem to your generati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ill require concerted effort from creative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scientists, engineers, educators, and politicians. I hope that some of you will consider careers that will help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n closing, I wish you success in whatever career path you choose.

主题报道

聚焦青年话题 洞察青年思想

FEATURES

Eureka![1]

Eureka 原是希腊语，从 16 世纪以来，eureka 在英语及其他一些语言里一直被用作因重大发现而发出的惊叹语。始用于 19 世纪的 heuristic 一词亦源于此，它被赋予“启发（式）的”一义与 eureka 的来历恐怕是不无联系的。

人们进行艺术创作时，常常会进入一种超脱状态——或浅或深，或迷醉或清醒。许多名家熔铸冗长光阴于一作，寻门而入后总破门而出，破后而立，与灵感对谈，艺术的灵魂自此鲜活。关上门，他们进入了自己的世界；打开门，维纳斯从贝壳与圣洁的泡沫中沐浴新风而生。门内门外，倏忽迥异。门内人为门外人提供了无数思绪飞扬、灵魂震颤的作品，让他们得以抒发原不知如何安放、也不知是否有人理解的心绪。但同时，艺术创作的接受者也在给予创作者及其作品无数次仿佛平行世界的新生命。创作前灵感的迸发，创作过程中的技巧与感情，以及对艺术作品本身之定位，都是从 Eureka 扩展出的话题，至于作品本身之于创作者与接收者分别的意义是有关创作者与接受者作为独立个体时要探讨的话题。若论及二者之链接，则又有无尽的话题……本次主题报道将从“创作”这一行为着手，通过展现创作者、作品与接收者三者之间的联系来对创作过程中诸如“灵感”“创造力”“共鸣”“误读”等有趣的议题进行讨论。

在作品中，我拥有了一百次生命；放逐作品于人群，我是否也在放逐自己？而人们是否将我寻回，或只让我循着自由的洋流，而他们负责追逐下一颗晨星？

[1]Eureka 手写体为栏目主编魏禾书写。

01 维纳斯的诞生

Chapter

——创作与作品

当我们在谈创作时，我们要谈些什么？当我们称赞一份创作精妙绝伦之时，我们称赞的又是什么？是创作者之技艺精湛，是灵感灵气贯穿翻涌，抑或是立意内涵之深远？或许答案因时空而异，或许之三者往往紧密相连，难舍难分。本篇目主要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四位创作者分享其故事，来明晰在艺术创作中的种种议题，如面对灵感的态度，创作者与作品之关联，创作者与接受者之照应……作为作品之孕育者，作为那个最原初的“哈姆雷特”，他们对创作又有怎样的理解呢？

专访当代著名画家郑百重教授：谈艺术创作与中国审美

记者 / 胡曦匀
主编 / 蒲严博

郑百重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陈鸣 / 摄

郑百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教授、著名画家、当代青绿山水画代表人物、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现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福建省画院名誉院长，于本校开设课程中国书画研习、艺术概论及中国书画。郑教授少年起随名家陈子奋先生、陆俨少先生学画，常年在国内各地以及亚洲美洲欧洲写生，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六十多回个人画展，作品曾获全国工艺美展优秀奖（1977 年北京）、全国卫生美术摄影作品展优秀奖（1983. 北京）、美国爱荷华州荣誉市民（1988. 美国）、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展金牌奖（1988. 香港）、第十六回日本画展获众议院奖（1991. 东京）、第三回国际艺术家招待展获艺术院奖（1993. 东京）、美国加州众议院艺术成就奖（2001. 美国）、加州议会教育成果奖（2001. 美国）、美国加州奥斯陆市金钥匙奖（2002. 美国）等。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中国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大会堂、美国国家博物馆、卡内基博物馆、通用公司美术馆等重要艺术机构收藏。已出版有《中国美术史略》、《山水画大讲坛》、《郑百重画册》、《百重山水》、《百重世界》、《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郑百重》等专著二十多种

热爱生活、写生复写意

多年在国内外各地写生，他说：每个地方都可以使你感动，最重要的是不能走马看花，你一定要住下来，深入生活的点滴平凡之处，才能有所发现。他描述自己的旅程，“不管是十七哩海滩，夏威夷群岛，还是在威尼斯的小弄堂，每一地方它都使你感动得不得了”。郑教授讲述了他在意大利旅居期间与历史古迹的一次奇遇：当时他在威尼斯的小巷信步游览，在一条寻常的小小的弄堂发现了一个小门，门口有

一则中文广告：“这里是但丁和他的情人初会的地方”。“哇，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条很不起眼的、很小的弄堂，走进去，原来是但丁和他的初恋相聚的那个小教堂——这真使你感动，这才是文化底蕴。”感动藏在寻常的地方，等待着被人发现，“更不用说意大利的大教堂、圣马可广场，那些是做了世界宣传的名闻天下。这条巷子可是一点广告都没有，居然是世界上如此伟大的人物——但丁，与初恋相会的地方。在这里，墙上还有他当年写的诗歌。”这些感动最终会反过来滋润创作丰富你的种种联想：“正因如此，写生的过程不光是描绘记录，更多的应该是感动。在以后的创作中，这些东西会跟潮水一样涌上来感动你。”

青绿山水的生命力

“我是一个中国画家，擅长山水花鸟画、兼工书法篆刻，近 20 年来，重点在“青绿山水”的创作中。”郑百重教授在介绍自己的绘画时说道。“实际上，‘青绿山水’是中国从隋唐开始就有的一种很古老的艺术，到唐宋的时候达到高峰，明清以后渐渐地有点式微。这个过程跟中国艺术美学审美观念的转化有一定的关系。元明以后，中国艺术的审美以水墨至上，青绿山水不再是主流。20 世纪以后，中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现代资讯科技的不断丰富，图像技术的发展、摄影科技的进步，网络世界的开启，交流愈发广泛。加之改革开放，中国的形势、经济大发展，国家强盛，这一切都呼唤着青绿山水——‘盛世青绿’，青绿山水的创作也因此蓬勃发展起来。”这 20 年的过程中，承上启下，他走遍了各地的大山大水，并且对当代青绿山水开拓性的梳理。

青绿山水画是什么？青绿山水画何以在中国画中占据独特的位置？“青绿山水，就是中国山水画，只不过它是中国山水画中比较注重彩运用的一种，”郑百重教授介绍道，“它是从唐朝开始的，‘青’是青天，‘绿’是绿地，‘青天绿地’是永恒的生命色彩。”青绿山水所用的矿物性颜料，有石青、石绿、朱磾、青金，还有朱砂、赭石鹅黄等等，甚至还有黄金，原料本身永不变色，色彩绚丽厚实，整个画面传达灿烂的景象。”既然颜料的种类繁多，“青绿”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性十分突出，典雅辉煌富丽盛世气概，：“严格地讲，青绿山水是存在的，但是真实的青绿山水跟画面‘青山绿水’的色彩应用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色彩，而不是物体固有的色彩。是按照画家主观意愿和时代递进的随类赋彩，中国人认为，‘青’是东方，是早上，是少年，太阳早上从东边升起的时候是青天一片。古代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太子住东宫”。而‘绿’地是万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母体，所以这是一种生命兴起的颜色，青绿山水代表了这种生命力，因此用青绿山水去表现中国的大好河山，传达中国人的生活理想。

画作局部。

中国艺术的特点

跟西方艺术相对比，郑百重教授深入浅出地辨析了中国艺术的四个特点：象征性、线条造型、色彩主观性、传神。第一，在创作之始，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在作品上寄予的价值观念和取向是不同的。中国人的艺术是象征性的。中国人不是从描写开始，而是从理想开始。从意境开始任何事物，包括最早的《山海经》、《水经注》，都充满了中国人的理想寄托，把这些理想幻化成艺术作品，是中国艺术的第一大特点。”第二，在创作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中国艺术采用的方式跟西方艺术不一样。西方艺术分析块面，把一个物体分成‘三大面、五调子’，描写得很真实。中国艺术采用线条造型，这可以说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不管是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甚至工艺，它都是以线条表现为基础的。突出典型性。第三，中国艺术对于色彩的理解和运用有独特的哲学。中国人的色彩是主观性的。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把‘东西南北中’分成五行，五行配五色：东方是青色；西方属金，是白色；北方属水，是黑色；南方是火，是红色；中国是土地的国家，中国人住在中间，是‘中土’，黄色。中国画里颜色的运用跟大自然的太阳色谱‘赤橙黄绿青蓝紫’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认为有光、有太阳才有颜色，太阳下山了，就没有颜色了；但中国人不一样，随类赋彩中国用黑色，中国的墨，是‘黑团团里天地宽’。中国的墨分五彩，这是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画和中国书法里重要的一个色彩观念。第四，中国画传神需要表达画家个人的精神，也要表达自然景象人物对象的精神。“中国艺术要传神。从六朝开始，艺术作品要求既传艺术家的精神，也传对描写物象的精神，作品要气韵生动。换言之，我们画山、画水，要画山和水的精神。还要求画外有意境。同样的太行山，可能一百个画家画得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心中的山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画家对待艺术创造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土地的眷恋。中国是农民的国家，人们几千年来安于土地，生于土地、葬于土地的。中国风水说山、水、土地跟人的生命是紧密结合的，甚至跟你的子孙后代是紧密结合的。”

与画结缘

郑百重教授做过工人，也曾上山下乡做农民，担任过玉雕厂设计师、做过寿山石工，四十岁才任专业画家。而后在海内外各地讲学、写生、办展。在孩童时期，学画纯粹是一种爱好：“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生在乡村，山水树木、花鸟虫鱼都画材。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小学的老师，他的教育理念就是孩子要读书，要写字，画画被认为是小孩子玩的东西，不是正门学问。十几岁才开始跟陈子奋老师学画，写字，陈子奋先生以篆刻和国画闻名天下。徐悲鸿赞其技艺“雄奇遒劲，腕力横绝，盱衡此世，罕得其匹也”。道：“他所擅长的白描就是用纯粹的线条来描绘万物，他在中国画坛称为‘白描祭酒’。除了对白描的擅长和各种成就之外，他还非常注重学生以文史诗和画论上的教育。一边学画、写字，一边要学历史、诗歌、文学，学绘画理论换言之，未学画先学看画。严格地说，我们的美术史专业，包括美术史论，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还是比较薄弱。二十世纪初虽然有研究者，如：陈师曾先生、黄宾虹先生、潘天寿先生、延安的胡蛮先生、南京的俞剑华先生，做美术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人数还比较少的美术院校开的课程只重技巧不重文化课。陈先生的教育是文化和技法并重。我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基础，就是得益于先生当年的教学方法，让我在几十年间除了创作不断之外，也坚持着文史论的学习。学画伊始，陈先生就要求先找一份工作，不要做画家，靠卖画为生，会影响创作方向。画画是神圣的理想追求，有安定的生活，才能坚持自己的追求。

虽然学画的兴趣在孩童时期萌芽，从把绘画艺术当作为终身的职业经历了很多，他的职业生涯和国家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政策同步的。“我到了 40 岁，改革开放才被国家聘请到专业的画院任专职画师。开始走上了专业画家的道路。”此后，郑百重教授去往海外游学，后又回国发展：“我从 1987 年开始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讲中国美术史；1995 年住在洛杉矶，在加州的索诺玛州立大学洛杉矶大学讲美术史；后来到台湾辅仁大学讲书法。21 世纪初，回国以后，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员，

在闽江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讲了十几年的课，五年前徐校长请我来担任这里的荣誉教授。“80 年代，在画院做专业画家以后，我到中国美术学院（原名浙江美术学院）讲课做展览，在那里，我认识了陆俨少先生，拜到门下陆先生是我第二个重要的老师。”“陈先生和陆老师带给我的营养各有不同。陆俨少先生给我带来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书法与绘画的关系。他强调书法与绘画是一条路，因为中国书画同源从张彦远提出以后，直至近代”。书法是什么？绝不仅仅是写字、练线条而已，对书法的理解和书法艺术本身的含义是不可缺少的，中国文字最早是象形文字，所以一开始图画与文字是并列的，创作方向是一致的”“陆老对书法与绘画关系的重视，带给我艺术创作上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小时候陈先生教我写字，写的是小篆、汉隶、北碑，是壮丽浑朴的，陆老他教我写字，是从新认识王羲之，和二王流派。篆隶着力於线条、结体构成，二王着力於神韵，在是创作中平淡自然；二者是整个躯体的两臂，不可或缺。陈先生画画，着力在精微中，呈现文人的唯美形式，陆先生画画，着力在笔墨变化。传达山川宏大气势。虽然他们的画跟我的画一点都不一样，陆老主要画水墨山水，陈先生重点在线描，我重点画青绿山水，看上去是不一样，但仔细去研究陈先生侧重明清画家诗文，启示创作方法，如徐文长集、陈老莲集等等，陆先生侧重史地文集、扩大思维空间，如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等，成长路上有两位先生给我打下的基础。”

青绿山水，始于足下

郑百重教授从工作和旅居的经历中，谈到了自己是如何在后期找到“青绿山水”的创作方向。作为画家，郑百重教授有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不是刻意寻找而来的，最重要是生活变了、笔墨自然也变了。其中当然有老师的影响：“风格是自然形成的。我觉得我的老师给我的影响非常重要。我们中国艺术的学习讲究临摹，但陈先生不光是注重临摹，因为他画线描，所以他很注重生活。画看不见的东西，不画想象的东西，他都是画福建所常见的水仙花、芙蓉、菊花这些常见的花木、草木，从平常中画出不平常，怎么样去变形、怎么样又象又不象怎么样把文化概念渗透进去。所以，他的画既像真实，又不是真实的再现，才有他那样高的成就。”郑百重教授在自己的创作中传承了老师的绘画理念，这种理念也在自己的下乡和工作经历中得以发展：“我画画过程中也注重生活。跟中国我这种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一样，我也去上山下乡插队，在做农民的过程里，我看了很多山、水。上山下乡回来，我被安排在玉雕厂做工人，做设计工作。玉石自然纹理，就是变化无穷的画本，中国的玉石产在中国的四面八方是东北辽宁产的岫岩玉，内蒙古产密玉；河南产南阳玉，南阳玉有点像翡翠；湖北产孔雀石、绿松石；广东产南玉；新疆产和田玉。因为买玉石要深入到玉矿，中国的玉矿都是在很偏僻的山沟里面，那你要走遍中国这种山山水水；那时候年轻，能爬能跑，所以我养成对大山大水的这种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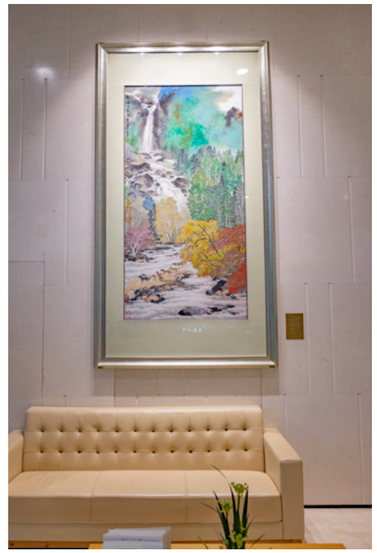
走遍山山水水“于是我的画就从画花鸟的路走向画山水的这条路，然后又来到陆老身边，对山水画的文化性、书法性进行了研讨；再后来又去了美国，在美国生活，”到世界游学。郑百重教授对自己风格形成之路描述道，“从 1995 年开始，我有 8 年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住在洛杉矶、往世界各地跑。到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参观学习，领略西方艺术这些对我转成青绿山水有很大的营养滋润，其中包括对审美概念的转换和对色彩应用的转换。我从中国式传统色彩的观念，转换到跟现代性和现代人的審美心理，这些经历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山水画历史悠久，“很多人讲我的青绿山水很传统，也有很多人讲我这个一点都不传统，传统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有个甚至讲我这个像油画；实际上我的画是因为带着时代的烙印和自己生活的痕迹，才形成了今天的面貌。”

创作者的修养

画家自身志趣的形成，对创作表达也有很大影响。郑百重教授认为，画家的志趣在于修养，和文化教育与社会背景都分不开：“要读书，你才能确定中国人理想是什么？。比方说，儒家讲

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需要讲话有信用，做事情要坚持。但今天，我们都知道到处是诈骗，生活中有手机诈骗、广告诈骗，诚信成为一个大问题。”志趣的修炼首先需要依靠文化：“首先你要确定自己的文化基础，没有文化基础的志趣是肤浅的，甚至是不断摇摆的。我也画美国山水，我也画阿尔卑斯山，但是我都用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认识来表达一个中国人对欧洲、美洲那些著名山川的感动和看法。”树立好的志趣也意味着树立起自己的审美观：“第二个重点是审美观念。我们读的是中国书，念的是中国文化，我有幸也走过半个地球，交流过各种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的审美观念都带着他的民族性和文化基础，这才会使你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明星，崇尚“瘦”，这成了一个很可悲的现象：你既然是明星，就应该是闪亮的，每朵不一样的；现在全体刻意去瘦，不肯顺其自然规律，逆规律发展是一种悲哀。审美需要正本清源——要认识美是自然，美是个性，美是与生俱来，关键在你的修养。让这些东西成为志趣，才会成就你的艺术作品，才会有风格。如果你自己没有对生活的是非和美的判定能力，你的作品志趣肯定是不高的，是庸俗的，甚至是变态的、自欺欺人的。”

郑百重教授以自己的作品《源远流长图》为例，讲解了如何托画言志：“我原先是讲美术史的，但我来这个学校专门讲中国艺术鉴赏，怎么看作品，怎么看我们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希望青年学生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能够判别、审美。比方说，我透过给学校画的这张画，表达“源远流长”的意愿。因为这是个学校，是培养青年的地方，所以我画了瀑布流水。它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流水下来的过程中间有不同的森林，表示有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今天刚入学的新生，有研究生，有硕士博士，他们都在不断地在成长，有一种象征性。山脚下有一群正在饮水的马，即是骏马。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骏马在这里吸收了营养，饮到了水，就可以走千里路。寓意在此，学校教育寄托了我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是我的画所表达的。”



郑百重教授画作，挂于大学行政楼一楼大厅中。陈鸣 / 摄

展望中国艺术未来发展

郑百重教授认为，目前的中国艺术发展是多元的：“现在是一个多元的时代。21 世纪已经过了 20 年，如今的世界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还有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大量的艺术家涌现。还有一种世界性的理论——‘人人都是艺术家’，所以，如何检验艺术，还是要根据历史，根据实践，根据时间这些会很冷静地对我们生活的时代做一个公正的评判，这对年轻孩子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向。”对于如今艺术上的创新方向，郑百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和建议：“谁都认为自己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有一个哲人讲：‘艺术家无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很难加以评论。只有你自己坚持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路，你就不会走错路。”

心游于艺，道不远人

—— 专访影像记录者陈彦升

记者 / 刘玥彤
主编 / 蒲严博

陈彦升 2020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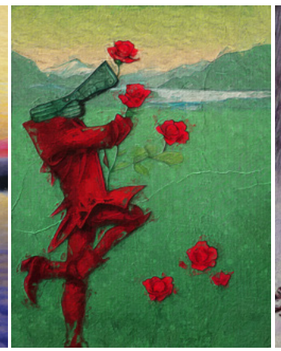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影像记录者，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将故事、现实的影像和对当下的思考结合。他习惯于通过相片或视觉艺术作品来记录一个稳定但罕见、恒久但瞬息的时刻，思考整个“当下”与“过去”之间无法割裂的关系。

2022 年夏天，陈彦升同学为《神仙湖畔》首发的文学增刊《THE MOMENT》创作了封面，获得广泛好评。欣赏之余，我们也好奇作品背后的灵感来源和创作过程。对他来说，“eureka”是一种更为随性和舒展的过程，而这种感受的背后，隐含着他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追求。

《THE MOMENT》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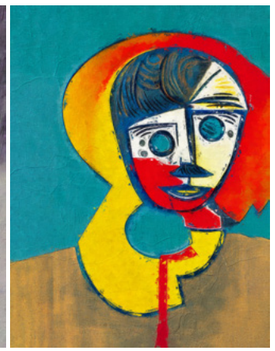
陈彦升同学创作的文学增刊封面和一系列书签作品。

《一直走到黄昏边上》



《杀死最后一朵玫瑰》

《死于大雪的芍药》



《我的面容两眼空空》

记者：初识你是看到你为《神仙湖畔》的文学增刊《The Moment》创作的封面，鲜艳的颜色之下主体似乎并不明晰。这系列的作品有什么含义？这些创作有什么契机吗？

陈彦升：其实最开始我这般构思这幅画，是收到《The Moment》编辑部的“约稿”。画面中描绘的场景是湖和远处的山，毕竟是《神仙湖畔》的文学增刊嘛。我当时自己琢磨想着，“the moment”是表示“瞬间”或者“某一个时刻”这类意思，还是说表达“at the moment”——即“当下”的含义，在我请教了编辑部的北海老师之后，发现标题其实同时含有这两种意思。于是，我选择了印象主义的表现形式，以捕捉景物在特定时间内所自然呈现的那种瞬息即逝的颜色。同时，我结合了刊物秋季刊的“秋”，绘制出封面上鲜艳色彩结合的画面效果，而并不明晰的主体——“湖”和“岭”——或许可以理解为书刊中文字所记录的，人们心中每时每刻既涌动不息又模糊的感觉。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方式，对于观者，“看”到的是什么，那事实就是什么。

记者：非常文艺的解说。你在“流影映画视觉工作室”创业团队工作，最近工作室有什么作品？主题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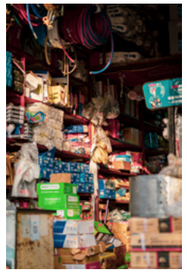
陈彦升：最近，我们在筹备一个艺术群展，主题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源自英国诗人 John Donne 的同名诗。选这个主题的起因是，我们在 Igulife 上看到了关于“龙大陌生人社会”的相关讨论，我们发觉在校内，大家因为全球疫情、信息茧房、学业压力等问题，彼此感情上的链接比较少，所以，希望通过展览这个媒介去解构问题。展览内容一方面是体现这个小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孤岛”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通过摄影、美术、装置乃至行为艺术作品，让大家感受到“孤岛”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行动来化解的。我们希望在校内邀请一些热衷于艺术与创造的同学集体去展示。

陈彦升为大学校巴设计的涂装效果。

最近，我们还在为学校设计新一期的校巴涂装，我自己也尝试设计了一辆车，我觉得在校巴这样的载体上，不应该只是把画作放大到一辆车那么大，而是应该为画面增加更多的细节，不过最后我没有平衡好比例，车头和车尾失调了（笑）。这辆车的涂装从毕加索的版画衍生出来。我给它起名叫“自然的历史”，意为追溯历史的行走路线，再次激发自然最初灌输给我们的，对世界的好奇心。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把这个艺术展的构想落地？

陈彦升：诚实地说，最早我们只是希望自己创作的东西能被看到。我们想知道其他人对于我们的作品或想法有什么看法与建议。但随着策展工作的推进，我们的重心越来越多的放在了通过艺术去“疗愈”和“链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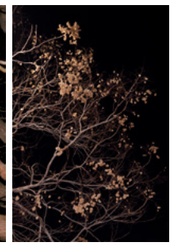


陈彦升先有主题之后进行拍摄的作品，来自《穿透基本功能》系列。

记者：这个展览是有明确主题的，那在平常的创作之中，你也经常有既定的主题吗？

陈彦升：在平常的创作中，以摄影举例，有时候我是先明晰创作主题，比如说“孤岛”，然后依据这个主题，通过摄影这个媒介去呈现一些现象或事件；而另一些时候，我会一边拍摄一边整理、反思，寻找已完成的作品中有什么样的线索，然后进一步探索，在这个后有主题的过程中，大部分时候我只是拿着相机在街上闲逛，然后跟随内心的想法去选择拍摄场景甲还是路人乙。

其实这两种创作思路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因为不论是拿着相机在街上随意拍摄，还是为了一个既定主题去拍摄，决定我要不要按下快门的，都是面对世界时那一瞬间感性与理性的交织。



陈彦升先拍摄之后才提炼出主题的作品，来自《夜间生长》。

记者：你希望在那一瞬间定格的是什么？或者说，这种瞬间的意义是什么？

陈彦升：其实像罗伯特·亚当斯所说，摄影的本质只是去参与生活。摄影的主观表现没有音乐、绘画等形式那么强烈，更多时候是在关注如何与现实生活产生联系。摄影师拍照的时候，其本人、取景框、被拍摄的客体不是相对孤立的。比如风光照，摄影就记录了摄影师所身处的环境中的情境；再比如我前段时间经常拍摄的群像——或者说，“有人的地表景观”——在高峰时间段我站在十字路口，学生、上班族、外卖小哥、放工的工人们，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十字路口汇聚，又向四面八方散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张力非常吸引我。虽然他们之间互不相识，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会去联想他们之间的故事和关联。这种仔细观察生活中细节的行为，会带给我们更广阔的视野。

在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中，我们或许会发现，生活中需要努力、需要忍受的时刻太多，而愉悦享受的时刻太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确实是难以接受的。但在当我们身处于一个“the moment”之中，取景框内客体之间的联系，指向的是我们整个生活中更广泛的联系。在定格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努力朝着解决那个古老且传统的命题迈步：怎样与生活和解？

新街口组图

记者：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的摄影和生活之间的联系是怎么样的？

陈彦升：摄影由生活构成，我时常想拍摄并展示我自己生活中的东西。有时我会去展示什么是好的，这样我们就会珍惜它，什么是坏的，这样我们就会想要改变它（当然，评判好坏的权利在观者手中）。当然，如果能在一张照片中同时包含两者则更好不过。我常常在寻找能够同时记录到上述两者的照片。我有一张很喜欢的照片，拍摄在我家乡一个古老的灌溉渠旁：画面中一部分是破败的钟楼和居民楼，另一部分则是潺潺的渠水和岸两边的树木，最高的树木和钟楼分别立在中心轴的两边。这张照片中的树与渠水是黑黢黢的，而破败的建筑却是白色。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张不错的照片，因为它暗示了城市发展的一些矛盾本质，非常契合我当时正在做的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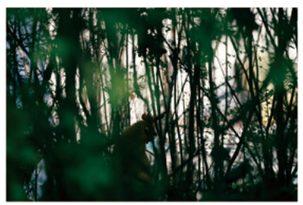
来自组图《体裁不限，诗歌除外》之《小鸡崴水》。

《趴》来自摄影个展《天普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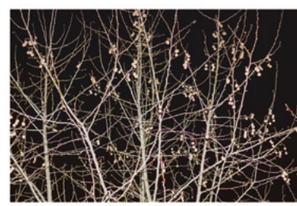
记者：我联想到“朋友圈”，这种对于生活的记录的创作方式，是你对自己的交代，还是你展现给别人的思考？

陈彦升：更多的时候还是对自己的交代更多一点。其实也不能称之为“交代”吧，依然拿摄影举例——在拍照的时候，我将视线对准取景框，所有思绪都保持自然流淌。每次取景都是我通过小小的方框，以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焦距、不同的视野去观察世界。这种另类的视觉体验，为我提供了观察世界不同形态的可能行。所以这个创造的过程就是享受观察吧，就像是让心灵“自然地流淌”。

《阅 -1》来自摄影个展《天普话》



《阅 -1》来自摄影个展《天普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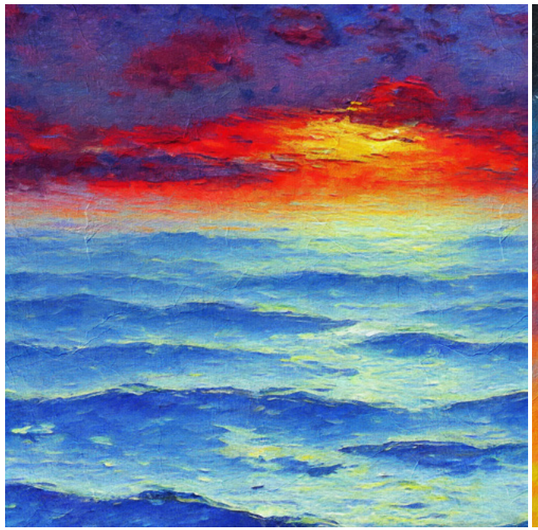
记者：那么作品完成之后呢，观者的评论对你有影响吗？

陈彦升：当然会有影响，我还在初学者的阶段，所以我亟需人们的评价与建议。不过我并不会全盘接受所有的建议。对于一些比较主观的建议，像是风格、表达方式方面的，我会先思考如果采纳，它们对我的产出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我在观看别人的作品，我会不会认同这些评论。被不合理地评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会遵从自己的选择，毕竟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势必会和其他人的声音有所不同。

记者：但是如果是以引发思考或者共鸣为目的去创作，大众的声音很重要，你又是如何平衡呢？

陈彦升：比方说未来的校内展览吧，我们需要去传达“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主题，那么我们在策展的时候会选择大家更容易接受、理解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其实仍然是我的思考，通过自己不同形式的语言去向观众传达，这才是“展示”的本质。

摄影个展《天普话》展览海报



《浪潮》

《仰望星空》

数字画《光隐归云》

记者：创作的时候，你到底是依赖自己的工具箱还是看似飘渺的灵感？创作过程中，你的灵感主要来自什么地方？

陈彦升：我仍然觉得那些灵感瞬间是自有安排的。虽然艺术并不能完全离开“术”，但是当我们去接触近现代艺术，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可能性都来自于人类本身的思维或感性冲动。对我自己而言也是，许多时候我只是让线条和颜色跟随我的思绪“自动”绘画，而我拍照的大部分时候也不是刻意地去抓取巧合，而是某一样东西在那里，在那个恰到好处的地方，我所做的只是看见它，把它拍了下来。

记者：在你这种创作过程中，以及你的工作中，你有得到什么吗？

陈彦升：我在创作和 Lumens 的工作中越来越感受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专注”，努力地投入，去简单地接收与创造。获得纯粹的快乐，其实就是感受创造，感受付出，感受爱，这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托付，灵魂得到满足，让我们永不孤独。

同时，在这种依托自身思维与感性冲动的创作中，不要过于追逐新颖的概念或形式，避免在概念的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制造空洞的思想垃圾。当我们努力去让感知从贫瘠走向富饶，让思维从怠惰走向积极，作品自然就会变得饱满

记者：你对同学们的创作有什么建议吗？

陈彦升：说提建议未免有些太不自量力了（笑）。最近有不少新兴起的小团体或组织在倡导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绘画，并不一定需要具备基础素养。在我的身边，也有许多朋友谦虚地说自己不懂文学、不懂音乐、不懂美术，但是他们无意中的创作仍然能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大家不妨随意地拿起笔试一试，就去画、去写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动漫角色、食物、小动物、身边的朋友们，什么都可以，或许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一些改变。

比起“创作”，我更鼓励大家去“工作”，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件事伟大而又光荣，那就是高度投入地工作，高度投入工作是一种全然的专注，是一种让小我消失的过程，是让自己与整个宇宙交流、沟通、融合的过程。在专注地工作中，我们能够抓得住每一个当下的幸福，无需远求。

作为语言之外的语言，这就是音乐最为奇妙的地方

记者 / 王焰
主编 / 蒲严博

陈宇晗 2018 级 数据科学学院 祥波书院

校园乐队撒哈拉船长乐队主唱兼萨克斯手，也是一名业余音乐制作者。平时，他会和小伙伴们学习和演奏一些有意思的曲目，也常自己写写音乐记录情绪和流淌的灵感。

雷子琛 2020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喜欢吉他，更热爱音乐本身，他是学校乐队的吉他手，偶尔也会客串贝斯手，与朋友们平时会待在共建的小 studio 里，同时也会帮助同学进行录音稿件的制作。

创作潜藏着情感与个性的特征，创作不是某一类人、某一年龄段人的专属。今天，我们与校园里的音乐创作者对谈，讨论“创作”对于年轻的、并未市场化的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走向创作的两条路径：情感和技巧

“创作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创作需要我的知识去支撑”

和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一样，雷子琛和陈宇晗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乐器的。练习、考级——他们坦言学乐器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痛苦。不过，又和许多同样学习乐器的人不一样，他们还从练习走向了自发创作的道路。不过，当谈到为什么会开始创作时，雷子琛和陈宇晗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对于创作，陈宇晗不假思索地说：“创作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早从初中起，陈宇晗就发现自己特别想把脑中各种各样的情绪用某种方式展现出来。通过尝试写作或是写歌，陈宇晗发觉：音乐正好是他喜欢且擅长的那种表达方式。于是，创作之路就这样简单干脆地开始了。陈宇晗初中就给集体写下了一首班歌；高中毕业后，陈宇晗还邀请朋友和老师一起合作完成了一首由自己作曲编曲的歌，发布到网上后获得了不少夸赞——这让他很受鼓舞，他说，得到了一个正反馈，感觉自己好像还挺行的。从那时起，陈宇晗开始正视音乐创作这件事儿：“这就是我人生意义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突然有一条通道被打开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进一步地学习更多知识，想好好开拓这条创作的通道。

而对于雷子琛来说，创作始于知识的积累。他对于创作的态度显得十分审慎：“如果说我要去创作，肯定必须要先建立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需要我的知识去支撑。比如陈宇晗他一开始可以说是用情绪驱动创作，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只是单纯注意某种听感。我会觉得音乐的好听是一件比较客观的事情，写歌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太多的情绪。”雷子琛提出了和陈宇晗完全相异的创作契机：“我现在创作可能说是始于模仿，而不是始于情感。有个东西给我听到了，我想去复现它。比如用计算机跑这个模型去复现它，我想我知道这个模型，然后把其中的模型细节给填充好，去复现它——这之后相当于我掌握了这个东西，这个模型成为了我知识板块的一部分，我可以享受一种获得知识并运用知识的感觉。”

不过，尽管走向创作的动机不同，雷子琛和陈宇晗都十分认可“基本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雷子琛说，每个人都有创作艺术的权利，但需要一定的基本功作为支撑。他们认为，正是为了创作这一最终“目的”，基本功等知识才作为“工具”应被学习并加以熟悉。陈宇晗说：“只有有了丰富的知识积累，当你有想法的时候，才能有足够的能力把它给组织出来。”他又进一步说道，只有拥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才能达到“审美”的境界。技术到达一定层次后，审美也会跟着提升，这也能帮助人更好地创作。

创作的具体反思：灵感与瓶颈

“灵感这个东西很玄乎”
“我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当聚焦到具体创作时，灵感就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当问到“灵感一般从哪里来”的时候，陈宇晗和雷子琛都陷入了一阵沉默。不过，他们的答案和上文所提的走向创作大门的契机十分类似，陈宇晗说：“灵感这个东西很玄乎，我有一部分灵感确实是情绪驱动的，但是情绪这个东西也很玄乎，情绪会让你到达一个状态，让你有欲望去写一个东西。比如作曲，你在摸索、把控这个情绪的同时，有一个大体就出来了。然后你再反复琢磨，让这个旋律本身能符合你的情绪。这之后，我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东西。第二种就是我单纯想表达一种东西，没有什么情绪，就只是想把想描述的东西展现出来。”

雷子琛回答道：“我觉得我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的创作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创作，比如我知道我应该要写一个和弦进行创作，我知道这样的和弦会有什么样的听感，然后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会显得更具有韵味。第二种就是无意识灵感，其实我非常怀疑无意识灵感到底是不是我的灵感。有时候听歌听得多了就会沉淀在我的记忆里，我突然就把它想出来了，我肯定找不到它来源于哪里，也许是记忆的重组。我听过的东西塑造了我的审美，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听的，也许它就是我的灵感，总的来说它来源于以前素材的沉淀。还有就是灵感来自于随机的东西，比如说我做一个吉他手，我的手一定要比我的脑子先动得快，这是一个本能，我的手因为做过大量的练习，所以对吉他的构造足够熟悉，对于一些旋律产生，我的手会比我的脑子先行。有时候，我的手总会按出一些没按过的东西，会随机的去生成一些旋律，直到我找到一个满意的。在摸的过程中我的脑袋是无意识的，是我的手在通过随机的排列组合去找一些东西——不过，这也建立在之前大量练习过乐曲的基础上。”

接着，雷子琛对于创作瓶颈是什么的问题谈论得也非常深入，他说，瓶颈就是无法创作出他没有听过的东西。“一个好听的东西，就是人类的耳朵听多了，所以才会顺从它，觉得好听。但你真的要创新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做一些不好听的东西。我吉他老师说，一般的音乐家顺从你的耳朵，但是先锋的音乐家会创造一些音乐去驯服观众的耳朵。我的一个瓶颈就是我只能做到顺从，因为我的耳朵也是被驯化了的。” 陈宇晗则对这个问题表达得十分简单和坦然：“我的瓶颈一部分是因为我有强迫症，二是因为我想达到的效果已经超出了我目前的水平，这就导致我想达到一些效果，但我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达到。”

创作与创新不尽相同却又极为相似，创作者的瓶颈往往正是苦恼于想要突破与创新，而“新事物的诞生只能在规则之外”。但是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作为创作者的我们，从学习规则、掌握规则到打破规则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创作的回音：有限的作品蕴含无限的意义

“改编就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诠释。”
“音乐是连接人的桥梁”

对于创作者来说，每个作品都因独一无二而宝贵，也许它不够完美，但是作品总是蕴含着作者独有的逻辑和情感。当被问到会不会重新录制以前的作品，陈宇晗笑了：“虽然它们肯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它们就是我一路走来的脚印……”沉思了一会儿，他继续回答道：“过去的作品就是过去的一段时光的载体，每次再回去听总会有新的感悟，要完善的话永远都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完善。”

而对于改编他人的作品，雷子琛承认“有的创作者不愿意让人二次创作自己的作品”。他说，改编就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诠释，有时候还得看重点是集中在表演上还是音乐本身上，而且有的歌曲私人性极强，主题非常狭小，怎样去改编都不合适。不过，对于自己的作品，雷子琛和陈宇晗都认为它们被创作出来的那一刻绝不象征着完成，因为它们还有无穷无尽的解读空间，而解读的权利在于每一个聆听到它的人，每个听众被激发的情感和想象都让这个作品更加完整。

陈宇晗说：“写歌的时候这首歌就是我的世界，但是当我把它发表出来，我就跟所有的观众一样了。”雷子琛说，作品不是僵死的表征，创作者和接受者是双向筛选，都让作品流动不息。“特定的朴素的情感会激发共鸣，音乐就是连接人的桥梁，能为不同的人创造联系。”陈宇晗笑着说。确实，作为语言之外的语言，这就是音乐最为奇妙的地方。

扫码收听单曲《不息》

扫码收听单曲《木风铃》

02
Chapter

缪斯的奇幻漂流
——创作与接收

如果将创作者与接收者比作站在对岸的两个人，前者的思想要如何抵达后者的所在？

关于灵感，不同的创作者感受也不同——或许是电光火石，或许是妙手偶得，又或许是浪里淘沙、千锤百炼。当灵感被捕捉，纳入形态不同的容器——文字、影像或者音乐等等，创作者的思想就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而当创作者扔出饱含灵感的漂流瓶，其思想必定历经解构与重构，被对岸的读者、观众或者听众拾起。于是灵感的缪斯由此及彼，却触发一种近乎敌对的境地——创作者或许希望自己的思想不被曲解，绽放原汁原味的光彩；而接受者难免看出一千个哈姆雷特，甚至得到完全不同的体悟。

在这部分中，我们以灵感为引，向创作者和接受者分别发出叩问，期待从不同的方向观察到：灵感的缪斯究竟是如何在你我之间漂流的？

追寻时空的回响
—— 在《悠悠岁月》围读会中探讨创作者和接收者

文 / 王菁
编辑 / 罗雯静
主编 / 魏禾

2022 年的一个冬日，《神仙湖畔》杂志社联合学生会学术部举办了一场文学围读会，邀请到人文社科学院的李博寒教授，领读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的《悠悠岁月》。在获奖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瑞典文学院称埃尔诺“勇敢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李博寒，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香港教育大学汉语研究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硕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汉语历史语法、佛教汉语、梵汉对勘。

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借其首创的“无人称自传”写作手法，讲述个人最隐秘、最痛苦的经历。她以文字为刃，刺破战后世界虚伪的遮羞布，通过描写一个女人从孩童到老年的成长历程，展现六十多年来的世事变迁，折射时代伤痕。

“我无意写自己的生活，从自己体验过的感觉和东西出发，希望能揭示一些真实存在的，反应人类境遇的现实。”[1]

[1] 彭莹莹（2015）. “我”是谁？——安妮·埃尔诺社会自传中的无人称叙事。

埃尔诺的“无人称自传”写作手法，无“我”是刻意为之——她书写个人的亲身体验，极具自传色彩及私人小说意味，但并不使用第一人称行文，而用法语“on”（表示“我们”）。这种新文学体裁又名“社会自传”，既真实又想象力洋溢，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虚构写法，而埃尔诺也因此被称为“文学家里的社会学家”——顾名思义，创作者既要讲述个人小史，也要回应时代大史，以文学的手段将看似孤岛离群的个体系连起来。我即他人，他人即我，共织藩篱。

“无人称自传”：无人称的镜像对话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杨国政博士形容埃尔诺的作品为“自而不传，传而不自”。区别于大部分自传，埃尔诺在写作之初便有意拉开作品与自我的距离，多使用“我们”进行叙事。在埃尔诺看来，第一人称“我”中有着“过多的稳定性”和“某种狭隘的、令人窒息的东西”，而第三人称“她”则使叙述带有“过多的外在、远的距离”。权衡之下，使用“我们”此无人称泛指代词更能达到个人回忆与集体共情的平衡，通过包含创作者和接收者，将读者拉入所述之事，如同面对镜子，创作者与接收者相互映照和审视，在不停的表白与追寻中感受真实。

通过对比各个作家对“时间”的不同刻画，李博寒教授引导同学们思考“无人称自传”与“回忆录”的区别。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反映了时间的流逝。在作品里，她试图通过“无人称自传”的行文叙事，去重构集体记忆，以重溯群体生命中刻骨的时间坐标。

> 孩子们没有听讲，一旦得到允许就急忙离开餐桌，利用节日期间普遍的宽容去做禁止的游戏，跳到床上头朝下打秋千。但是他们记住了一切。与这个神奇的时代——他们不会马上去整理它所有的插曲：溃退，逃难，占领时期，登陆，胜利——相比，他们觉得自己成长的这个无名时代平庸乏味。当必须像波西米亚人那样成群地上路和睡在稻草上的时候，他们惋惜自己当时没有或者刚刚出生。他们对这个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念念不忘。[2]

李博寒教授指出，书中这段对这次家庭聚会的情景描述正表现了时代更迭的特征——孩子总是属于下一个时代，而在他们的记忆中，上一个时代的存在是模糊的概念。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通过对 14 张旧照片和 15 次家庭聚会的记录去刻画时代的变动，前后时间跨度为 66 年（从作者 1940 年出生到 2006 年法国总统大选）。一场血腥的战争，对上一代人而言是深刻的痛苦，但对下一代人或许只是茶前饭后的轻松谈资。个体化的“记忆”难以令他者感同身受。通过将私人化的情感“大众化”，埃尔诺试图缩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能从中找到熟悉的片段，在他人的经历中发现自我的价值。因此，她将镜头聚焦至平凡的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之下，将私密的想法和隐蔽的感受公之于众，在剖析自我的同时融入世俗、时代与大众文化，让读者切实地体会到社会变迁更替与事件发生对一个小人物的生活带来的嬗变。

> 战后在伊沃托的废墟边上，大白天蹲在一间当做咖啡馆的木棚后面撒尿，然后站着撩起裙子、系上短裤，再回到咖啡馆里去的女人。
>
> 在影片《长别离》中，与乔治·威尔森跳舞的阿丽达·瓦莉热泪盈眶的面孔。
>
> 西蒙娜·西涅莱在《太蕾丝·拉甘》的广告上的面孔 [3]

《悠悠岁月》开篇出现了近十页的名词意象，是独属于作者带有法国文化符号的记忆，要理解它们即便是对法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读者都有难度。活动现场，有对现代主义文学并不感兴趣的同学表示《悠悠岁月》读起来有些乏味，认为埃尔诺采用了类似纪传体的手法，却失于文学性的表达（猜测可能是由于翻译因素带来的文学减损所致）。此外，丰富的隐喻使阅读难度大大提高，受众面也难免相应缩减。不过，现场也有同学表示看《悠悠岁月》如同在看一篇抒情式散文，难以深度共情，但不妨碍读之有味。

[2] [法] 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15 页。

[3] 同前注，第 44 页。

[4] 同前注，第 44 页。

[5] 同前注，第 44 页。

“双重身份”：亦晦亦荧，挣脱自缚的茧

> 像每一种语言一样，它划分等级。谴责懒惰者、品行不端的女人、“色情狂”和卑鄙的家伙，偷偷摸摸的孩子，赞美“有能力的”人，端庄的少女，认可高层人物和硕大的蔬菜，告诫：生活会教训你。[4]

成长于诺曼底，身处无产阶级的埃尔诺自小对阶级地位十分敏感。阶级之间在语言体系、交流方式、文化教育模式的差异对她的心灵带来了强大冲击——同一世界竟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而当她走出家门，她悲哀地意识到，自己所熟悉的语言体系几乎上不了台面。

> “在聚会用餐时喧哗的嘈杂声中，在极度的争吵和不睦突然出现之前，另一种重要的叙述夹杂在对战争的叙述里，只言片语地传到我们这里，这就是关于出身的叙述。”[5]

细微如走路姿势、神情神态、感官动作等共同的生活习惯构成庞大的社会性回忆，从而使人们不断完善与更新着对自我身份和所处阶级的认知。不同阶级在一致的社会评价体系下因起点不同、环境不同导致阶级固化，并随着时间经历的推移而愈发强化——正是社会身份上的区分引发埃尔诺自尊上的创伤。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说：“对于社会不公平机制的无知默认也迫使他们，尤其在学业成功与否方面，用先天性的不平等、缺乏智慧与才华来解释自己的落后。”出身带来的不平等令人唏嘘，也进一步加深埃尔诺的“羞耻感”——纵使完成阶级跃升，仍无法消除无产阶级出身的自卑感，这种连绵的自我怀疑更是引发了对新阶级的陌生和割裂。

现场亦有同学指出，埃尔诺在阶级跃迁后的自我割裂感与如今“新中产阶级”的焦虑感十分相似——无产阶级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级跃升之后，其物质生活虽有提高，但精神文化的归属感却显失落。对于“新中产阶级”而言，物质与精神上的脱节导致其对自身定位感到迷失。要解决这种迷失，李博寒教授认为，“新中产阶级”需要通过不断积累自身生产资料，以为下一代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从而使其精神文化素养与所享有的物质生产水平相匹配，以此构建相应的阶级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

同时，由于作为女性的社会身份，埃尔诺常面临在出版社四处碰壁的情形，并由此愈加察觉到女性的社会性劣势所在。埃尔诺的母亲作为激进女性主义的支持者，更是强势地形塑了埃尔诺的性别意识。青年时期惨痛且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堕胎经历（1975 年之前，堕胎在法国都是违法行为），婚后被迫放弃写作事业的家庭主妇生活与六七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女性解放，运动都赋予埃尔诺文学创作的养分。她通过揭示现代女性于个人自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挣扎，展露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在埃尔诺的叙述下，女性权益斗争不再遥远，它就是由无数普通女性的牺牲换来的崛起的意识。而正是这些牺牲，构筑起女性向前的聚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最终真正让埃尔诺实现阶级跃升的却是与中产阶级丈夫的结合。作为“阶级变节者”和“女性主义者”，埃尔诺却好像在依赖“男人的力量”，这还算得上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吗？完成阶级跃迁之后，她又是否能真正融入所谓的“上流社会”？

问题之下，李博寒教授引导同学们探讨埃尔诺看似矛盾的女性主义意识。有同学认为“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尊重女性的任何选择，‘嫁给爱情’亦是女性实现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亦有同学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对“仅仅认识几个月的男人”很难产生所谓的爱情，更多是金钱与社会地位上的吸引促使埃尔诺与其结婚，借由男性力量完成阶级跃迁的行为不应算是真正的女性主义。李博寒教授总结道：“如同富有隐蔽性和个人意识的现代主义小说，埃尔诺婚姻选择的真正缘由我们都不得而知。或许她也向社会条例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妥协，而这也反映了很多理想化的‘主义’和‘运动’在面对现实时，并不能很好地贯彻与执行，我们需要承认此类世俗的无奈。”

在《悠悠岁月》围读会中，李博寒教授带领同学们对“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手法和作者安妮·埃尔诺的“双重身份”进行探讨，从一名法国女性的私人经历感受集体性回忆，与埃尔诺一同完成“自我形象的重塑”与“自我经历的重组”。

与创作的二三事

—— 对话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何薇

记者 / 戴一诺
文 / 戴一诺 季伊忱
编辑 / 季伊忱 罗雯静
主编 / 魏禾

何薇

Wei He is a bilingual playwright and fiction writer and teaches Creative Writing and Interactive Narrative Design for Video Gam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She holds an MFA degree in Dramatic Writing from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Her kindergarten teacher said Wei was very energy consuming. He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said the word WEIRD had her name in it. Her high school teacher said Wei was not smarter than other kids, she was only "stupid in a different way". Then she got into a drama school and tried to become a playwright. Her writing mentor said her random cursing was always fantastic and Wei said she'd be fine. She was fine. She's still doing fine.

何薇教授是双语剧作家、小说作家，并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教，教授创意写作课和游戏互动设计课。何老师曾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取得戏剧写作艺术硕士学位。

下午三点半，教室门外，高跟鞋利落的响声传来。何老师到了。她戴着墨镜，一手插着口袋，一手拿着印有“English for Translation Programme”的黑色马克杯，径直走向讲台。她一直都是这样酷，走路酷，讲话酷，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酷。不过她这节课的 PPT 更酷：黑底白字，上面写着“A love as deep as a bite”。

何薇老师是人文社科学院的助理教授，开设游戏设计课和创意写作课。她是老师，也是一名作家。何老师有丰富的戏剧及写作从业经历，曾发表过多部作品，所著剧本在多地展演。何老师总是会分享她在创作路上的种种心得，用自己的写作经历作为课堂素材。她喜欢用幽默简单的语言创作引人思考的故事。此次《神仙湖畔》杂志主题报道栏目邀请到何薇老师，谈谈她关于创作的二三事。

何以解忧，唯有——侦探小说！

何薇老师与文学、戏剧的结缘，是由一个个意外与惊喜组成的。

小学四年级之前，她本不喜欢写作，但一阵突然的“开窍”让她的作文水平突飞猛进；五年级时，她在席卷校园的侦探小说热潮中创作了人生第一部小说。

“五年级时，我们班很流行看《大宇神秘惊奇》，所以我写的第一部小说是侦探小说，讲的是我和好朋友一起破案的故事。后来我开始写诗和散文。我喜欢一边听着 New Age 的音乐一边写作，还会找古典音乐来听。那个时候小说写得不多，但各种类型都会尝试着写，包括青春小说。”

在六年级，何老师就发觉自己的作文和别人“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小升初考试，她的作文考了满分，这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带着这份信心，她步入了“文思泉涌”的初中阶段。如果说作文拿满分的惊喜是美妙的序章，那么初中的语文老师对她的支持和鼓励则是温暖的底色，推动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与写作，让她在创作的世界尽情探索。

“初中语文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说我的作文已经有文学的感觉了，所以并没有按常规标准评判我的作文，而是写成什么样子，就按什么样子来判。我平时想法多，话也很多，又是语文课代表，所以每天都会找老师聊天，交流想法，也读了许多书。初中三年，我在写散文和散文诗方面进步最大。在初三，我开始阅读英文小说，海明威的作品就是启蒙。”

高中时，何老师继续创作小说。不过她对于戏剧的探索直至大学专业分流时才起步。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她发现中文系的课程内容与她之前的设想出入很大。苦于学术研究的枯燥，何老师在偏向学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偏向创作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学习戏剧其实是一个巧合。大三之前我对戏剧一点了解都没有，选定专业方向后才开始走进剧场，上了一年的吕效平老师的舞台剧写作课，这才开始真正的戏剧创作。”

至此，意外与惊喜排列组合，为她垒起通向作家之路的垫脚石。

灵感在左，修改在右

在漫长的创作旅途中，灵感的诞生是随机的惊喜。“给予大脑不同的刺激”，是捕捉灵感的重要途径。何老师习惯从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汲取灵感，并不局限于小说、剧本、诗歌、电影等等。“看得越多，尤其是看的好作品越多，越容易否定自己，但是寻找灵感是一定要看很多作品的，而且要看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之所以开设电脑游戏设计的课程，也是因为小说、戏剧，或者诗歌、电影，都太相似了，久而久之大脑会陷入疲惫。这个时候不如玩点游戏，看看游戏是如何让人着迷的。”

同时，何老师也告诉记者，对生活的体会和观察也能帮助创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写作难以打动读者，质朴的生活体验往往更能直击人心。在灵感实在枯竭的时候，耐心就是良药。“写的时间越久，灵感越少，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先干点别的，就这么简单，灵感很多时候是等来的。”

在等待的过程中，她经常“出去走走，观察生活”，还会随身携带小本子记录想法，为下一个主题的创作积累素材。然而这种创作的方法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新的难题——放松。很多人靠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放松自己，但是研究音乐、游戏、电影往往就是创作者的工作。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戏剧学院学习时，何老师修生物专业的室友每天熬夜学习，而她本人每天熬夜看剧，让室友羡慕不已。但作为戏剧专业的学生，她连“看戏”都神经紧绷。“我看电影一点也不放松”，何老师说，“写不出剧本的感觉只有你自己知道。”

灵感急不得，运气很重要。对于何老师而言，写作进程最流畅时，一周能写完一篇短篇小说——她在美国学习时发表的 *Mathematician's Wife* 只用了六天时间就写完了。但多数时候并不会这样顺利，尤其是对于戏剧创作而言——剧本创作局限在固定、浓缩的时空里，因此相比于小说，剧本对结构的要求更高，一次性安排好剧本结构几乎不可能。剧本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改，有时甚至全部推翻重构。

“Everybody knows how to write, but only writer knows how to rewrite.”修改是作家的必修课，打磨作品是重要的学习过程。在卡内基梅隆学习的第一年，何老师迷上了写独白，正逢大学请来 J. T. Rogers 主持独白工作坊。“我当时把我的独白稿子交上去，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让我重写。后来在一整个学期，整整四个月，我都在改同一个剧本。”何老师觉得自己在修改剧本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没有创作者能在这条路上弯道超车。也正是因为这样，创作者需要找到合适的读者，对作品给予反馈。何老师在一次戏剧节结识了一位美国的编剧，后来她便经常邀请这位编剧朋友阅读剧本初稿，为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是接收者对创作者的“反哺”——因为在作者沉浸于作品、“身在此山中”时，读者往往能从更多元的视角提供“旁观者清”的思路。

何老师在 Against the Grain Theatre Festival 排练话剧 My Birthday Party。

图为 My Birthday Party 剧照。

图为何老师创作的话剧 The Things we do to survive youth 剧照。

写给自己，写给大家

何老师认为写作是一种探索，是一种解决自己的疑惑的渠道。出于好奇自己在十年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何老师创作了剧本 *My Birthday Party*，而将这些想法写成剧本的同时，她也更清晰地明确了创作者的定义。“作家创作不是为了提供 solution 的，那是政客的工作，我们做写作的人，是描述 predicament 的。”

而谈到创作风格，何老师认为不能在写作之始就定下故事的结局，要让笔下的人物引导作者，而不是让作者引导人物。固定的结局会限制作者的思路，而人物之间的互动能推进故事发展，顺其自然的创作过程才能更好地丰富人物。同时，她习惯写“大白话”，用简单词句表达有趣的意思，用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考。何老师表示，在教学过程中常常遇到学生“用意象和形容词的叠加营造诗意的假象”，“用繁复堆砌的语言掩盖思想的贫瘠”。归根结底，是中文与英文的思维不同，以及自身积累不足。对此，她建议大家多阅读，多积累，学习不同语言的表达思维，把自己的思维从中英文之间“隔开”，让语言简单、清晰、流畅。

对于创作的意义，何老师引用了作家 Thornton Wilder 的话：“I have always known it without being fully aware that I knew it. Now in the presence of this play or novel or poem (or picture or piece of music) I know that I know it.” 在具象化作品的过程中体会抽象的创作乐趣，就是创作的意义。而谈到和读者的关系时，何老师立刻给出了答案：“创作不只是为了表达我自己，我需要 audience，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自己写开心就好，我不是。我写了，我要保证你们要看得懂，也要喜欢看。”何老师认为，只要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就是作品价值的实现，这也是她“希望写大家能看懂并且喜欢的故事”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迎合受众会陷入所谓媚俗的歧途，何老师并不这样认为。“故事来说，我觉得我要写大家都能看懂的故事，同时让他们觉得这个故事有趣，我觉得故事也是要挣钱的。”作品的商业化与艺术价值互不妨碍，有深度的思考才是作品的重要内核。她为我们分享了两个例子：百老汇的音乐剧 *Chicago* 包含了众多流行元素，比如爵士乐、爵士舞蹈，舞台表演非常精彩，而故事本身探讨公众舆论和媒体对法律判决的影响，探讨两性关系、律师与正义的关系，引人深思，既有商业价值，又不缺乏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美剧《真探（True Detective）》包含凶杀、恐怖、色情、乱伦等种种热门的侦探片元素，博人眼球，但同时它讲述了有厚度的故事，对人性有深度思考。因此，何老师认为，“商业与艺术是不矛盾的”。

如果作品遭受了误解，何老师建议创作者们不要着急，她分享了关于毕业作品的经历——即使是同专业的几位导师，也对她的作品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个作品会有许多面，每个受众关注的方面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所谓“被误解”也是正常的现象。创作者们其实不必担心不被理解，她分享了教授创意写作课时遇到的情况：“我读同学们的作品，就一些问题进行提问，他们立刻着急地说‘老师您是不是不理解，我给您解释一下’……其实并非无法理解，而是创作者可能在一些细节上没有交代清楚罢了。世界上有这么多聪明人，我们永远可以对读者抱有信心，只要作者有好想法，好文笔，写出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一定能遇到心灵相通的读者。”

创作是惊喜与挫折的结合，是灵光一现与长久积累的结晶。在漫漫创作旅途中，何薇老师用敏锐的目光捕捉生活点滴，用耐心与毅力打磨文字，在“创作”这片花园中悉心栽培一片芬芳。

P.S.

在采访的前一天，何老师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林漫步”活动中举办了“关于幽默和喜剧的二三事”的讲座，她推荐大家阅读 Kurt Vonnegut 的长篇小说《第五号屠宰场》：当二战、时空穿梭、外星文明出现在同一个故事中，如何用史无前例的手法描述战争，如何重构时间与生死，都极其引人入胜。这正如她热爱并追求的风格——用幽默洒脱的笔触，讲生动又深刻的故事。

03
Chapter

Echo | 群山回唱
——观众与误解

人类史是灵魂敲击灵魂的历史。

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里，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类叩击石壁，试图将太阳带回给蜗居在洞穴里的人类，却死于乱石之下。而受他蛊惑的人类将沿着他叩击石壁的脚印走出洞穴，把太阳的影子带回给太阳。

人类孤独却幸福的宿命就此写定：我们以诗，以歌，以写作来捕捉生命里每一个孤独的瞬息，如同对群山呐喊，不知道代表恐惧的乱石与共鸣者的回声谁先到来。所幸四下空旷，你总能听到回音。

如空谷传响，群山回唱。

掷下音乐的骰子：
如何看见音乐的一体多面
—— 专访音乐学院潘行紫旻教授

记者 / 林嘉译 丁凯伦
编辑 / 张诗悦 洪悦彰

潘行紫旻

潘行紫旻教授编著的书籍《歌曲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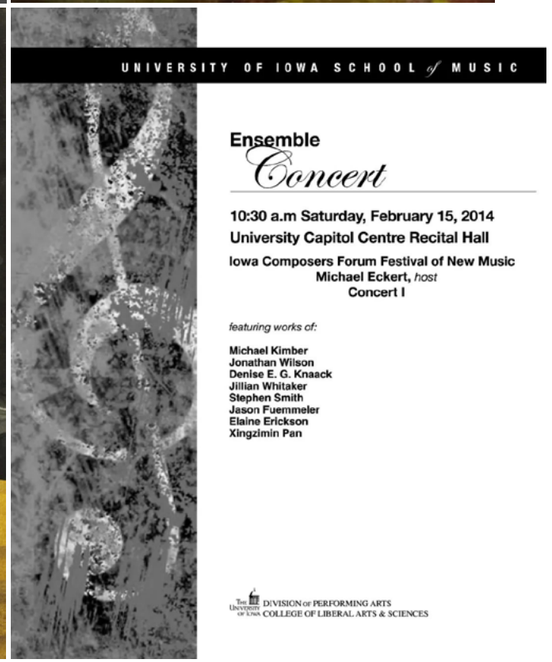
犹他大学作曲博士，曾任犹他大学作曲家协会主席，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助理教授。

潘行紫旻的作品演出于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法国、意大利、希腊、马耳他、南非、匈牙利等地的著名音乐厅，曾在国际合唱联盟国际作曲比赛、“美国奖”音乐比赛、美国 RED NOTE 作曲比赛、美国长笛新音乐基金会国际作曲比赛和中国 - 东盟音乐周作曲比赛等作曲比赛中获奖。

潘行紫旻的合唱作品重视对意境和氛围的营造，以及对人的各种细腻情绪体验的传达。他合作过的合唱团包括悉尼室内合唱团、多伦多大学女声合唱团、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室内合唱团、北卡罗莱纳大学合唱团、格但斯克大学合唱团、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中国）和台大合唱团（中国）等。其代表作品《诗 I》、《花的诉说》和《云中》等在国际和中国合唱界获得了广泛好评，并被复旦大学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和德国 Schott Music 出版。

合唱音乐创作之外，潘行紫旻的器乐作品《怪谈》因对新音色的成功挖掘和对现代记谱法的贡献，获得了欧美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奥地利格拉茨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图书馆收录。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音乐相较于视频、文字，有着高度的抽象性和可塑性。由于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受众对于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的许多命题，认知较为模糊。本文旨在从创作者和听众两种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一些经常使普通听众困惑的命题，进而让听众对于音乐及音乐鉴赏有更为清晰的视角。



潘行紫旻教授作品音乐会系列海报

潘行紫旻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陈鸣 / 摄

记者：音乐的创作过程中，是否需要预想听众的反馈？

潘行紫旻教授：在音乐的创作过程中，假想听众的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能够预判听众对音乐的期待，基于这种预判来设计，可以创作出更有意思的作品。基本上，创作者的预判随着经验越发丰富，会变得越精准，所产生的偏差越小。

记者：音乐创作者对音乐应该是怎样的态度？

潘行紫旻教授：因为创作者需要做出更好的音乐，让更广大的听众去享受音乐，所以需要更加负责、冷静、理智的态度。创作者需要知道音乐是什么，如何做出更好的音乐，怎样的技法才能够实现情绪的传达。创作者要学会分解音乐，也就是知道音乐产生的流程，知道音乐和情绪之间的机制。

记者：音乐创作是情绪和灵感的产物吗？

潘行紫旻教授：不是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甚至有人会觉得作曲家是不是有的时候需要借助酒精或一些药物。但是仔细想想，那些优美的旋律和精准的和声是不大可能在神智不清醒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其实，音乐创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情绪互动层面上的工作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引入来确定音乐的主要基调。音乐的创作是用合适的办法来传达情绪，并用一套系统的理论把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阻碍解决掉，绝大部份工作的重心都在于技术层面上的传达和营造。这种工作要求保持理智和清醒的状态下去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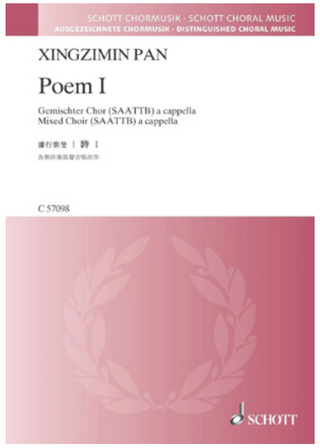
例如，两个都具有悲伤情绪的人，没有学过作曲的人无法用作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悲伤情绪，但作曲家能用音乐来传达自己的情绪，关键就在于作曲技法的有无。系统的观念、理论、技法甚至可以做到支撑创作者在没有“灵感”的时候也能写出有效的音乐。更进一步说，这样的创作其实是可以做到与个人的情绪体验完全脱离的。

记者：听众的反馈对创作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潘行紫旻教授：听众的反馈基本上不会影响学院派作曲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不同于通俗音乐和商业创作中需要曲作者来迎合市场，学院派以及严肃音乐的创作其实需要听众来迎合曲作者的艺术审美和艺术观。另外一点，现当代听起来难以接受的音乐，在以后反倒可能会演化成潮流。比如说二十世纪中叶出现的电子音乐，它突破了当时要求必须真人演唱或者乐器演奏的这一传统，是单纯依靠电子方面的技术手段去直接生成音乐。不过，新兴的电子音乐在音乐语言上比较先锋，在一开始，对于大众而言，这种“音乐”是无意义的，平时绝对不会主动去听。但是后来，那些电子音乐作曲家在创作中发明和改进的各种设备和创作方法，都被广泛地用到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编曲中。与之类似的是，现在恐怖片配乐的音乐风格，也是由二十世纪初饱受争议的不协和与无调性音乐所发展而来的。所以，学院派作曲家的严肃音乐创作，不必特别去迎合当下所有的听众需求。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音乐的价值会慢慢体现出来。另外，有的时候，听众之间的争议和不同的反应恰恰是体现出了作品的价值。我曾经写过一个套曲，叫做 Three Whinings，使用噪音的手法表现了三种“啰嗦”——“whining from noisy kids and their parents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whining from my mom when she tries to persuade me to get married early”“whining from my colleague when he talks to me about something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rest in”，有个美国长号演奏家很喜欢，演奏了数场。但是，我的一个校友在我的官网上听到之后给我写邮件，批评了这组曲子，认为这个作品没有音乐性，强烈建议我能从官网上将其撤下。于是我给他回信，说：本来这是我随意写的作品，也自认为不算是我最好的作品。但如果它能引起大家观念上的争论的话，那我一定会将它保留在网上。我认为，其实这种争议性一定程度上就证明了曲子有很多可讨论的余地，是有价值的。

潘行紫旻教授作品《蒲公英》封面

潘行紫旻教授作品《怪谈——为长笛和钢琴而作》封面



潘行紫旻教授作品《诗 I》封面

记者：听众应该从什么角度来欣赏和评价音乐？

潘行紫旻教授：音乐的高雅和通俗之分确实存在，但是他们是平等的。在通俗音乐中，更加常见的是用直白的方式表达。而在古典（高雅）音乐中则显得更为复杂或者说隐晦，可能需要听众去结合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从精神层面上去挖掘，这就对听众的分析能力和共情能力有一定要求。可以说，听通俗音乐这一行为，本身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偏娱乐和放松的体验，听严肃音乐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享受，但其中包含了更多的精神探索的行为。

记者：如何理解音乐在精神层面上的高级和丰富？

潘行紫旻教授：首先要理解，音乐在精神层面上的高级和丰富主要在于解读的空间、解读过程中付出的思考。这并不是说表达手法的简单复杂，而是指欣赏音乐所能触及到的深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级和丰富是关乎个人体验的，每个人的审美体验和可以触及的审美深度不同，专注思考、聆听、感受是一种习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这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干扰他人，不应强制地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加之于别人。

记者：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应该具有哪些素质？

潘行紫旻教授：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安静，这可以指音乐厅听音乐的时候不要随便发出噪音，但也是告诉大家在评价音乐的“好坏”而非“喜欢与否”时不要用不负责任、不公平的态度去评价认真做音乐的音乐从业者。另外，也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付费听音乐的习惯，来帮助实现版权规范的建立。

记者：音乐的文化性和民族性会对音乐本身有怎样的影响？如何让音乐能够被更广泛地接受？

潘行紫旻教授：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的确会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文化，在这种强势的文化中的音乐，的确会在某一个时期里成为音乐审美的主流。很多年以来，西方音乐相对来说更主流，的确如此，因为它的文化和经济更加强势，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地接触它的音乐，甚至有的时候会以它的标准来要求其他音乐。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族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平等的。因为音乐还是需要回归审美的。或许某个文化的音乐现在看起来比较弱势，未必是因为这种音乐本身不好，也可能是它背后的国家或者文化、经济没有太发达，导致它现在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由此出发进一步看文化输出，就需要尽量避免原生态输出构成的巨大文化壁垒。这当中很重要的是，在保留原有文化特征和使其他文化背景下受众感兴趣之间，找到平衡点。音乐，或者说所有的文化，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行输出，优秀传统的延续可能需要现代化，而艺术的传播也可能需要适应性地变化。

为一个句号争辩不休：驻校艺术家邓康延专访

撰稿 / 张诗悦 洪悦彰
编辑 / 张诗悦 洪悦彰

邓康延老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陈鸣 / 摄

主编、制片人、媒体人……邓康延的许多身份具备“创作者”和“接收者”双重角色：作为《凤凰周刊》的前主编，他曾接收作者来稿，又通过制定主题、甄选侧重对文章进行再创造；作为制片人，他既是中国教育的观察者，又在影片剪辑、内容选择等方面进行创作。我们希望通过与他交谈，呈现他“创作者”“接收者”双重身份的特征，同时获取他的双重观察。

01. 作为主编

记者：作为编辑，在审阅一部作品时，您是通过何种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这与您作为独立的个人受众时，对一部作品的评判标准有区别吗？

邓康延：当然有。

一份刊物是一个公共媒体，它负有公正、客观地对社会进行观察的职能，同时也需要有一种先进的理念，一种美好的情愫，以及贴合读者的语言、版式和插图。

我是对文字有洁癖的。在《红树林》当副主编的时候，我为一篇文章中该用逗号还是句号，和我的主编从上午 11 点多一直争辩到黄昏，把旁人弄的都哭笑不得，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情。

记者：我们常说：是编辑和作者共同创作了一部作品。您认为编辑在这样的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邓康延：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作者投来一篇很好的稿子，但是里面又有一些文字缺陷，或者有些地方没有写到，需要补充或者删减。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优秀的编辑去与作者沟通，说明有些拖沓地方杂志会做删减，缺漏的地方请作者再加些素材。最后形成一份稿件，既能言辞通畅，又能充分表达内容。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当然，署名权一定属于作者，因为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职工作。

02. 作为纪录片制片人

记者：采访之前，我们观看了您制作的纪录片《盗火者》。我们认为，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材料”的创作。作为一个制片人，一个教育观察者，您怎么看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中国教育中的位置？

邓康延：我总能看到启动区图书馆上面写着，“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还有一个没写，是“文理融合”。我认为，这样的教育使命能够让国内的教育理念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为什么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呢？我们几千年来积淀下许多美好事物，唐诗宋词，《春江花月夜》和《二泉映月》，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传统中美好的东西。我认为它和现代的摇滚并不冲突，我也很喜欢听摇滚。“燃点”音乐节上，我也喜欢混到人群里一起摇摆。我觉得摇滚就是青春的。有人说秦腔就是古代的一种摇滚，我觉得挺有意思。它里面既有情感的宣泄，又有对听众的感染力，其中的一些词甚至还有教化的作用。很多时候，如果人们能通过音乐“和平地”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就没必要诉诸暴力了。

我的英语远远不及你们。但我觉得学好英语太重要了。因为从教育、从社会、从文学上说，近代以来东方做出的贡献并不多。

03. 作为媒体人

记者：真实自有千钧之力。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谁都可以传递消息，有时，同一家媒体报道的新闻也会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网络信息真假难辨，正负面的新闻层出不穷。您作为一名媒体人，怎么看待当今社会信息的交流碰撞？

邓康延：我想，从社会层面来说，只有把整个社会发生的所有事进行总结和梳理，用一种现代机制惩恶扬善，这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才能杜绝不幸，张扬美好。从个人层面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每一代人只有摸了烫的炉子，他才知道这个是可以烫出泡来的。一个人必须要亲身体验生活。你们这代人的生活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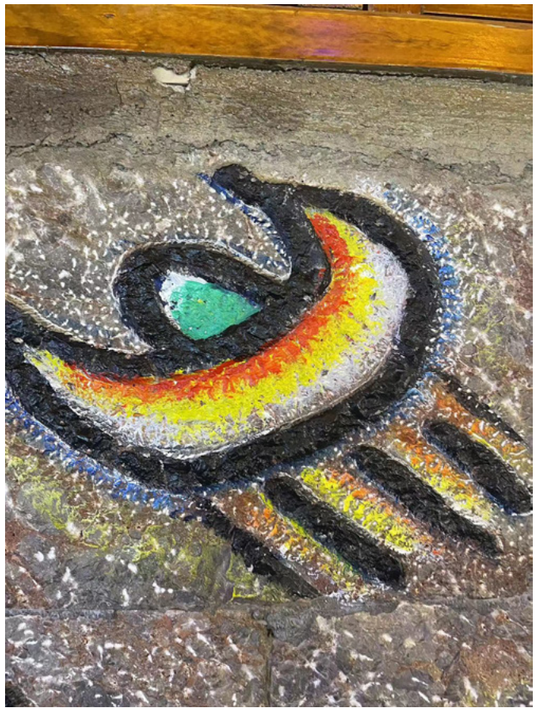
社会进步的一种指标就是其多元化的程度。我始终认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是给民众提供更多选择。

我下乡的时候，供销社里各种商品都只有一种：一种肥皂，一种饼干，一种酱油，一种酒，一种火柴，一种雨靴，一种手电筒，一种挂面，一种米、面、油。各种商品都只有一种品牌，完全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允许私营的资本和私营的企业去生产。当没有竞争的时候，饼干硬得一口能把牙咬掉，酱油越来越越淡，醋越来越不酸，糖里面也会掺杂糖精。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的动力。这个时候，饼干和个人是一样的，都一点点变得劣质起来了。正是改革开放焕发了国人在各方面的积极性，造成了社会产品的富足和人心的饱满，精神的肆意。此后，我们要出国，要去世界看看；我们去要去挖掘历史，要寻找真相；我们要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科幻小说，来充分发挥想象力；我们要去寻找到一种新的美学，新的人生，新的理想生活。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而我们在选择的同时，自己也要给别人、给我们的后代创造更多选择的机会。另外，在众生喧嚣之中很容易失掉自我。现在，抖音、小红书里的内容就像洪水一样涌过来了，鱼龙混杂，真正优秀的内容还是相对偏少的。因为它们会被很多经济的、商业的喧嚣淹没。

在实践中，如果你希望进步，你必须能够在沙里淘金。也许你不是金，但是你在沙里淘着淘着，和金混得久了，你也能镀一层金。

诗社在湖畔：被读的与被误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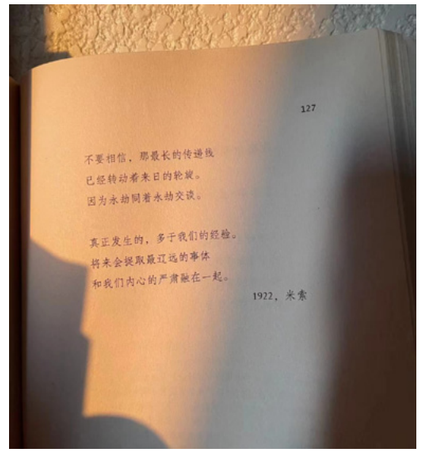
记者 / 林嘉译
编辑 / 张诗悦、洪悦彰



“误读”是一切作品的宿命吗？“偏见”是不可消除的误差吗？文学的创作和解读之间似乎从来都存在着某种鸿沟，将作者与读者分立在一部作品的不同区位，互相凝视，却没有触碰的可能。千人千面，不同的人对作品有着不同理解又好像是理所当然。今天，我们邀请涤纶诗社的三位诗人各自挑选一首自己的作品进行阐释，同时写下自己对于其他两部作品的理解，以期呈现“被读的”与“被误读的”一切。

01. Deblurring

作者：蔡子玥



躺倒在椅背，双脚离地
重力放飞你。从未厌倦这样的瞬间
磁场高度紧张，我们
将神经抛在风中，光合作用的脸
贴着脸，手也贴着脸，如同沉默
在我眼前振翅。甜美的剑锋
刻下足音之后，不再执着于削铁如泥

清晨顶灯爆炸，你慢慢浮出
温暖的电视雪花。拍打不再奏效
于是不能作证，过去和未来
曾如何晶莹地反对你
令锯齿变作金箍，紧紧地
分裂我们相连的双手，呼唤悬在一线
我们只是什么也没发生，然后拥挤在一起

个人解读：我的诗题就是我的全部解读了。

贾所以的解读：描述一种模糊的感觉，体现出精神的紧绷，偶然的放松却充满着空虚。捕捉了很多细节。

柯舒麟的解读：评论前的话：评论看似严厉，然而毕竟两位诗人都是我的朋友，而我以古今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诗的标准评判，所以批评多于赞美。两位诗人超出大多同龄写作者的才华，不必我多言。

很明显，诗人陷入了语言的狂欢，精湛的语言紧贴诗人的私人体验，以及某种算法技术（deblurring 与图像处理有关），然而精湛的语言并未揭示真实，仅止于某种形而上的舞蹈。诗人对人类灵魂里最核心的元素的关怀略显欠缺，不应使自己的才华止步于感觉。比喻、词语，陌生且纷至沓来，丝毫不见匮乏，反而源源不断，但正是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诗人，缺乏的（至少没有在这首诗里体现，或者被语言的泛滥埋没）关切，一种诗人的敏感必须察觉的“切肤之痛”的缺席，令读者因为精湛语言而生起的期待落空。

02. 杜鹃书店

作者：蔡子玥

你问我城市里看书的好去处
我一时说不出，昨夜下了雨
冒雨走进书店，防水布上的雨有塑胶味
那天摆在那个时代的书架上。当咖啡
与天气同谋，机器切割的纸张变得柔软
香气扑鼻，锋利不再，装帧得体

怀抱随时向你打开。贸然踮起脚尖抽书的男孩
不会被掉落的大部头砸伤脑袋
架子上更高的书也更早失去重心
翻页的时候也不像从前，像从地上拾起刀片
我只知道找寻新鲜事物的代价不再是划伤
当我走到你白裙的身后，放在嘴唇上
示意我安静的，不再是带血的手指

雨完全停下来，窗外的自然公园有杜鹃声
风撩动翠绿，窃窃私语，馥郁几株猩红色的沉默
一丛感染另一丛，溢出一双眼、一扇窗的真实
纸页吸收的雨声，单调、统一
湿度趋近饱和，冷却每一只耳朵

人免疫不了的，书店也是
我们反复读过的章节，将潜伏一两株病毒
源头不明的水化成雾，让生命赋予生命
死亡带来死亡——书店倒下
去处越来越少，无论是好是坏
一群我们仍然站在一个此处
找寻多于眼睛和耳朵的别处
2021.07-2022.11

个人解读：“季风诗会”的与会作品。翻新的书店欢迎真正的朋友前来，在阳光和海风充足的长椅上，阅读我生命里几度绝版的爱。

贾所以的解读：书店的意象跳转到刀片和血，形成一种戏剧性的张力。整首诗都体现了“过程”，始终都在从一处走到另一处，或是站在某处、寻找别处。这种动态赋予了诗歌以丰富的内涵。

蔡子玥的解读：一直不愿意去书面地解读一首诗，这可能跟我自己的写作习性有关：习惯感觉，然后感觉完了就基本上完了。这样的读者去为含有故事的诗歌写评论有点容易语塞。以往读这首诗走神的时候总觉得它的脉络很清晰，但当我不走神的时候，还是能发现美丽的跳跃和模糊，使其愈加香气扑鼻。告别和翻新有时同理。

03. 失语

作者：贾所以

意识到我身边的城墙时 我
正躺在床上 躺在我无间的朋友身边。
我看着她
她的脊椎是起伏的山脉
一层雪覆盖山脊
峭壁浸在水里

她温柔地侧身 眼睫下 藏着争吵
牢骚 怨怼 不满
闭合已久的瓷瓶打开
细尘扑面
我看见草原上筑起一堵白墙
她从墙里甩出一道闪电

穿起黑呢大衣 我走到寒冷的地方
发现寒冷远比想象更加寒冷
沿河走着 我看见成群的舞女在酒馆嬉戏
草原上长起座座城市

我爱的人在远方 首先我要跨越整个人类。
扣不动她心中的门
我要悄然地离去

个人解读：摹绘一种生活中琐碎的不满，“我”察觉到对方的怨念，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体现情感上的寒冷、人们在挣扎中渐行渐远的过程。

柯舒麟的解读：开头的文气有险峰突起的气势，“城墙”带来惊奇，揭示生活平缓的坡度下隐藏的深渊。“无间”来自于“亲密无间”，然而诗人的语感并未考虑到“无间地狱”、“无间道”这样的古今词语（来自古代佛经翻译和现代经典电影），会对读者的感受产生何种影响，处理不当。接下来是一连串（包括第一、第二段）的修辞，主要是比喻，而且是与开头的本体和喻体密切相关的意象，未免有“同义反复”之嫌。全诗措辞温婉，语言细腻。属于诗的惊奇局限在开头和结尾，中间更多是铺陈，假如适当删改，能更凸显诗意，更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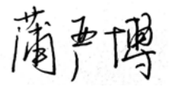
蔡子玥的解读：想到《九月》。想念人和想念山峦和草原也没有什么区别，千里迢迢地来和一声不吭地走，也没有什么区别。“她”是一种情绪麻薯，巨大、温暖的白细胞，可以用来代餐：留着“天待会再补也行”的女娲、你在二次元认的虚拟母亲、以及小部分可以任你拥抱的人类。不知道在说什么，笑死。

主编手记

这次主题报道的诞生实际上也来源于偶然的灵感——我们从原本具象的“音乐感觉”中抽象出了“创作”这一概念，并将它有用一种符号化而具体的形式——文字或图像来进行表达。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话题很难讨论——囊括的要素过多，结构很难拆分，清晰的逻辑难以实现，是否最后要传达出一个主旨要义也莫衷一是。但我很开心，因为我们最后用我们觉得合理且多元的方式进行了呈现。将他人的想法抽丝剥茧又组织成大家受用的形式，我们的这种行为是否也是在进行一种创作呢？我有种错位感——常常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编辑杂志既不被所谓的“纯粹创作”所囊括，又仿佛在某些时刻能够通过编辑、传递、呈现来融入一些所谓“个人思想”的色彩。当我在审阅那些采访文字、投稿文章以及评论时，我时常为他们在创作上的坚持所感动，为他们邂逅灵感降临的时刻而喝彩，为他们的作品萦绕的气韵而感叹。看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他们叙述，感觉到似乎不管创作是在何领域产生，他们之间总有共通的时刻。同时，也希冀我们采访创作者，了解感受者能引领更多同学走上创作的道路——当然这种创造并非狭义的艺术创造，而是对自身能力与热爱进行正向的对象化的呈现——如同黑格尔笔下的那重充满乐观的“异化”。探寻创作过程于其而言的意义，发现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产生的不同回响，当创作者是空谷传响时接收者的声音就如同群山回唱。

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害了“平凡恐惧症”——害怕自己落于人后、籍籍无名；害怕自己江郎才尽、庸碌一生；害怕自己的人生之结晶不足以著书立传、永垂不朽。这或许是我们要探讨“创作”的意义所在。创作它常常不是一拍脑袋后一气呵成的结果，而是熔铸了无数汗水、精力、时间、灵感后的结果。并且，创作者眼中“最伟大的作品”常有可能不被世人接受，被束之高阁；反倒是那些本人觉得是“平庸之作”的成果被端上厅堂。所以，创作它既是一种偶性，也是一种必然。但无论创作之路是鲜花铺满还是门前寥落，都请谨记：沉潜含玩，保持初心。

栏目中一直贯穿着一个明亮而黯淡的问题——创作是否是一种私人化的东西？抑或是当作品被产出之后作者即刻“死去”？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在选题会之时有同学质疑说：这个主题无法提炼出一个价值取向，无法拥有一个稳健而坚定的立场。但是或许创作就是这样一个见仁见智的过程，并非所有的主题都能提炼出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我们栏目组要做的并非强制性地定义“何为创作？”“何为灵感？”“何为传递？”“何为共鸣？”，而是将不同创作者、感受者的答案置于堂前，供人们考察——因为不同人阅历、积淀各异，但我仍然希望，不论是什么人、是否在创作、是否在品味他人的创作，都可以在多元的答案中找到自己的那一朵玫瑰。我相信，杂志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更应灵活地取舍，以期将最合理的展现给读者。



主编手记

写手记时，我还未从奥密克戎中康复，刚刚退烧，但鼻子嗓子和脑子都是难以描述的一股淤塞，只求一个痛快，能将所有沉疴宿疾一掌打出体外。此时接到要完成主编手记的任务，我心想：还不如接着烧下去，烧昏了就不必写手记。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做学生主编，怎能错过最后的收尾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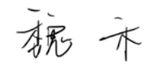
主题报道栏目在选题阶段原本有个很好的主题，但种种原因不能成行。我们最终敲定的这个选题给我的感觉抽象又晦涩，我在开会时还云里雾里——灵感？灵光乍现？创作？接收？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既然原先创作的选题不能谈，我们干脆谈谈创作本身。

读《文赋》时看到这样一句话：“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这是陆机对灵感的描述，好像是一股有意识的力量，它自我主宰，而你我只能等着和它不期而遇。它来的时候，创作畅快得像山风、自然得像泉水；它走的时候，创作就不必谈了。我们的板块——“维纳斯的诞生”，正是展示了灵感的“来”；灵感之后的创作历程，是“缪斯的奇幻漂流”，从创作者手中起航，不断被消解和添新；缪斯漂流至接收者处，反射出一千种奇异的光芒，就像一人呼喊，“群山回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创作羞耻”？比方说我偶尔写日记，当下觉得实乃真性情，回过头来总觉得伤春悲秋、自怨自艾；再比方说忽有所感，写出一大段文字，最后发现前人永远有更精妙的提炼，不禁疑惑自己的创作价值何在。那我们要因此就停止创作吗？我想说，不是所有表达都整洁、完美、有秩序。我已经在努力接受自己的成长，越成长越发现自己的普通和无知，于是也要努力接受自己的普通和无知。可是我的普通和无知的创作难道没有价值吗？在做这一期主题报道的同时，我个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那么希望也能为在创作的“门口”徘徊的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最后想说，我们这一次主题报道的编辑们都是很好的工作伙伴，感谢大家，感谢记者，感谢北海老师，感谢珠淇学姐……很幸运能和蒲严博一起做主编！没有小蒲时刻提醒着我 deadline 的逼近，这个板块也就 dead 了。此刻我得知她也“阳”了，祝她早日康复！^_^



Stories about
inspir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人　物

记 录 人 物 故 事

PEOPLE

重拾对数学的敬畏

—— 专访理工学院潘兴斌教授

记者 / 周诗璟
编辑 / 季伊忱
主编 / 匡子娴

潘兴斌

潘兴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教授，1987 年获山东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后在浙江大学任教，2004 年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2006 年 1 月受聘为华东师大终身教授，2007 年 12 月 31 日起任二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包括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变分问题，超导、液晶、电磁场的数学理论等。

潘教授主持的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 项、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等，已发表论文 98 篇。他关于表面超导数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1995 年合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四等奖，1997 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0 年入选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6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2 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9 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等奖提名）。

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后，潘教授专门为大一本科生开设《微积分精讲》系列课程，旨在为有志学习数学理论的同学提供进阶数学理论的教学和更加扎实的分析学训练。

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回忆里一定少不了“数学”。从小学的算术，中学的函数与几何，再到大学的微积分与线性代数，数学为学生们带来了太多的欢喜与忧愁。可是我们对于真正的数学研究，仍有一定的距离感。大概除了“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等家喻户晓的数学难题，大部分人对于数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并不了解。

本期人物栏目邀请到了理工学院潘兴斌教授，以及潘教授的几位学生，带我们重新认识数学领域的研究与学习。

一、偏微分方程：“描述真理的语言”

现代数学大致可以分为分析、代数、几何三个领域。潘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是分析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世界万物，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无不在时空中运动变化，考察这些运动与变化，往往可以用某些物理量关于空间与时间的变化来描述，这就是偏微分方程与方程组。因此偏微分方程是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潘教授如此形容偏微分方程。在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举行的“偏微分方程：分析、几何与拓扑的相互作用”研讨会上，潘教授引用了西汉刘安《淮南子 . 齐俗训》作为会议的结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而这句话恰好诠释了他对偏微分方程的理解。

在数学领域中，“线性”是一个相当良好的性质，因为它意味着对应问题易于研究、求解、定量研究。在常微分方程中，线性的理论已经得到了详尽的研究，并成为了数学本科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相对而言，偏微分方程中的“线性问题”复杂许多，但仍有许多对应的求解方法。潘教授指出，“数学家发展了各种求解偏微分方程的方法，这些方法往往只适合于求解线性方程。而我们的世界是非线性的，大量物理现象是非线性的。当不能求解时，需要研究方程的性质，了解方程的解的性质。至今，对非线性方程的一般性理论和具体方程的定性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依然有大量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偏微分方程的定性研究方法往往与具体的方程组有关，而这意味着在偏微分方程领域，不同学者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都会有很大差别。

说到偏微分方程领域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潘教授给出了坚定的回答：“与现实世界的深刻联系。”访谈中，课堂上，潘教授总是强调，往往是“先有数学，再有物理”。潘教授举出了两个具体的例子。其一是俄罗斯的物理学家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布里科索夫。他在研究金兹堡 - 朗道方程时，通过方程的局部线性化，求解出对应线性问题的特征函数。而这些特征函数的零点正是后来经实验证实的“阿布里科索夫涡旋点阵”。其二是物理学家皮埃尔·吉勒·德热纳。他在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中发现，一些不同的物理现象间存在数学相似性，所以研究简单的物理现象的方法，可以推广至比较复杂的物质形式。比如描述超导现象的数学理论，可以用来预测液晶的物理现象。而他也因此获得了 1991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数学结论与现实现象的深刻联系。

作为一名数学家，潘教授非常重视数学理论在现实世界的对应。他主要的研究兴趣是一些物理中重要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譬如支配超导现象的金兹堡 - 朗道方程、液晶的朗道 - 德热纳方程、电磁学中的一些方程等。“我目前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区域的几何与拓扑对偏微分方程的影响。我也关注不同领域的物理现象在数学上的相似性。”数学理论中的不同分支与领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对应着我们的现实世界。这些联系与对应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世界真理的形态，也成为了潘教授研究的一大主要动力。

二、数学研究：保持敬畏，走出自己的路

提及“数学之美”，我们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的关键词：对称、简洁、统一。不过，这些简单的概括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同数学领域研究问题、对象、及研究范式，都会有显著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也许会带来领域之间不同的“美”。

提到“数学之美”，潘教授引用了杨振宁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关键词：“敬畏”。杨振宁先生曾在《人物》杂志的访谈中这样说道：“对于自然的了解，当然是与日俱增的——可是这些与日俱增的里头的内容，比起整个自然界，整个这个结构，那还是微不足道的。你也可以说年纪越大，这种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感是越来越深。”对于数学领域，潘教授有同样的敬畏，也正是如此的敬畏让他拥有了对于数学的审美体验。事实上，潘教授指出，敬畏之情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素养”。

对于数学研究，潘教授同样有自己的心得。他指出，数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解决前人遗留下的难题，其二是发现领域内新的现象或规律，提出新的问题，并拓展该领域的边界。对于后者，潘教授以我校的倪维明教授为例，提到倪教授“在‘区域的几何对偏微分方程的影响’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先驱性的工作”。在千禧年初，潘教授也在他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自己的几个猜想，其中一个猜想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得到了同行学者的验证。“在这个领域里，要么最早，要么最好。”这是潘教授界定一个优秀的数学学者的标准，也是他自己的学术追求。

最后，潘教授强调了一名学者在领域内进行学术发展的基本准则：“走出自己的路”。不论研究方式如何，对于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某一领域有自己的观点或想法。

R × 潘兴斌教授

潘教授在偏微分方程论坛上致辞。理工学院 / 摄

R × 潘兴斌教授

三、数学教育：因材施教，培养分析能力

潘教授在教育上颇有研究。他所开设的《微积分精讲》系列课程得到了许多学生的好评，也为这些学生日后在数学领域的学习打下了重要基础。

对于教育，潘教授引用了徐扬生校长的一句话：“本科生教育是一所大学的最重要的质量指标（没有之一）。所以，我们要求每个学院最优秀的教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必须给本科生（尤其是一、二年级的同学）授课。”微积分，或者说数学分析，是数学本科生学习数学理论的重要基石。潘教授也因此对相关课程格外重视，并在长年累月的教学中形成了独到见解。

《微积分精讲》相较于普通的微积分课程，增加了更多的数学分析理论，并通过理论的学习与证明，训练学生的分析能力。“本校有相当多学生有理想、有追求，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其中有不少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优质课程，使他们更好地成长。另一方面，不断培养优秀学生的数学基础和素养，对发展我校的数学学科，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便是我校开设精讲课程系列的初衷。

事实上，潘教授的这门课程是数学系众多老师在“精讲课程系列设计”上迈出的第一步。“在倪维明老师和数学组其他教师的极力推动和不懈努力下，几年来，我校在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微积分精讲 I,II》这两门课程的设置，就是面向数学基础较好、敢于面对挑战的学生，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更多提升的可能性，并引导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学好数学，培养数学人才。”而除了这两门课程之外，潘教授对于日后的分析类课程，也有自己的想法。“今年倪老师主讲《数学分析精讲》。我们希望进一步建立精讲课程系列，并在今后设立荣誉课程体系，以利于更好地培养优秀人才。”

潘教授上课的模式同其他教授不太一样。他会提前上传当周课件，上课时详细讲解其中最本质的部分。潘教授解释道：“教学中要（兼顾）教学目标及学生的基础和学习能力，努力做到课程的知识体系合理完整，内容丰富，叙述清晰易懂，使学生容易学，容易懂，使大部分学生能掌握课程的主要内容；又为好学生提供更宽、更深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数学眼光、水平、能力。”课程会提供一些较难的材料和问题，供学有余力的同学在课后自学和思考，不过作业和考试的重点依旧是那些本质的以及简单易懂的内容。那些比较难的材料，按照潘教授的说法，是“心情特别特别好”的时候阅读的东西。

不过，就像任何一门数学课一样，同学们仍然需要做大量的习题训练。潘教授说：“教学中应当兼顾学生学习基础理论与训练解题技巧。到了大学，数学系的同学们仍然需要在题目的训练中逐渐掌握理论知识。

与之相对的，潘教授同样也会在题目的设计上投入更多精力。无论是课件上的例题，还是作业中的附加题，潘教授都会精心设计，力图以问题显现更加深刻的数学思想。潘教授同样提到，“考试应当注重考查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每次考试都应当设计新题。”他也是这样实践的。

相比于其他科目，数学考试证明更多，计算更少，所以问题往往没有标准解答，老师的给分依据是同学们论证逻辑的严密性。潘教授讲，“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数学知识和方法技巧，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论证和表达的能力，训练学生严谨的学风。”

在数学以外，分析能力和数学思维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潘教授对分析学有颇多见解，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互联网时代，搜索快捷与信息易得，将使下一代人普遍知识广博而浅薄，人人会套用公式，但不愿沉下心来深入学习以打好专业基础，因而往往缺乏新思想。一些学校的教育往往迎合这个趋势。我们现在要着力培养部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数学思维，使他们能提出新问题，提出新思想，才能让他们在将来与众不同，能面对未来的竞争，更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R × 潘兴斌教授

四、人师之善：春风化雨，以行动弘扬数学精神

在不少学生的眼中，潘教授平易近人，对学生格外关心。这同潘教授自身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教学不仅教课，还要关注学生人格、理想和心灵的培养。潘教授这样阐释：“教师不仅要做‘智者’，更要做‘仁者’，要对学生有爱心，关心他们的前途与目标，理解他们的困难。特别是这几年疫情不断，有些上网课的学生会有额外的困难，需要理解和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除了关心学生，潘教授更加重视以自身行动弘扬数学精神。“我们应当努力以自己对数学的热爱以及对教学的激情感染学生，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热情；以自己的敬业精神和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潘教授有时会在课堂上分享一些电影和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似乎或多或少蕴含着数学的思考。这也正是数学的特点：数学不仅仅是定义与命题的堆砌，更包含了与世间万物普遍联系的思想。

在大众的印象中，数学思想并非人人可得。谈及“数学的天赋”，潘教授并没有立刻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他并不能确定天赋对于数学学习的作用，现实中正面例子与反面例子都有不少。然而无论如何，潘教授相信，态度和主观努力仍然是决定学术产出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不会偏袒有天赋的学生，并且强调要在教育上尽力做到相对公平。“我们应当尊重学生，努力做到对所有学生公平，一视同仁。”

但潘教授也承认，不同学生在数学基础、学习节奏和学习速度上存在差异。潘教授指出：“对于优秀学生，指导他们加深学习，提高眼界，为今后的学习做准备。对基础差的学生予以鼓励和引导，指导他们改进学习方法，掌握课程重点，跟上课程进度。”这也是潘教授“因材施教”观念的另一种体现。

潘教授对于学生的关心也影响着他的教育方法。“时代在变化，每一届学生都有不同。教学方法相应要调整，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潘教授注意到，面对长期的网课学习，最近几届学生似乎会比以前的学生更加需要忍耐孤独。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不同届学生对于自己所在集体的认知也存在差别。相比于过去两届，这一届数学系的同学们，似乎对自己的数学水平有更高的自信。这些细微的差别，会让潘教授调整自己的授课方式和授课风格。

潘教授在理工学院迎新会上，为同学们讲解专业设置。理工学院 / 摄

R × 潘兴斌教授

五、师徒之间：学术漂流中的共同记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记者陆续采访了数学系的几位同学。他们分别是：大一的 H 同学，大二的 X 同学和 L 同学，以及大三的 Y 同学。他们独特的故事中，或多或少带着潘教授的影子。

大一的 H 同学很早就确定了学习更多数学理论的目标，并因此选择了潘教授的课程。而他也希望挑战自我，“我可能不是做数学研究的料子，但多学点数学总是没有坏处的。”他解释道。

半个学期的学习后，我问起 H 同学是否感受到了大学数学与高中数学的不同之处，H 同学笑着说道，“我觉得从第一个月开始就已经不同了。我们第一节课学的就是 epsilon-delta 语言（数学中的一种证明方法）。相比于普通微积分课程，我们更多是在思维本身上划一个缺口去进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实质的门在我面前：推开这个门，走进去，就是一个大学的数学世界。”

H 同学的数学之路才走了半个学期。相比之下，X 同学和 L 同学已经在这数学世界中漫游了一年，并确定了自己的专业。

X 同学最终选择了应用数学专业，可他也曾纠结是否要走其他的发展道路。X 同学高中参加了生物竞赛，对于生物建模等有一些兴趣，而这一块内容需要不少数学知识。所以进入大学后，他为了打好数学基础，选择了潘教授的课程。“我高中并不是搞数学竞赛的，对于选择数学是有些顾虑的，而（潘教授）这门课也不是特别容易，一开始有点跟不上。”后来潘教授告诉他，数学不像其他学科，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积淀期。“当时确实是有动摇的想法，想转去其他专业，比如生科（生物科学）之类的。但是后面感觉自己还能继续往下学，并且还是挺感兴趣的。”我问起他是否有意愿做数学研究，他说：“我觉得到后面是完全有可能的。我本科的打算就是一直学数学。”

L 同学的故事则更加富有戏剧性。在一年的学习后，他从金融工程直接转到了理论数学专业。在大学之前，他似乎便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从本科金融工程，到北美量化硕士，再到投行或私募的工作。“有一些直系学长和我说我们学校的数学专业是很不错的，所以我后来转到了潘老师的课上。”在几节课后，L 同学发现了数学的独特魅力。“我小时候其实是不太喜欢数学的，因为我很讨厌计算。”但是 L 同学提到，他喜欢理科内共有的“独立于经验的理性知识”，而潘教授的课程，正是将他从小到大对于理性美的热情激发了出来。

L 同学称自己是一个“咋咋唬唬”的人。他喜欢社交与热闹，在过去的一年里参与了各类社团、竞赛、学生工作等活动。但在一年的尝试与探索后，他还是更享受数学学习带来的正向反馈，并且也知道自己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潘教授最欣赏我的一点是我的一些很‘跳’的思维。他说，我的很多奇思妙想是有好处的，是值得培养的；或者说，我还是有适合学习数学的地方的。”

潘教授常常提及一位大三的 Y 同学。她在大一时常常去潘教授办公室问问题，而在大二时有许多学业上的优异表现，似乎也因此给潘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Y 同学在大二时选择了理论数学专业，而如今她似乎正在考虑一些应用的方向。“当时选专业时没有细想。我现在不打算搞理论数学了，打算做一点应用的东西。”她坦白说，不能继续学习数学，会让她有些遗憾，不过在大二一年的学习后，她也逐渐明白，自己也许并不适合继续走理论研究的道路。当然，她对于数学知识的掌握仍然出乎我的意料——她对于那些学过的数学定理好像如数家珍，并能够熟练地运用。虽然不再钻研理论，但她仍能熟练运用学过的数学定理。

不同年级的同学似乎都能感受到潘教授所开课程的重要之处。X 同学说道：“我觉得潘教授很适合教大一的课。一个很优秀的教授去教大一的课并不是什么大材小用。越基础的课，往往是越重要的课，也越需要优秀的老师做引路人。”而 Y 同学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大二和大三也一直在用大一的那些东西。大三那个勒贝格积分（大三的课程内容）其实和黎曼积分（大一的课程内

容）是差不多的算法。大一（的课程内容）其实是最重要的。”

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对潘教授的独特记忆。H 同学提到潘教授“用幽默的语言对冲宣告 quiz（小测）时间的情感冲击”；L 同学还记得潘教授展示的原创诗词和电影推荐，以及课上给倪维明教授“打广告”；X 同学记得潘教授以类似“开火车”一样的方式让同学们回答问题，调动课堂积极性；Y 同学记得潘教授用偏微分方程说明“跑步时女孩的马尾只会沿一个方向摆动”，以及“为什么操场都是沿着逆时针跑”。与潘教授的点点滴滴温暖着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让同学们的数学之旅更添生动和美好。

尽管同学们并没有在课程之外和潘教授有专门的联系，但每一次偶然的相逢都会留下记忆的种子。X 同学提到，去食堂吃饭时经常能碰到潘教授。“我们会找他抱怨数学分析（大二数学相关内容）的难度；他这时就会来安慰我们，说‘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学长学姐（由于课程改革带来的变动）都没学过这些东西。”他笑着回忆道。

有时潘教授也会主动联系学生。潘教授举办偏微分方程的研讨会时，特地给 L 同学发了一封邮件，说希望他去听听，因为“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其他人的研究方向”。而去年学校评选 Student Award（大学荣誉奖项）时，潘教授也主动为 Y 同学写了推荐信，希望她能参与竞选，赢得奖项。

所有参与采访的同学都表达了对潘教授的高度赞美。“他不仅数学专业水平高，还非常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各个层面的发展。”X 同学这样评价。而 Y 同学的回答更为坚定：“你大学期间碰到这样一位老师，你的大学生活就值了。”

在众多赞美声中，H 同学的回答与众不同。“我一开始听到学长学姐的评价全是正面的。我会觉得有些奇怪，就是真的有老师能做到零负面评价吗？因为其他老师或多或少地，因为个人风格问题，会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在半年的课程学习里，潘教授于他而言，有了更加立体的形象；而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你听到那样的评价之后只会留下一个印象。但真的只有是接触了之后，那种感觉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就只有正面评价了。”

潘教授在论坛上进行会议记录。理工学院 / 摄

R × 潘兴斌教授

R × 潘兴斌教授

六、结语：求索真理的修行

潘教授所面对的群体，即数学系的学生，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数学的难度，他们常常被拔高和崇敬；但在如今的评价体系里，他们似乎永远处在边缘。当同龄人早早开始科研或实习时，他们仍然需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随着时间推进，课业的压力、人生的抉择、前途的迷茫同时压在了他们的头上。他们还能相信什么？

“数学系的同学想要申请应用方向（的研究生项目），其实是很难的：我们科研不一定有其他学科的同学厉害；我们课业压力也很大，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东西。”Y 同学坦白道，“……就是说，那种感觉，不是很好。”

刚进入数学系的 X 同学和 L 同学也感受到了与同龄人的脱节。X 同学看到同龄人早早接触科研与实习，感到了不同专业带来的同辈压力。而跨专业的 L 同学也压抑住了自己躁动的一面，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在数学学习这条漫长的路上，他们需要一个指路人，帮助他们沉下心来，坚持走下去。

也许，潘教授不仅仅研究数学、教授数学，更亲自背负了发展这门学科的使命。他需要发现更多对于数学有兴趣的同学，并鼓励与支持他们从事数学工作，尽可能缓解他们的焦虑，排除他们受到的干扰。

潘教授很像一代数学教授的精神缩影——纯粹，敬业，思想深刻。Y 同学和我说：“我觉得，数学系的老师，都特别好。”她也明白，学习数学的人本身也对这门学科有相当的热爱，这些人一般都不会特别功利。

H 同学也认同：数学本身即会塑造它的教学者和工作者，因为“它是一门特立独行的学科”，而它的学者也会有相应的使命。“数学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它必须要被走完，中间哪一步崴了脚都是会走不下去的。”H 同学说，“潘教授应该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你真正想走这条路时，他会给你指出来这条路应该怎么走。”

无论是潘教授，还是这些数学系的学生，他们都在进行一场漫长的修行——没有那么多荣誉和利益，只有数学真理带来的近乎残忍的真诚；而正是这种真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之贡献自己的智慧。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理由保持着对数学的敬畏。

寻找书本外更大的世界

—— 专访医学院叶德全教授

记者 / 周凯怡
编辑 / 温诗玥
主编 / 匡子娴

叶德全

叶德全教授是 77 级大学生，1982 年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完成临床医学本科，1984 年就读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1988 年获博士学位。自 1989 年起，他先后在 Scripps 研究所及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并于 2010 年回国工作。在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他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药学院院长，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华医药研究院副院长。从 2019 年 2 月起，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建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参与筹建医学院，现任医学院科研副院长。

叶德全教授长期从事医学、免疫学和药理学教学与科研，其研究课题包括趋化因子 G 蛋白偶联受体的功能，经 G 蛋白偶联受体启动转录因子 NF-κB 的信号通路，急性时相蛋白和炎症反应的关系，以及炎症细胞在阿尔兹海默症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迄今为止，他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 SCI 论文 220 余篇，在国际免疫药理学界获得良好的认可度，受邀担任多项学术职务包括美国 NIH 项目评审专家及多家主流期刊的编辑工作。

叶德全教授与本刊记者交流中。刘烨州 / 摄

生物学家、大学教授、学院院长——这些头衔让叶教授成为一个自带着光环的人。在校园中，我们总能看到叶教授现身各个学术研讨会，作为演讲者或主持人，抑或是看到叶教授出席在荣誉颁奖典礼上作为获奖者或颁奖嘉宾。然而，在这些荣誉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褪下光环，在学术与书本之外，叶教授又看到了怎样更大的世界？

科研初心——以基础科学研究推动临床医学进步

作为一名学有所成的生物学家，叶教授学术道路的起点其实是临床医学。怀揣着治病救人的初心，他本科就读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作为一名医学生，他在实习期间接触到很多病人，参与他们的疾病诊疗过程。“像肿瘤、内分泌失调等疾病，在如此精密复杂的人体里，治疗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寻找那些副作用小、效果好的药物是疾病治疗的重点难点。”叶教授由此回忆起在医院实习阶段及毕业后作为住院医生的工作经历，包括在一个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案例中，他从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及康复随访等阶段完整地见证了一个病人的康复。这是终身难忘的经历，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多疾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而诸如新药开发等医学上的突破，其问题源于临床，却要通过基础科学的进步得到答案。于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决定去海外读博，希望通过生物学基础研究推动临床治疗手段的进步。

坚持着这一初心，叶教授的研究领域大多与疾病相关。在读博阶段，叶教授的论文研究聚焦于纤溶酶原的活性调节，这与脑梗、心梗等疾病的治疗密切相关。在博士后阶段，叶教授的研究领域转移到细胞与分子生物学，聚焦于细胞器中代谢异常所导致的疾病如葡糖脑苷脂沉积病（Gaucher’s Disease）。获得独立科研教职以来，叶教授将研究重点放在免疫学上，从事天然免疫细胞活化及炎症机制研究三十年。回国后，叶教授开展了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这一课题的研究，建立急性肺损伤、慢性肠炎、阿尔茨海默症的小鼠模型。疫情暴发后，叶教授迅速组建团队开展针对病毒的研究，和杜洋教授团队合作制备相关抗体及检测试剂盒。这也给叶教授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灵感：病毒何以利用其自身的蛋白及人体细胞表面的受体蛋白引发人类的疾病？发生在上皮细胞中的局部免疫如何在人体

R × 叶德全教授

免疫机制中发挥重大作用？叶教授对这些问题都有着研究兴趣。

对叶教授而言，生命科学最有魅力的一点在于生物的多样性。叶教授说，很多低等生物的结构虽然非常简单，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一代代繁衍不息，对于这些生物的研究能够极大地帮助科学家发展新的医疗手段。以病毒为例，人类与病毒共存的历史悠久，从流感病毒、SARS，到现在的新冠，研究病毒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研究一个病原微生物本身，更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疾病，从而开发有效的治疗手段并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疾病提供预防手段。叶教授提到，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研究古人类演化的科学家，而与此相关的古生物 DNA 提取、PCR 扩增等复杂过程的体系建立，在抗疫期间的核酸检测、病毒检测上也有着相关的应用。因此，即便是针对人类疾病的医学研究，也无法忽略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因为它们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教育使命——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

完成博士论文后，叶教授面临三种选择：在大学任教、前往生物高科技等工业界发展、备考美国执医资格证书。叶教授并没有忘记他到美国读博的初心——以基础生物医学的发展推动临床医学的进步。因此，他选择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十多年，期间叶教授在 Scripps 研究所做过研究员，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担任过教授，而后回国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在澳门大学做讲座教授。之后，叶教授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建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参与筹建医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已于 2022 年 2 月并入医学院。

对于叶教授来说，学院院长的身份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如何设计难度适宜的课程，如何帮助掉队的学生，都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事情。疫情暴发后，叶教授也曾苦恼过如何为线上同学开设实验课。为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抗病毒免疫机理，他与白芸老师在 2020 年暑期共同开设了免疫学课程。彼时学生们对于固有免疫及获得性免疫等概念尚不了解，他和白老师认真地准备了课件及考卷，甚至临考前一天还试做卷子，设想同学们对题目可能产生的疑惑，尽量做到表达清晰并把考试内容控制在作答时间范围内。

作为一院之长，叶教授认为做好院领导最基本的要素是带着想法，知道自己想要把学院建设成什么样子，项目实施的顺序是怎样的，碰到困难了要如何去解决。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药学院院长时，叶教授将工作重心放在学术氛围的营造上。一方面，他将部分课程改为英文授课，并告诉同学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需要注意的事项，加快国内药学研究与国际化接轨的进程；另一方面，他也对药学课程进行重新设计，增设更多专业核心课程，对已有课程进行完善。叶教授希望能通过自己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完善药学的教学体系，让学生全面发展。

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之后，叶教授感受到了这所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格外享受和学校里年轻的老师、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当他和本科生在一起交流时，他常常能够感受到学生们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欲，每一次交流都是与学生们共同成长的机会。有时晚上他在办公室读书，偶然间就会想到一些问题，于是找到学生，时常感觉到学生们充满着想法。当实验遇到问题的时候，叶教授也会与团队中的同学共同讨论出解决方案。不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叶教授都希望能将他们推到“driver’s seat”上。随着学生们不断地成熟，他们具有更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愿意去承担责任并出色地完成任务。

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加强同学的社会实践经历是当下叶教授尤为看重的一点。很多同学认为暑假应该留在学校里多修读一些课程，然而叶教授认为，大学四年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包括自己适合做什么、兴趣点在何处。若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社会实践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在实验室跟着老师们做科研、实习、支教、旅游等等”，他还提到，在美国很多学校在暑假会收回宿舍，而学生们大多数会在暑假去做义务劳动，或者打工赚钱，很少人会留在学校。在叶教授学习临床医学时，也曾经去到上海崇明县中心医院实习，从中发现基层的医疗条件、药物储备、疾病的特点等都与大城市有所不同。叶教授说，学院没有开设很多暑期课程，也是为了鼓励同学们在暑假多出去看世界。除此之外，叶教授提到，学校也为同学们搭建了诸多社会实践的平台，如现已建立的十几个实训基地。如果同学们能够了解社会的需求，再回到课堂后，也会更有学习的主动性，明确自己想要获取的知识。

叶德全 / 摄

叶德全 / 摄

寻找生活真趣——与自然来一场拥抱

除了忙碌的学术研究与工作，在生活中，叶教授也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回忆起在美国读书的时光，叶教授说，夏天的时候他会带上橡皮筏去河里漂流、在河岸上烧烤；冬天的时候则会带着自己的冰鞋去公园一角的溜冰场上溜冰。在天气不冷的时候，叶教授也会去学校旁边的森林公园骑自行车。在国内上学时，叶教授也曾和同学去北京旅游，骑着自行车逛遍北京城的景点。

现在，叶教授虽不似学生时代有着大把自由的时间，但他仍然会抽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近一个月来，叶教授会打开电视观看世界杯直播，工作繁忙的休息间隙，他也会找来进球片段欣赏。工作中，叶教授常常需要在深圳各处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和团建活动，利用这些机会，叶教授也去过不少深圳好玩的地方：有风景宜人的莲花山，也有历史悠久的大鹏所城……

摄影是叶教授一直以来坚持的爱好。由于采访过程中需要摄影记录，采访之前，叶教授考虑了画面背景、光影效果、人物布局等因素，最终才选定了一个靠窗的位置作为采访地点，从中也能窥见教授在摄影上的专业性。带着科学家的习惯，叶教授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就一定要搞个明白。所以，他也十分享受和学生在兴趣爱好上的交流，但由于工作的繁忙，叶教授拍摄的很多照片没有时间做后期处理。他笑着说，等到退休，一定要一张张精雕细琢。

从大学毕业后，经过短暂的住院医生培训，叶教授回到他所喜爱的学术环境，之后几乎从未离开过大学校园。叶教授说，能够跟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一起走过大学之路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自己也格外珍惜跟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光。同时，叶教授也谈到，自己很羡慕现在的同学们拥有港中大（深圳）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台和无限的机会。他希望同学们既能充分利用现在的学习条件，不局限在校园中，看到更大的世界，又能够不因外界的诸多诱惑而分心，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寻得平衡。

做一个有温度的向导

—— 专访经管学院杨世杰教授

记者 / 谭芷韵
编辑 / 季伊忱
主编 / 匡子娴

杨世杰，厦门大学学士、硕士，香港大学金融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负责本科生财务会计入门课程。

杨世杰

相较于中文名字，杨教授更愿意别人称呼自己为 Kenny，以拉近师生关系。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是他留给同学们最深刻的印象。让我们走近 Kenny——一位平易近人、给人温暖、和蔼可亲的教授，感受这位同学们眼中的良师益友恪尽职守的教学热情和冬日暖阳般的人文关怀。

讲台上的“目光收割机”：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倾心打造课堂

“我讲的好一点，就可以节省你们自学的时间了！”

Kenny 未满 30 岁就成为了大学教授，但年轻的他并不是无瑕的。从一开始的青涩稚嫩、缺乏经验到现在的游刃有余、淡定自若，Kenny 一直在尝试补足自己的短板。回忆起第一次上讲台的经历时，Kenny 坦承自己作为一个“社恐人”，也经历过“台前紧张综合症”。但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与日积月累的总结，如今的他在讲台上挥洒自如，收获了同学们的信赖与认可。展示报告是我校众多课程的学习任务之一。Kenny 说，“有同学和我说，他们害怕做 presentation，认为自己做不好。我读书那会儿也是一样。但其实这种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获得的，经验不足没有关系，只要准备充分、多加锻炼，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表现得更好。就像作曲家在上台前先把谱子写好，自己反复演奏觉得没问题，相信观众也会喜欢，那么上台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信心把它演奏出来。对我而言，讲课其实就是一种加长版的 presentation，需要做的准备就更多了，但其实过程是大同小异的——反复地练习，上台，总结。慢慢地，经验多了，自然就变得简单了。”

Kenny 的课堂好评如潮，很多其他班的同学也会选择旁听他的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Kenny 的 PPT 制作精美，很容易吸引住同学们的眼光。为了解决教材 PPT 通常所存在的背景单一枯燥、内容与教材高度重复的问题，Kenny 下了一番功夫修饰原版 PPT，比如换一个亮色的模板，让同学们上课看着心情好一些。他也会基于教材课件上知识点的逻辑，调整内容的顺序，避免平铺直叙，对没有必要的或过于细节的内容进行删减，对于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做适当的过渡，让同学们更容易接受。每讲完一学期，Kenny 都会总结与反思，对 PPT 和课程内容做适当的调整。虽然这样备课会在时间上花费较多，但他觉得这也是作为一名老师的职责。

Kenny 课堂的另一大魅力在于生动性。Kenny 认为，“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师负责扮演旧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桥梁。”桥梁的作用是衔接和传承。因此 Kenny 在给学生讲授新知识的时候，常常会用播放短视频这个接地气的方式引入，让学生们觉得学习会计不是枯燥乏味的体验。比如，在展示腾讯音乐公司的财务报表前，他会播放一个公司简介视频，介绍这个公司除了音乐以外的其他业务，以及这家公司跟其他国外类似音乐流媒体公司业务上的区别。当同学们看完视频对这个公司有一定了解之后再去看报表，自然会轻松许多。Kenny 打趣道：“要是我一上来就给他们看报表，那他们肯定都睡着了！”

Kenny 在课堂上。

Kenny 在学期末和同学们的大合影。

照亮学子心灵的“灯塔”：指明学子前行的方向
“我觉得自己的职责不单是一个 NPC，而是可以有感情和温度的。”

R × 杨世杰教授

Kenny 和同学们一起吃饭、交流。

Kenny 在“蒙面歌会”上与学生共同完成歌曲演唱。摄影 / 逸夫书院

在同学们眼中，Kenny 是一位亲民的老师。他经常会与同学们在校内星巴克、一瓯茶等地相谈甚欢，也会在考试结束后约上同学们一同在学校唱 KTV。作为一个腼腆的“社恐人”，亲民这一特质在他身上显得更加的独特。不过，他通常聆听得多，讲述得少。Kenny 说：“其实来找我聊天的同学心里已经有规划了。他需要的是我给他一个认可，告诉他这个规划是正确的、可靠的，然后他就会坚定地走下去。”Kenny 觉得和学生们聊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交流过程中，他感受到学生们怀揣的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也体会到他们被各种规划裹挟时内心的纠结与彷徨。

作为经管学院出了名的暖男教授，Kenny 总在点滴中给予同学们温暖与治愈。他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在考试前会发邮件提醒他们早点休息，好好吃饭；在考完试的夜晚和出成绩的清晨，他也会发邮件结合自己的经历，鼓励同学们积极乐观地看待成绩，静待花开。Kenny 这一性格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Kenny 说：“我父母和学校的老师对我特别好，他们常常为他人着想，很愿意为子女和他人付出，从不计较得失。在这种环境下成长是十分幸福的。慢慢地，我也变得和我父母及老师一样，主动地把温暖传递给大家。”学生时代，他倾向于担任学习委员，相比于班长这种存在度高的角色，学习委员更多的是承担背后辅助的角色。成为教授后，Kenny 认为他仍是一个服务型角色，只不过这回服务对象成了学生。他说：“看过《失控玩家》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角色非常像里面的 Blue Shirt Guy，穿着蓝色衬衫去上课，俨然一副新手村 NPC（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现多指“向导”）的样子，带领大家完成新手任务。但我又觉得自己不单是一个冰冷的 NPC，而是可以有感情和温度的。同学们的迷茫和困扰，我读书的时候也曾有过，所以明白，如果能得到他人鼓励和支持，会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Kenny 温暖，爱笑，时刻充满着正能量，总给人一种气定神闲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每天都是元气满满的，他与我们现在饱受焦虑等负面情绪困扰的大学生一样也会有低落的时候。Kenny 认为，在对抗负能量之前，先要弄明白负能量的来源。“负能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生存时空受挤压。比如说，过去的人一天工作 8 小时，人均住 50 平米的房子，现在的人一天工作 12 个小时，周末还需要加班，人均住 25 平米的房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很难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2022 年 11 月 15 日，全球人口突破 80 亿，可以说人类的生存空间是越来越狭窄的。这种时空的约束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加剧了负能量的产生。”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用正能量去抵抗负能量，而是找到自己负能量的源头，然后逐一消除这些负能量。

R × 杨世杰教授

Kenny 为我们提供了克服负能量的三个方法。首先是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是需要慢慢开拓和积累的。大部分人都想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以免自己受到负能量的侵袭。这无可厚非，因为这对于保持身心健康很有必要。然而，若只停留在舒适圈当中，生存空间就难以开拓，久而久之还可能会失去维护自己舒适圈的能力。因此，人还是应该适度地突破自己，去营造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扩大自己的舒适圈。“就比方说，当你刚来这个学校，你觉得宿舍是你的舒适圈，走出宿舍之后觉得这个世界都很陌生。但如果你在学校逛熟了，你会觉得整个学校都是你的家，走到哪都很舒适，这就是因为你的舒适圈扩大了。”就像韩东的诗所描绘那样：无数次经过一个地方，那地方就变小了，街边的墙成了家里的墙，树木像巨大的盆景；但是人啊，也要在周遭的景物变得陈旧之前，多去看看世界。

Kenny 的暖心邮件。

Kenny 在摩洛哥旅行时遇到黏人的猫咪。

其次是锻炼自己的承压能力。当一个人走出舒适圈之后，随之面临的可能会是挫败感。大部分人都有想要为之努力的目标，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付出有所回报，但结果却不一定如自己所愿。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容易感到焦虑，或者缺乏追求的勇气。“其实失败是常有的事情。举个例子，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并不需要投资百发百中，或许成功投资的个案只有 60%，就已经足够战胜市场和大多数投资者，而且个股持有的时间越长，中间的波动和噪音的影响就越小。因此，失败并不一定会带来负能量，只要我们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客观地总结和分析，就可以为下一次的出发积蓄能量，所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年轻人不要害怕失败，要相信自己潜力无限。”

然后是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假如说前面两点都是为了消除负能量，那么这一点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自己的精神力量。人的精神力量虽然不总是坚不可摧的，但足够强大的精神力在关键时候总是能带领我们绝处逢生。正如 Kenny 所言，“精神力量的获取来自于很多方面，或是源自心底的自信，或是亲人和朋友们的支持，或是知识的力量，或是兴趣爱好的治愈，又或是广阔的世界。总之，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个体，也是一个精神的个体，假如物质世界暂时缺乏容身之处，那就去精神世界遨游一番吧！在那里，你会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

结语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授的角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还在于启迪人生。正如 Kenny 所言，他欲成为一个有感情和温度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向导。讲台上，他热情洋溢，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以生动的方式呈现会计知识；教室外，他化身学子心灵的灯塔，在学海中为迷茫的学子照亮前行的路。春风化雨，Kenny 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坚定的初心；玉壶冰心，Kenny 用温暖的人格诠释着对学生深沉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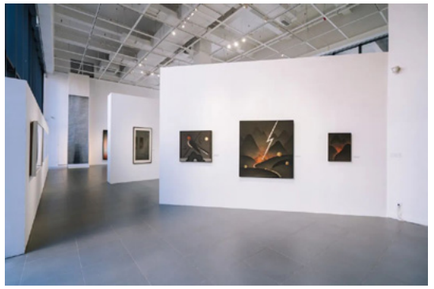
魏祥奇：做艺术的摆渡人

—— 专访“水墨更开新象”策展人

记者 / 唐诗怡
编辑 / 张艺骅
主编 / 董楚珮

魏祥奇

魏祥奇，1983 年生于安徽砀山，2013 年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他执行策划的展览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 2019、2021 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文化和旅游部 2016、2017、2021 年度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展览项目；入选 2016 全国中青年视觉艺术策展人赴美策展工作坊、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度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项目。



《水墨更开新象》展出现场。PC/ 摄

“走进 TC101，此刻，来到一个水墨的世界。在这里，传统和现代交织碰撞。站在张诠画的无名古塔前，你能在留白中看见历史的深邃，在驻足中凝望历史的遥远。再向左望，立轴山水图气韵古雅；走近细看，发现笔墨之间暗藏宣纸的烧痕，一点生机映衬雅致。你继续走，让眼睛慢慢看。来到上海浦东的夜景图前，你停下了脚步。画面中红白黑光影交错，你的思绪被万千饱满而富有质感的粒子裹挟，也映射在繁华浦东的画面之中。在这里，有旧的气韵与新的生机，有老艺术家的守正与青年艺术家的创新。水墨不仅仅氤氲在宣纸之间，它是一束光，带着传统的意象和符号，追溯着变化的时代；从过去照进现在，光的力量在壮大，它一直在延伸，延伸到看不见终点的远方。水墨，会一直开新象的。”

2022 年秋天，“秋日焕新”文艺季主题群展——“水墨更开新象”为大学增添了不少景致与意趣。走进 TC101 展厅，就是在与艺术品沉浸式对话，在对话中感受古典与新潮的相互融合，体会传统绘画形式水墨在当代的生机发展。在展览背后，“策展人”作为艺术的摆渡人，于大众而言，既陌生又熟悉。在艺术展览里，艺术家与作品常是目光的焦点，而鲜有人留意到策展人这个角色。但对一个成功的展览而言，无论台前幕后，策展人的身影都无处不在。现在，我们把目光放置更远的远方——与策展人魏祥奇老师对话，去了解一个优秀成熟策展人的成长历程，聆听他和艺术之间的动人故事。

从象牙塔到艺术园

魏祥奇老师最初踏上美术艺术研究的道路，算是机缘巧合之下的“误打误撞”，一不留神就撞开了艺术研究的大门，闯入了艺术的新天地。2003 年报考大学时，他原本填报的是广州美术学院的版画创作专业，因为勾选了服从调剂这一选项，他最终被录入了美术史专业，从此走上了美术艺术研究道路。2003 年到 2010 年的这 7 年里，魏老师在广州美术学院沉淀自己，默默耕耘。到 2010 年，他决定北上去攻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博士毕业后，魏祥奇老师到中国美术馆任职。回看魏老师的教育经历，从本科到博士，学历纵深；从广州到北京，地域纵横。时空变化，艺术沉淀愈加丰厚，理论基础也愈加坚实。

而十年前走进策展行业，更像是属于他的机缘之机缘。2011 年，当时有一个东京画廊的老板，致力于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北京有一家自己的画廊。由于他常年在中日两地奔波导致管理画廊的时间不足，再加上他对与当时的画廊合作人的合作不是特别满意，所以他决定再找一位合作人兼画廊管理者，以寻求更满意的合作。正当此时，由朋友引线，魏祥奇结识了这位东京老板，抓住了这次合作机会，并在 2011 年，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策展，真正踏进了策展这个领域。一年后，魏祥奇与杭春晖合作策划了“工·在当代”展览，展览主题是通过展出中国工笔画作品，来展示中国工笔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生态。在那时，年轻的魏祥奇并没有急于扩大策展的数量。他收敛锋芒，把时间留给自己去适应，去思索，去沉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于一个刚进入策展领域的青年策展人来说，要面对在业界名气和公信力不够显赫的现实，也要面对业界资源不够，无法与更多优秀艺术家匹配的事实。所以他在职业起步阶段，一步一步地探索，走得踏实而沉稳，逐步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R × 魏祥奇

策展是一项相当庞杂的工作，工作量大，细枝末节多，持续时间长。从收到策展邀请开始，到展览闭幕结束，中间有着一系列繁杂的流程，例如确定展览主题，挑选展出作品，汇总展览艺术家个人资料，建立展览模型，把控艺术家作品运输时间，布置展厅，媒体宣传推广，开幕和进行现场导览，以及进行后期的学术活动和公教活动。然而，光靠这一整套流程，一个规范的展览才初现雏形；要做出一个优秀而动人的展览，还需要策展人着眼细节，精雕细琢。

魏祥奇会根据展览的需要或面向群体的不同，来设计不同风格，调整不同年龄阶段的艺术家参展比例。更加细致的工作，例如选择一件作品的摆放位置，确定作品之间的间隔距离，都需要策展人不断地调整、比对，只为给看展人最舒适的视觉效果。对待每一个展览，作为策展人的魏老师皆是如此，怀揣着专注认真的谦卑之心，打磨每一个展览，渡越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界河，把艺术作品成功地“渡”到每一个看展人面前。

2015 年，魏老师的策展之路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主持策划了“面向未来”的水墨精神主题展、济宁市美术馆开幕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展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大展等众多优秀大型展览。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6 年到 2019 年举办了四届的“青矜计划”——历年优秀作品展。“青矜”一词取自曹操《短歌行》“青青子矜”一句，意为渴望得到有才情的青年贤俊。该计划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的平台，通过展出青年艺术家的优秀艺术作品，让优秀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知晓，以提高青年艺术家的业界知名度，为他们的艺术天赋和才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提到“青矜”计划，魏祥奇老师脸上露出自豪又欣慰的笑容。截至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共展出了 236 个青年艺术家的 556 件艺术作品。

魏祥奇之前也经历过“初入行业”的阶段，深知策展的行业生态，“在这个行业里，扎稳脚跟，建立名气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计划算是一种外界帮助，帮助他们成长，为更多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机会，对此，魏祥奇是感到很欣慰的。回望自己 2011 年后的策展历程，他感慨道：“2011 年走出象牙塔，到今天，差不多有 10 年的策展经历了。前 5 年应该是一种积累。在一次次策展中历练，同时在艺术研究领域和写作上达成一定成就。后 5 年，将所学的所掌握的充分地运用到实践中。”在 10 年时光里，魏祥奇将他的策展工作真正地当作一幅工笔画卷，细心地描摹勾勒。

做鲜活的策展 争渡时代故事

魏祥奇尤其满意的作品，是一个关于绿水青山主题的展览。当时主办方向他提议，可以从展示浅绿，水墨，青绿等绘画色彩入手策划。听完主办方的提议后，魏祥奇不禁思考，主办方的提议还是停留在展示绿与青这些色彩的表现上，比较浅，还不够深入。是否能给绿、青色彩之上增添更加宏大的意义？或者说，是否能让这一主题既展现绘画色彩，又能让其介入历史，介入时代，介入生活？如此一来，青绿色彩将会跃出纸面之上，走进时代，并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张力。这样一来，“绿水青山”主题展便也“活”了起来。有了灵感启发，魏祥奇赶紧搜集资料，寻找着和绿水青山有关的人，事，物。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他看见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人民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民”。这使得他灵感涌现，想到从讲一个故事入手，就讲绿水青山与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故事，策划出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展览。由此，他确定了展览的副标题，就叫“不负青山”。沿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线，魏祥奇细细地梳理了国家在各个阶段对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人多土地少，国家实施的“开荒运动”让万顷荒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地；20 世纪 50 年代，“治理黄河水灾，开发黄河水利”被提上议程，治理后的黄河两岸绿树林立，粮产充足，重展一派新象；70 年代，国家大力建设三北防护林，重在植树造林，绘画秀美家园……他把这段历史分成“开荒、防护、建设、新貌”四个主题进行展览。以时间为线，以四个小主题为珠，宏大的叙事就这样被巧妙地串起来，新中国建设与绿水青山的美丽故事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一个优秀的策展人来策展，其实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魏祥奇非常敬佩老艺术家巫鸿。巫老艺术家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理论修养。“他有一本书叫《纪念碑信》，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书中就提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建筑。巫老说，建筑的存在是为了永生，为了纪念”。在魏老师看来，建筑和展览这类静态的东西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为了纪念，为了永生。如何让静态的东西活起来，如何让它更好地记录，不妨挖掘展品背后的时代意义，历史背景，让作品变得“厚重”起来。当它能够走进生活，走进历史时，说明它“活”起来了，这样的展也更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策展是鲜活的，它理应要参与到时代的建构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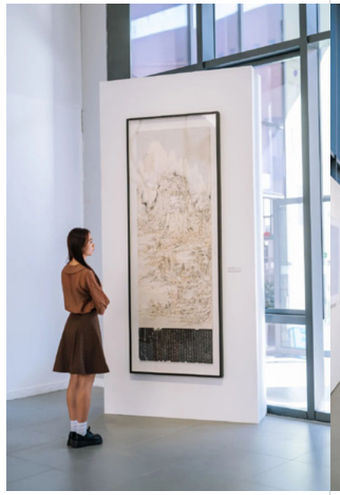
魏祥奇认为，优秀的策展人应当具备四种素养：“第一点是有一种正确的，宏大的历史观。自己研究的艺术史领域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是历史的精华。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认知境界都很高，具有世界眼光和广阔的胸怀，这是我很认同和钦佩的。第二点是写作能力，文字是延续的重要途径。把事物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可以让它们流传下去。第三点，是要具有坚实的，丰富的艺术史理论知识。有了理论基础，我们在品鉴作品的时候，才能搞清楚它的源流，历史背景等。最后一点，作为策展人，肯定需要良好的工作协调和沟通能力。我们知道策展包含很多繁杂琐碎的工作，如果不沟通好甚至做甩手掌柜，最后展览达不到最佳效果，也辜负了看展人和为作品付出很多心血的艺术家。” 做一个优秀的策展人其实不难，做好手头的每一件小事，下一件事来了也能做好，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优秀的策展人。这便是魏祥奇老师朴素却深刻的策展心经。

东方艺术和世界艺术的摆渡人

此次校内的展览“水墨更开新象”，展示了青年艺术家笔下的水墨具有的意趣和创新。当然，在魏祥奇老师的巧思下，展览还选取了三位老艺术家的作品。两代人的艺术作品交相辉映，散发传统和现代融合的光芒。水墨发展到当今，既带着传统的东方符号和意象，也融合了西方抽象和带有较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是“引进来，走出去”的成功范例。鲁迅先生曾说过“艺术要走向十字街头”，魏祥奇老师很赞同这句话，他认为“坚守传统”并不代表着“停滞与自封”。“回看水墨这四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从现代水墨到当代水墨，水墨绘画既吸收了西方绘画思想，也保留了可贵的、源于本体的东方精神。无数艺术家为此付出努力，最后顺应时代的号召，让东方水墨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中国艺术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水墨更开新象”的名字也极富深意。“更”、“新”带有一种递进意味，这也正好切合这次文艺季主题“焕新”二字。这也意味着艺术如同浪潮，代有才人出，年轻的艺术新秀们将会让水墨更加创新，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欣欣向荣和蓬勃的生命力，也正契合未来东方艺术的发展。在交谈过程中，魏祥奇老师还笑着说：“其实这个名字也契合了你们大学生的状态呀！是新的，是会更新的！”

从“青矜计划”到“水墨更开新象”，青年一代艺术家蓬勃发展，我们也看到魏祥奇老师作为过来人对青年艺术家寄予的殷切期望，致力于把青年艺术家渡上岸；同时，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策展人和艺术学者，魏祥奇老师身上的使命和担当熠熠生辉。他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态度，策划鲜活的展览，书写时代故事，诠释东方精神，为东方艺术走向广阔世界的历程上刻下注脚。他是策展人，是艺术领域的学者，是具有“匠人精神”的艺术家，更是艺术的摆渡人。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倦地摆渡，这岸是艺术，那岸是时代：此岸是东方，彼岸是世界。

当你站在展品前，你的心境随着画面飘远，画面的图象映射在你的脑海中。为之你产生了思考，你联想到了过去某一时刻的场景，细小的却又无比触动人心的；抑或某种感受，喜怒哀乐种种情感都矜贵无比，短暂的却又撼动着思绪的。这便是你与展品间无声的对话。在魏祥奇看来，这是看展最有意义的地方——看展人领悟，思考，并将自己的心境投射作品之中。这是看展人宝贵的收获，也是对策展人的一种致敬。



王天德《麓台怀古》，贴近古典山水观察视角。PC/ 摄

张诠《无名塔》，展现新朦胧艺术画派对东方文化符号的反思。PC/ 摄

创业路上的双生子：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

—— 专访 Apartsa 学生创业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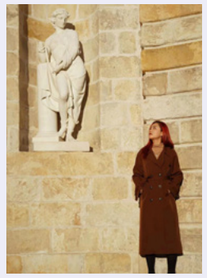
记者 / 唐可馨
编辑 / 温诗玥
主编 / 匡子娴

简介

Apartsa 创业团队于 2017 年正式成立，是一个整合并分享传递优质海外学习学术生活信息的留学社区平台。团队希望成为新时代海外学习的引领者，连结所有一同前行的海外学习者，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记录、分享并传递自身海外学习生活经验与体会的社区平台。

Apartsa 的工作内容以留学经验分享为主，包括线下学长学姐分享会，海外大学主课相关介绍，及线上留学相关的资讯干货。目前团队共有队员 40 余人。

喻喆 2018 级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曾任职设计部长，现任团队负责人



蒋亦涵 2018 级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前任团队负责人

为更好地关注具有潜力的创新型青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新创意创业中心（CIDE）利用平台优势，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一站式支持体系与交流平台，支持并孵化出多个创业项目，从这里走出的许多优秀努力的创业团队，在校园之外的更大世界，勇敢地放飞他们创客的梦想。我们找到其中的一个创业团队，希望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挖掘出创业过程中的细节与经验，以期给更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以参考和借鉴。

一、契机：加入 APARTSA——寻找突破自我的可能性

学生记者：你们加入 APARTSA 的契机是什么？

喻喆：我是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对设计一直很感兴趣。大一大二期间，我在学校内已经接触了很多跟设计和营销相关的活动和项目，积累了一些设计相关的经验。在大三暑假期间，我开始思考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这时，我又恰巧了解到了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设计这样的工作。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想尝试着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相关的实习需要准备一些相关落地项目的作品集，而我没有这样专业性的工作经历。十分巧合的是，我刚好看到了 APARSTA 通过邮件向全体同学发布的招新推送。推送中，APARSTA 可以为新成员提供产品设计的机会，这刚好契合我的工作需求。所以我当即就决定参加 APARSTA 的面试。

蒋亦涵：即使当时 APARTSA 运营情况不佳，但我认为加入 APARTSA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APARSTA 作为一个已经运营了两年的创业团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资源。我不接手，就意味着我没有办法接触到资源。比如 APARSTA 的公众号，它在我接手前就已经有几千的粉丝量了，这意味着我发布的文章会有一定的阅读量。我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寻找合作方，为我下一步的计划开拓新的资源。

二、决策 & 风险：和 APARTSA 一起——在争论与协商中得出最优解

学生记者：团队工作运营的过程中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决策，而每个决策背后又蕴藏着风险。作为一个学生创业团队，APARSTA 是如何进行决策的？你们是否为此有过争论？如何看待这些决策所需承担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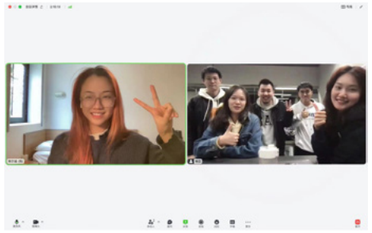
喻喆：在一个团队成长的道路上，团队内部因为某项决策而产生争议是正常且普遍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决策分歧发生在 2021 年的创新大赛准备阶段。因为我们参赛时间较晚且比赛经验不足，所以当时压力很大。在这样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相应地也会更加激烈。在方向性的问题上，成员的想法出现很大的分歧。有些成员强调产品的完成度，看重结果，而其他成员则会认为产品规范性的研发流程更加关键，重视步骤。因此，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节奏和步调上存在一定的矛盾。经过充分的小组讨论和协商后，最后我们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一步步慢慢走。不论结果如何，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Apartsa 产研团队在 CIDE 进行小组讨论。（从右至左分别为喻喆、孙煜晖、朱伯源、卞颖轩、金利莹）Apartsa 爱随想团队 / 摄

三．困难 & 成长：陪伴 APARSTA——找到痛点，摆脱局限向上发展。

学生记者：APARSTA 遇到过哪些困难？

蒋亦涵：我加入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足。在我接手 APARSTA 的时候，整个团队算上我自己也只有两个人。因此，当时面临的最紧急的任务是招募新的团队成员。但招募过程并不顺利，首先是招募成员的水平问题。APARSTA 作为一个学生创业团队，与校内其他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会更高。但在招募初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很难找到各方面都符合我们标准的同学。其次，人才的流失率很高。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加入到 APARSTA 的团队成员中，很多因为对 APARSTA 的期望值和实际工作体验值有比较大的落差，而选择在几个月后辞职。



蒋亦涵（图左）虽身在法国，仍经常通过飞书与团队成员在线上沟通工作 。Apartsa 爱随想团队 / 摄

学生记者：作为 APARSTA 的负责人，你认为 APARSTA 的成长体现在哪些方面？

蒋亦涵：首先是我们团队的壮大。一开始只有两个人，后来成员慢慢增加，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位成员了。其次是团队结构和管理制度的优化。在 2020 年的时候，APARSTA 部门较少，只有四个部门：市场部门、技术部门、设计部门和运营部门，整个团体架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在这两年，我们对 APARSTA 的部门进行了细化，增加了一个行政性质的部门。同时，我们针对前次人才选拔和流失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人才招募培训和管理体系。

喻喆：在一些对外的业务上， APARSTA 也做出了很多改变。2021 年时，APARSTA 主要是维持着一个公众号的运营，和开展技术研发，那时，我们还没有完成度非常高的产品项目。但今年 8 月份，我们上线选课农场、毕业纪念册等小程序，推出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比如留学经验分享会和糖炒栗子派送。后续，APARSTA 有计划推出一个学长学姐人脉网和品牌社群的新产品。这些都是 APARSTA 在用户的沟通方式和渠道拓展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同时，我们运营的公众号在推送内容上也有所变化，我们希望尽可能使内容多元化，并且为我们的目标受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前，我们会比较单一性地聚焦在留学和海外生活方面，现在，推送主题的多样化也是 APARSTA 的成长的一个方面。

学生记者：在 APARSTA 成长的过程中，两位也在不断成长，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收获吗？

喻喆：我对自己成功加入 APARSTA，并最终担任总负责人这个过程，还是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起步时是零经验，能力也不足，没有很大的优势。2020 年 9 月，我才正式开始接触项目，在平面设计的工作上帮忙。2021 年，我开始亲自跟进三四款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比如毕业纪念册。随着在 APARSTA 时间越来越长，我自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平面设计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组织管理能力也显著增强。我想这是 APARSTA 带给我的一些硬件上的收获。

另外，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在创新大赛结束后，我也进行了一些反思：我们之所以没能最终在创新大赛有一个完成型的产出，是因为我们在决策时缺少产品研发里面特别经典的 MVP （Most Variable Product）思维。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你要造一个运输工具，你第一个要做的不是要造一个轮胎出来，而是你要做一个模型出来，做一个能满足你的运载需求的简易模型，比如一个小推车。之后，你再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去优化成品，去造车，去造更高级的运输工具。也就是说，所有东西不是全部准备好了才能开始，而是要不怕犯错地先把第一版本产品做出来，然后不断地听取用户反馈，根据他们的反馈，去不断地迭代。通过一次次地迭代，最终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完善的产品。而当时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想把所有的准备都做好，直接造一辆汽车出来。这样一来，我们跳过了前面的环节，缺乏 MVP 的思维，所以，就会造成缺乏成就感、没有成型产品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在思维上的一个收获。

最后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收获是针对我个人心理成长方面的。2021 年创新大赛结束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包括一些 APARSTA 创业工作方面的困扰。当时我是有认真思考过：我是不是到了该离开 APARSTA 的时候了？在踌躇期间，我和一个在读硕士的学长进行了一些沟通。他当时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Ambiguity is possibility”，意思是模糊其实也是一种可能性的体现。你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的时刻，也可能是你处在一个突破自我的临界点。这句话给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最终选择 GAP 一年，用这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些我自己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我去了一家我朋友开创的唱片店做一些店铺管理、品牌运营的工作。同时，我也决定继续留在 APARSTA，完成我手中的项目和产品。

现在回头看我在 APARSTA 度过的日子，不能说所有探索都是值得的，但我们不必过于纠结它在当下是否有意义。因为这个意义的体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暂时没有体现出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是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突然在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地方体现出它的价值。总的来说，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如果觉得自己想要把它做完，你就继续坚持下去，不用特别纠结。

喻喆在 Apartsa 爱随想 2022 年 10 月全体大会上发言。Apartsa 爱随想团队 / 摄

蒋亦涵：在喻喆犹豫是否离开 APARSTA 的那段时间，我也感觉我们团队还有我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我感觉到我们团队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而作为当时的负责人，我也自认为我的管理效率不够高。同时，成员们的积极性也不强。这就导致很多时候还是得我自己亲手去做非常多的 dirty work。另外，还有很多商务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处理与合作方的关系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合适。在面临团队压力的同时，我还面临着学业上的一些压力，如标化考试和留学申请。这些团队和个人方面的问题都令我非常头痛。

在这期间，我有去跟其他的比较成功的团队 leader 、一些指导我学业的教授、包括我的校外导师去交流，他们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在备考 GRE 的同时，我也在反思自己在 APARSTA 团队管理上的疏忽和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调整。逐渐地，我发现出现成员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办法达到团队成员对 APARSTA 的期待值。这个原因背后其实隐藏了很多细节的原因。比如，我们管理的制度存在问题，但去改变这种情况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会倾向于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其实，我之前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到应该从头去整顿这个管理制度，但我潜意识知道这远远比改一篇推送要难很多。所以，我就会无意识地去用很多我比较擅长的事情把自己的时间表给填满，造成一种自己很忙的假象。但是我心里始终在逃避，不愿去做一些我可能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事情。但这段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把根本性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解决困惑你的具体问题。所以，即使知道困难很多，问题很棘手，我们也必须克服自己潜意识里的逃避心理。我想这是我在 APARSTA 一个很大的收获。

Apartsa 爱随想 2022 年 4 月全体合照。摄影 /Apartsa 爱随想团队

喻喆在 Apartsa 熊抱挑战活动现场。

寄语：APARTSA 想对你说的话——抓住机会，听从本心

学生记者：对没有工作经历或未曾创业的同学想说的话？

喻喆：在校生如果想提升自己的能力，尝试实习和工作，学生创业团队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学生创业团队能够获得很多难得的机会，因为学生创业团队是非常开放的。如果你想体验新媒体的工作，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运营团队；如果你想做一些市场细节采访，或是市面上的热点资讯的追踪，或是校园周边的商业资源的对接，那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市场团队。总的来说，你可以在学生创业团队中得到各种机会，体验真实的工作场景。

蒋亦涵：我们团队有很多在大一时加入的成员。我认为作为大一新生的同学，能够加入 APARSTA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是在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才了解到 APARSTA，并慢慢参与进来的。而对于一个大一新生来说，在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时，能主动寻求改变自我就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所以，我很欣赏这些敢于尝试和挑战的同学。另外，我认为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做这个选择是兴趣使然，还是从众心理。我觉得两种心态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建议同学们还是要听从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果想找到一份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就要多向内心的自己发问，而不是左顾右盼，亦步亦趋。

i 思享

课程启迪　思辨延展

From in-depth
learning to
creative thinking

CLASSROOM DISCOVERY

风云变幻的年代，显赫一时的家族。于尘烟中缓缓翻开厚重的历史之书，轻抚上个世纪写就的一笔一划。埋没已久的家族故事逐渐显露，从遥远神秘的岁月那头向我们走来。追溯家族史，我们意识到，并非只有伟人才能写就历史，每一个人，都走过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以下是来自刘熙越同学在通识课程《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论文中的家族历史追溯。

刘己达家族史：传统士绅在时代变迁之下的盛与衰

作者 / 刘熙越
指导老师 / 彭永昌
主编 / 吴一鸣

一、引言

刘己达是笔者的曾祖父，江西宜丰人，1901 年出生于北平，书香门第，仕宦人家。通过祖父刘容美（刘己达次子）的口述和对宜丰同乡作者的考据，笔者整理出时代变迁中刘己达的生平经历、家族资料并写就此文。作为近代以来宜丰天宝墨庄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刘己达的经历刻画着传统士绅在社会巨变下的艰难转型，从以耕读立家到“开眼看世界”，从盛极一时到销声匿迹，百年一梦，兴衰之间，刘氏家族的命运被颠覆性地改变，士绅阶层最终成为历史的遗音。

二、正文

（一）耕读世家

1901 年，清政府已陷入摇摇欲坠之地，清廷统治者却仍欲通过新政挽救危亡。《辛丑条约》的签订，昭示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家国罹难，正是这一年，刘己达在北京出生。

1905 年，中国历史上延续 1300 多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刘己达身处的墨庄刘氏家族随历史的潮流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墨庄刘氏家族虽地处赣西北相对封闭的天宝辛会村，明清以来，却有进士 11 名，举人、解元等 76 名，武举 11 名[1]——人才培养上的成就离不开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先祖刘式藏千卷书为子孙立业的典故激励着迁徙至各地的墨庄子弟。“耕仁获义者，墨庄之实也；擢秀敷荣者，墨庄之华也”[2]，“耕”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支撑族人以“读”作为毕生志向勤勉向上。在天宝，通过科举入仕或经商积累财富的家庭尤为重视近亲子女的教育，有能者则致力于在乡内开设私塾、学堂、义学以帮助更多的乡人达文知意、读书明理。

刘己达出自高祖刘如玉长子刘宝名一脉，刘宝名五子皆考取功名，长子刘步衢、三子刘焕衢、四子刘庆衢皆中举人，五子刘殿衢是江西省秀才第一名，刘己达的祖父刘云衢则中进士，在北京做官[3]。对于刘己达的父辈，获得政治、经济地位的方式无非是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然而风云陡转，原有的上升路径随着封建社会的颓败而不再通行。

维新变法运动以来，向西方学习已渐渐成为部分开明官宦、士绅阶层的共识。一方面，新政颁布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另一方面，美、日、英等国为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积极吸纳中国留学生。身处在新旧交融的岔路口上，高祖刘如玉作为宗族领袖人物，并未如他的同乡乡贤胡思敬那样固守旧学，而是选择顺应时局，积极推动家族转型[4]。刘如玉次子刘宝寿一支刘天衢、刘康衢、刘望滨三兄弟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东京高等警务学堂进行修读。同族开拓性的做法激励了墨庄子弟

[1] 邹心平：《铸就天宝古村往昔繁华的关键力量是乡绅论》，《农业考古》2018 第 4 期，第 105-113 页。

[2] 邹心平：《略论天宝古村特色文化》，《宜春学院学报》2018 年第 8 期，第 64-70 页。

[3]《江西宜丰县天宝乡辛会市墨庄刘氏简谱》，内部资料。

[4] 龚浩晰：《浅议近代赣西北传统仕宦家族的成功转型——以宜丰墨庄刘氏为例》，《宜春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1 期。

讀者信箱 實行捨去較多的月薪 劉己達

《生活》周刊读者信箱中刘己达的来信。

大成数据

积极接触新学教育，转向学习法务、财经、农学等实学知识。与此同时，留洋学生、新式学堂毕业生逐渐构成了各地政府重要的人才储备，地方政治对人才的需要为墨庄刘氏的成功转型提供了契机。

（二）弃教从政

清末社会，是否接受新式教育是决定个人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许多与墨庄刘氏相似的士绅阶层迫切地吸收外来知识并运用于政治实践[5]，但从政，对刘己达而言却实属偶然。

19 岁的刘己达通过考试进入江西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后转入江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法知识。1922 年，刘己达回到家乡天宝小学任教，随后于天宝培根职业学校担任校务主任。培根职业学校是江西省最早的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由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的墨庄子弟刘化成在 1919 年创办，其名源于校训“培养自食关吾分，根荒由来自尔成”的首字。学校一改旧私塾讲授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的惯例，仿照西方学制，开设自然、历史、地理、化学、园艺等西式课程，不仅为墨庄刘氏子弟提供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还吸纳宜丰县及周边各县的乡绅子弟。后来，这里的毕业生大多成为江西行政官员，成为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6]。跟随刘师舜任职于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刘衡初的最高学历正是培根职业学校，得益于学校在国文和英语方面的扎实教育，刘衡初对外交部的各类事务应付自如[7]。身为教员之一，刘己达曾带领一百多名学生前往县城游学。在宜丰城北的殷贤祠，乡人胡慎武见到过刘己达对学生们进行讲话[8]。

然而，1927 年，培根职业学校发生重大变化[9]，刘己达不得不放弃教职生涯，向外谋求发展[10]。初到南昌，为了便于浏览图书，他放弃外交部的高薪，找了一份大学行政处书记的工作，期间还曾向《生活》周刊投稿分享对自己工作的满意，说明职业对改良生活的作用[11]。

随着北伐战争打响，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一路北上攻克长沙、武汉、南昌等华中重要城市。原本追求艺术化生活和学问研究的刘己达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偏安一隅，国家动荡下，通过革命维护统一才是唯一出路[12]。1927 年下半年，他加入了国民党左派，成为江西省党部秘书。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过程之中，纵然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建立共和国的目标，两党各自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目标和发展方向，难以弥合的内部矛盾致使合作走向失败。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政变，同年 7 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反共。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内部形成统一。1929 年，蒋介石下令通缉国民党左派人士，刘己达不得不向北逃亡，寻求家族的庇佑。

（三）黄金时期

1932 年，刘己达回到江西，担任中央党部干事，并被选为国民党省党部候补委员。1933 年，蒋介石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康泽欲在国民党成员中招募教授党义课的老师。刘己达意识到这正是自己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于是自请前去担任课程导师。在讲课过程中，康泽发现刘己达文采斐然，口才甚佳，便对他十分器重。1936 年，康泽被调往四川，刘己达也随之前往，担任简阳县县长。正是在简阳，刘己达遇见了他的第二位夫人——鲁玉兰。

1938 年，刘己达从四川回乡，时任江西省长熊式辉欲借刘己达与康泽的关系压制赣南势力，便命刘己达担任赣州行署专员治理赣州。刘己达虽为一介书生，但也决心干出一番事业。然而，赣南的局势十分复杂，粤军入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地方势力赌博、嫖娼、吸鸦片……几近无恶不作[14]。一次，刘己达下令逮捕吸食鸦片的保安队大队长，此举反倒激怒了当地的保安团团长，团长扬言要捉拿刘己达。刘己达在 1939 年前去南康县检阅壮丁时，保安队趁机对刘己达进行人身侮辱并加以软禁。恰逢时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参与检阅仪式并从中调解，刘己达方能脱难。此事后，刘己达威信已失，蒋经国则接手赣南专员一职。

1940 年初，熊式辉提出展开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倡议，任命回到南昌的刘己达任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一职[15]。从巅峰跌落后，刘己达又一次凭借自己才华，顺应国民党对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走上职业发展的快车道。1941 年，刘己达成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党报《江西民国日报》社长，兼任江西省参议会秘书长。1943 年 10 月，国民党党部改选，刘己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并被特聘为江西宜春青年中学的名誉校长。1945 年抗战胜利后，刘己达随同报社回到南昌继续任职《江西民国日报》社长，并被委任为江西省地政局局长。

[13]

（四）孟尝在世

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的墨庄刘氏子弟拥有现代化的知识与思维，另一方面，他们也保有传统士绅的责任与担当，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士绅不仅是乡的代表，也是民众的依靠。

刘己达在家乡有“孟尝公”之名[16]。刘己达不吝于对家乡人给予帮助，经常对有需要的乡人送上名片，凡是写信到刘己达单位、请他介绍工作的家乡人大多如愿以偿。亲戚到南昌上学时，刘己达会将他们收留在家中安排住宿[17]。在赣州任专员之际，刘己达从村中带领一批乡民赴任，并将他们安排在各个关键部门。后来任地政局长时，他又通过举办地政测量培训班插入一批家族子弟[18]。曾经采访过刘己达的《赣西国民日报》记者，与刘己达仅是一面之缘，采访的两年后，他拜访刘己达并请求其介绍工作，虽无法进入人满为患的《民国日报》，但这位记者最终也在吉安的《民治日报》谋得了职位[19]。

刘己达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1933 年，刘己达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贫民生活》[20]《小贩生活》[21]，从宜丰老百姓的生活出发，详细地描述了贫民和小贩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遭遇的困境。“谈到宜丰的贫民生活，简直可以说是‘挖肉补疮’，……小财阀更比强盗还厉害。每年四月的时候农事正忙，一般农民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不得不四处告贷或是上年借款。”文章的字里行间皆是对农民、小贩的同情与对财阀地主盘剥的不满。刘己达曾在《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论述过土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从地权、租佃、地价、田赋、垦荒等方面提出治理措施[22]。1948 年 10 月 10 日，担任地政局局长的刘己达，计划下一年预定赣县征收土地三万亩，宜丰两万亩，扶植自耕农二万五千户，他期待自己能够改变农业方面的基层工作[23]。

（五）黯然离场

1949 年春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军大部分被共产党歼灭，预感到局势不妙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下令省政府所属机构迁往台湾。刘己达本有机会随国民党离开，却因挂念家人与故乡，加之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劝说，他径自回到了宜丰县天宝村。然而，时局急转直下，7 月 15 日，宜丰解放，天宝成立旨在肃清国民党势力的“剿匪反霸委员会”。刘己达未曾料到自己会如此迅速地成为众矢之的，他不禁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是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还是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尽管预感到曾经身为国民党官员的自己未来将要承受无数打压，刘己达还是选择回到南昌，作为前地政局局长，将当时中国仅存的一套进口测量仪器交给了人民政府。

与他会晤的正是当时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邵式平劝刘己达到北京去进行学习改造。刘己达受到了同学的鼓励，便从南昌前往北京。在此过程中，刘己达感受到北京的政治氛围异常紧张，于是借夫人及儿女在沈阳为由前往东北，后一路逃亡香港。事实证明，刘己达的担忧不无道理，当时南昌监狱中关押着的旧法官徐日彰和原南昌市中山堂管委会主任蓝仲和已在积极揭发刘己达的“罪行”[24]。当年与他共处赣南司法系统圈子内的宗族子弟刘兆燊、刘兆德分别在 1952 年、1954 年忧虑成疾，病逝于家中。刘师旦在南昌“落网”，写下认罪书后被判刑四年。刘扶青、刘兆菊因被认定为“敌伪军政特警或地方恶霸”被判死刑[25]。民国法律人的兴盛景象，随着原有的政府崩溃、新的政府建立而戛然终止。

去还是留？站在今人的视角，建国以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可能令刘己达和刘氏家族陷入万劫不复，但历史的轨迹又有谁能预判？

[5]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41-62 页。

[6] 龚浩晰：《天宝墨庄刘氏士绅文化的近代传承》，《地方文化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42-49 页。

[7] 龚浩晰：《浅议近代赣西北传统仕宦家族的成功转型——以宜丰墨庄刘氏为例》，《宜春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1 期。

[8] 纯武：《刘己达其人其事》，《宜丰文史资料》第 3 辑，政协江西省宜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 年 8 月，62-66 页

[9] 具体变化已不可考。

[10] 刘己达：《实行舍去较多的月薪》，《生活》1927 年第 2 卷第 49 期 ，第 383 页。

[11] 刘己达：《实行舍去较多的月薪》，《生活》1927 年第 2 卷第 49 期 ，第 383 页。

[12] 源自对刘容美的口述访问，访问日期 2021 年 12 月 14 日。

[13]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年，第 242 页。

[14] 饶伟新：《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学术月刊》2007 年第 5 期，第 139-145 页。.

[15] 傅伯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年。

[16] 纯武：《刘己达其人其事》，《宜丰文史资料》第 3 辑，政协江西省宜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 年 8 月，第 62-66 页

[17] 源自对刘容美的口述访问，访问日期 2021 年 12 月 14 日。

[18] 龚浩晰：《天宝墨庄刘氏士绅文化的近代传承》，《地方文化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42-49 页。

[19] 纯武：《刘己达其人其事》，《宜丰文史资料》第 3 辑，政协江西省宜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 年 8 月，第 62-66 页

[20] 刘己达：《贫民生活》，《生活周刊》1933 年第 1 卷第 10 期，第 3-4 页。

[21] 刘己达：《小贩生活》，《生活周刊》1933 第 1 卷第 7 期，第 3-4 页。

[22] 刘己达：《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江西政治》1948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17-20 页。

[23]《赣扶植自耕农选定两县试办》，《申报》（上海）1948 年 10 月 10 日，第 3 页。

[24] 龚汝富，龚浩晰：《民国江西法律人成长的地域范本研究——以宜丰县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99-107 页。

[25] 龚汝富，龚浩晰：《民国江西法律人成长的地域范本研究——以宜丰县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99-107 页。

（六）客死他乡

尽管逃过一切来到香港，刘己达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不仅未谋得一官半职，还因不谙粤语和英语无法找到工作。为了维持日常的生活，刘己达只能依靠自己的文才，持续“爬格子”，并将文章投给各大报刊以赚取微薄的稿费。

1962 年 8 月，刘己达的堂弟刘敦仁欲前往欧洲学习，从台北搭乘飞机，再经香港中转。刘敦仁的父母因担忧敦仁初次离家远行的安全问题，早早写信，请身在香港的刘己达代为照顾。在刘敦仁的印象中，堂哥是“国民党风光一时的大吏”，而刘己达在香港的处境却令他唏嘘不已[26]。独自生活在香港的刘己达，定居在一处名为“钻石山”的地方，“钻”是动词，而“山”是一个被贫民窟包围的矿石场。据刘敦仁回忆，当时刘己达带着他来到一间远离繁华的寂静小屋，小屋以铁皮为顶，十平米见方，一张铁皮床仅容一人屈身，床边是一张堆满报刊的小桌，两条长椅横在门边。那夜，刘己达让舟车劳顿的刘敦仁睡在床上，自己则在两条长板凳上躺到了天明[27]。

1966 年 11 月，刘己达终于获得国民党当局批准前往台湾。国民党政府中官位人满为患，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的刘己达，在国民党中人脉早已尽数失效，唯有依靠在公路局工作的族内堂弟刘汝达才得有栖身之所。刘汝达的祖父是刘己达祖父最小的弟弟，这样的亲缘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淡薄，可当时他们却视彼此为同宗同族，惺惺相惜[28]。

1977 年 11 月 20 日，刘己达在台北和平医院去世。

（七）寂静无声

在刘己达前往香港后，刘己达大女儿审美一家负责照顾刘家近亲，后刘己达长子宏美与审美一同留在沈阳，刘己达的二夫人鲁玉兰与刘己达次子容美回到江西，依靠亲族接济与担任幼教勉强生活。年纪较长的审美于厦门大学会计系顺利毕业，审美的先生也从西南联大毕业，但作为“反革命”后代，年纪较小的宏美、容美都因身份问题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无法进入大学学习。

文化大革命中，刘己达故居被抄，尽管家中已一贫如洗，仅存的铜制水烟壶、雕花铜盆等生活物件仍被一并没收。1974 年，容美的长子克然在南昌出生，鲁玉兰在公安局监视下前往南昌迎接家中的新生儿[31]。曾经光耀门楣的士绅家族史，被淹没在生活琐碎之中，隔绝于当今时代之外，终归沉寂。

在历史的洪流之下，作为传统士绅家族子弟，刘己达学习法政实学、增长见识，从乡内教员成为行政秘书，最终在国民党时期的江西政坛取得一席之地。随着共产主义的崛起，广大工农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人民民主专政将登上历史舞台。刘己达所代表的士绅阶层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旧式的宗族观念、裙带关系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理应被改造并取代。刘己达作为法政人赖以生存的执政基础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其资产阶级改良式的土地政策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士绅阶层的兴盛是顺应时局的结果，而士绅阶层的衰落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

[29]

[30]

[26] 刘敦仁：《怀才不遇的地政局长刘己达》，《天宝古村先贤小传读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5 月。

[27] 刘敦仁：《怀才不遇的地政局长刘己达》，《天宝古村先贤小传读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5 月。

[28] 刘敦仁：《怀才不遇的地政局长刘己达》，《天宝古村先贤小传读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5 月。

[29] 家族照片，原照题字“十月十三日为卅三年前结婚纪念日半生光阴共经忧虑谨留此以志鸿爪 刘海澄杨振坤仝记”。

[30]（二排右侧为刘己达，二排左侧为刘己达夫人杨振坤，后排中间为刘己达二夫人鲁玉兰，前排左一为年幼的刘己达次子刘容美，前排左三位刘己达长子刘宏美。）

[31] 家族照片，原照题字“审美自昆来函索宏美近影摄此帧以寄 民国三十五年还都纪念日刘己达志”。

[32] 源自对刘容美的口述访问，访问日期 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三、后记

印象中的祖父，总在提到曾祖父时兴致高涨、侃侃而谈，笔者也曾经不解于祖父对于往事的沉湎与过度想象，但循着历史慢慢探索，才发现刘己达是那样神秘，他像一个符号，象征着显赫一时的家族，象征着一段风云变幻的时代，尽管他从未出现在今人的视线中，却深深地影响着每位亲人。刘氏亲族虽远悬海外，却时刻挂念着家人，他们遵照刘己达的遗愿，将其遗骨从台湾送回江西并安葬在南昌市青山墓园。曾祖父的故事虽仅存于书信、文献与照片和故人的记忆中，但他的壮志，他的安贫，他对人情的体察与关怀，在家族的精神中永不泯灭。

< 参考文献 >

1、邹心平：《铸就天宝古村往昔繁华的关键力量是乡绅论》，《农业考古》2018 第 4 期

2、邹心平：《略论天宝古村特色文化》，《宜春学院学报》2018 年第 8 期

3、《江西宜丰县天宝乡辛会市墨庄刘氏简谱》，内部资料

4、龚浩晰：《浅议近代赣西北传统仕宦家族的成功转型——以宜丰墨庄刘氏为例》，《宜春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1 期

5、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6、龚浩晰：《天宝墨庄刘氏士绅文化的近代传承》，《地方文化研究》2018 年第 5 期

7、纯武：《刘己达其人其事》，《宜丰文史资料》第 3 辑，政协江西省宜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 年 8 月

8、刘己达：《实行舍去较多的月薪》，《生活》1927 年第 2 卷第 49 期

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年

10、饶伟新：《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学术月刊》2007 年第 5 期

11、傅伯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年

12、刘己达：《贫民生活》，《生活周刊》1933 年第 1 卷第 10 期

13、刘己达：《小贩生活》，《生活周刊》1933 第 1 卷第 7 期

14、刘己达：《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江西政治》1948 年第 1 卷第 1 期

15、《赣扶植自耕农选定两县试办》，《申报》（上海）1948 年 10 月 10 日

16、龚汝富，龚浩晰：《民国江西法律人成长的地域范本研究——以宜丰县为例》，《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17、刘敦仁：《怀才不遇的地政局长刘己达》，《天宝古村先贤小传读本》，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年 5 月

2022 年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逝世的 36 周年。当下女性的境遇处于进步与退步的微妙交织中：一方面，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各个领域绽放光彩；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新晋政权，塔利班禁止女童接受教育，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女性权益受到损害。事实是，尽管我们喊出了“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在世界各地，仍有许多女性在家庭中不被视为自由的个体，在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关系中不得不服从于他人的意志。在女性意识觉醒之路上，我们任重道远。《我的姐姐》是 2021 年一部贯彻性别思考的国产佳片，在以下文章中，臧元仪讲述了她对这部电影以及女性境遇的思考。

跳脱出男性凝视，就摆脱女性困境了吗？

—— 试析电影《我的姐姐》展现的当代女性境遇

作者 / 臧元仪
指导老师 / 李雪石
编辑 / 黄若瑶

摘要：

电影作为银幕艺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窗口。但电影自诞生之初就成为由男性主导的产业，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对象。随着女性意识的加强，电影中的女性跳脱出只与男性相关的功能价值或功能意义，演绎出更丰满而立体并具有自我意识的形象。《我的姐姐》便是由女导演执导，描写女性形象的女性电影。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讨该影片是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本文也将探讨电影所显示出的价值观与背后的社会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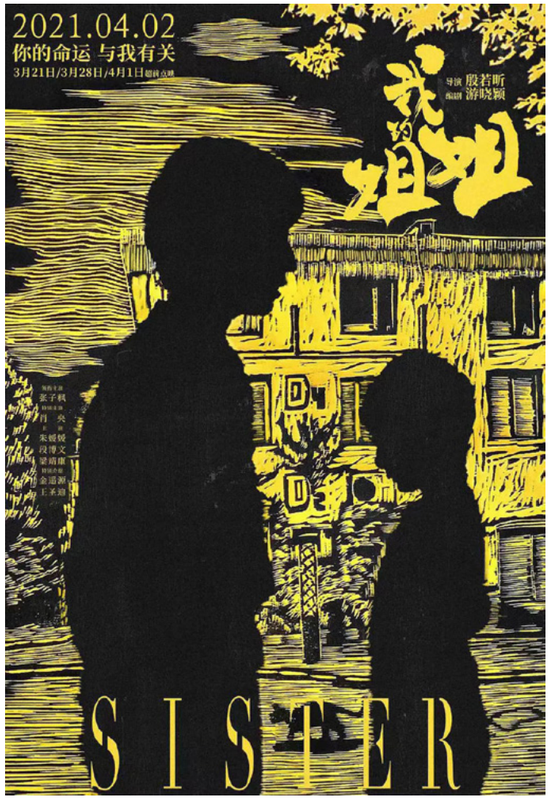
研究背景

2021 年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以女性为题材，反映女性的生存困境，带有女性电影的烙印，自上映之初便引发了众多讨论。电影呈现了两个代际女性所面临的不公平待遇，将女性与家庭这一话题带入公众视野。家庭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社会下的微观缩影，带有社会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要回答《我的姐姐》是否可以被称为是女性电影，首先需要定义女性电影。“女性电影”最早出现在 1970 年代，但一直没有统一的、绝对的定义。学者应宇力认为“其准确的含义应该是由女性执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的并且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录像和多媒体实验作品。（应宇力，2005）”学者戴锦华认同女性的介入必不可少，但导演本人的性别并不意味着社会立场；她认为，性别作为一种话语如何被传达是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戴锦华，1999）。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女性话语被传达出来，与女性现实生存具有联系并且由女性执导的电影，可被称为女性电影。

女性电影评论家劳拉穆尔维曾提出凝视理论（gaze），即男性在欲望动力下投向女性的欲望观看，这也是电影基本的叙述机制。如好莱坞电影塑造的大地母亲、巫女等经典形象，其实都是男性凝视下的模式化角色。电影《我的姐姐》中的姐姐跳脱出女性刻板印象，令人耳目一新。

当代中国电影塑造的女性形象曾被归结两种困境——“秦香莲境遇”与“花木兰境遇”（戴锦华，2000）。要么是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要么是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花木兰境遇”在当下电影中更为常见，女性似乎是在反抗“第二性别”，但又接受了男权社会构建的秩序，并将其内在化，给人一种社会地位超越的错觉。学者杨慧认为，在消费主义影响下，这类女性角色的塑造使女性观众获得心理宣泄，却满足于此，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男权意识。此外，女性身上的家庭身份比社会身份更为鲜明（孟丽花，2019）。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带有“母职”色彩，“母职是母亲在父权制家庭中权利与义务的能指，是父权制的重要保障。”而《我的姐姐》不避讳父权制结构社会，将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清晰展现，女性塑造也避开了上述两种境遇。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视角，运用社会学概念“凝视”、父权制与性别社会化，在分析角色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影片所反映的价值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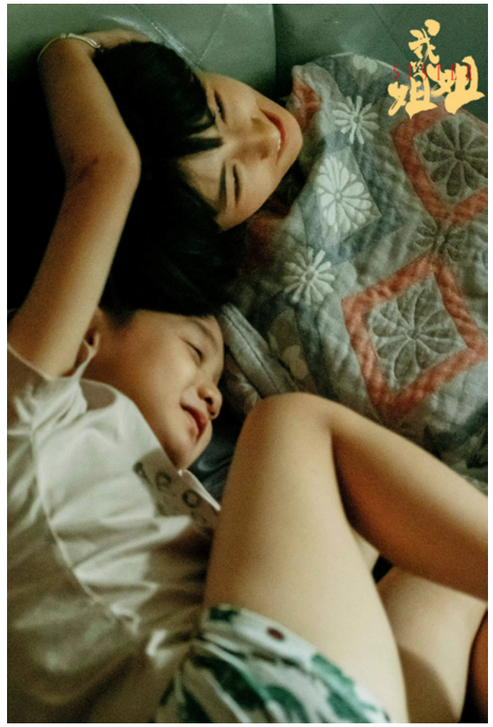


《我的姐姐》电影海报

何去何从：考研还是抚养弟弟？

电影将时空定位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讲述了父母双亡的姐姐安然在抚养弟弟与考研远走两个选项上的艰难抉择。安然诞生在未开放二胎的年代，父母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下为了生弟弟曾让她装作残疾人，并在她的大学志愿填报和工作选择上强加干预。安然决定考研去北京逃离父母的掌控。弟弟安子恒出生在姐姐上大学之后，二人少有接触，直到父母意外双亡，两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系。安然对于抚养弟弟显然十分抗拒，但周围亲戚一致认为这是她的责任，甚至因重男轻女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姑妈也如此认为。

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安然开始为弟弟寻找领养家庭。这期间，姐弟二人由对抗疏离到依赖亲密。几番波折后，安然找到了合适的领养家庭，也获得了姑妈的理解，但面对姐弟二人不可以再见面的合约，安然最终决定不要把弟弟给别人领养，同时也放弃了已经规划好的理想人生。



《我的姐姐》电影剧照

我的姐姐：独立女性的选择

首先，安然这一形象承载了鲜明的女性独立与自主意识，跳脱出男性凝视的定型化角色。

安然知道父母不重视女性受教育，不在乎女性家庭之外的身份，甚至将自己的大学志愿改为了护理系，于是自大学起就逃脱家庭，自己打工赚取学费生活费。大学毕业后没有经济支持，她选择先就业再考研，与男友约定一起前往北京。父母离世后安然继承了房产，舅舅想要从中分利，明示她可以依靠男朋友，安然立刻回答“他是他，我是我。”

安然因为护士的身份不受尊重，她立刻反问“护士怎么了”，这与温柔隐忍的“女性气质”大相径庭。同时，导演没有刻意抬升安然的社会地位，使得这一角色也跳脱出父权制下的“大女主”的嫌疑，即女性以男性的方式进入职场并大获全胜。这类女性形象虽有一时的社会地位的超越，最后都还是要回归到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秩序里（杨慧，2020）。

影片中安然不乏感情线，但并未将其列为重点。安然去面见男友的家人，得知他的家人预期是让她留在四川，为儿子生儿育女。她知晓男友背后的传统家庭使他没办法说出他们的共同考研去北京的计划，忍痛与他分手。安然不肯为了感情而让步，不再服务于与男性相关的功能或价值，这在以往的女性形象中很难见到。

其次，影片中“姑妈”形象突出了“母职”的不合理性。

姑妈和安然有着类似的遭遇。她是姐姐，带着弟弟长大；之后是妻子、母亲、姑妈，“她的自我价值被稀释到众多的关系网中”，她的存在完全服务于家庭的需要（孟丽花，2019）。她被迫将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却告诉安然“没你爸去上学，哪能供得起你呢”，这是在说服安然，也是自我说服，说服自己这种不公平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姑妈的言行道出了女性由来已久的生存困境，父权制结构下的女性意义被家庭捆绑，甚至受害者都已经将其视为社会规范。就如《七月与安生》中所说的“女孩儿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啊！就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于是姑妈和其他人一样站出来反对安然的“弃养”也就不足为奇。她以“慈爱”为名，将安然塑造成符合社会期待的“好女孩”，这是让安然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姑妈和周围的反对者都是原动力（agents）。姑侄二人对比鲜明，反应出代际之间女性意识的不同，也更加显示了性别监管（doing gender）的强大与冲破社会规范（norm）的不易。

长姐如母：自觉还是被动

电影通过几个情节体现出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思考。首先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电影中的孕妇冒着生命危险，在身体不适宜并且已育有两个女儿的情况下坚持要将孩子生下来，安然的质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观众内心的想法——“生儿子就那么好吗？”其次，影片关照到了几乎不被提起的话题——长姐如母的社会规范是对的吗？姑妈为弟弟乃至弟弟的家庭的牺牲以及安然的抚养难题都将这个问题一次次抛出水面。导演黄蜀芹认为，女性电影是另一扇窗，让人们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显然，《我的姐姐》带领人们看向了其中一个社会角落。

但电影并非毫无瑕疵。电影结局是安然面对领养协议割舍不下弟弟，并未签字。可以推测，安然放弃了自己原定的人生规划。这样的安排是 “大团圆”的结局，使人们的感情得到了满足。也有人为这个结局辩白：这是姐姐的自主意识做出的选择。但从影片中来看，姐弟之间的相处时间不够长，情感渲染不够，况且安然为了逃离“母职”甚至与相处五年的男友分手，却在这一时刻选择照顾弟弟，使电影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这的确是安然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害怕社会舆论做出的无奈之举，也是安然自主意识的体现，她愿意主动承担法律规定、亲情维系的抚养弟弟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联系在一起，对于观众来说，是再次陷入了女性困境。

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讨了电影《我的姐姐》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其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虽然在法律上早已承认了男女平权，女性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但在父权制社会的长期影响下，社会意识的滞后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女性受到经济与文化上的种种限制。《我的姐姐》的导演引领观众关怀女性命运，展露了较为明确的女性意识。电影试图进行女性话语自由表达的实践，但结局回归到父权制社会。这可能也是无奈妥协下的新的女性话语表达策略。（吴小丽，2013）女性电影应该如何发声，似乎还在探寻过程中。

< 参考文献 >

1. 戴锦华 (1999)，《犹在镜中》，北京市：知识出版社

2. 戴锦华 (2000)，《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 1978-1998》，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

3. 戴锦华 (2015)，《昨日之岛》，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李丹丹 (2018),《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叙事》,北京市：人民出版社5. 刘敬 (2017)，“女性电影”概念辨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78-82）

6. 孟丽花 (2019)，《新世纪影视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建构》，陕西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7. 吴小丽 (2013)，“21 世纪大陆女性电影创作及其女性意识表述”.《镜中红颜》，北京市：中国电影出版社 . 林少雄编 . 第 209 页

8. 杨慧 (2020)，《社会变迁与性别呈现：中国当代家庭伦理剧女性形象研究》，北京市：清华大学出版社

9. 应宇力 (2005)，《女性电影史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Thoughts about life
from President Xu

校长专栏

体　察　　思　悟

PRESIDENT'S COLUMN

冬天的白马湖

文 / 徐扬生

位于绍兴上虞的春晖中学，离我在绍兴城里的家不远，尤其是离我在上大学前下乡务农的村庄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但一直没有机会去过。前些年，自从当校长后，我发愿至少要走遍全国一百所中学，春晖中学恰恰是我走到的第九十九所中学，原本是可以更早一点来的，但想凑个“冬天”到这里，因为小时候读过夏丏尊先生的散文《白马湖之冬》，那时我就在心里想，一定要在冬天去一次白马湖，去领略那冬日料峭的寒风和澎湃的湖水。

到了春晖中学，来迎接我的是老校长李先生，他已经在这里当校长当了十九年了，谈起春晖的历史如数家珍，只是我心里有点按奈不住，便直接与他讲，我们能否先去看一看那著名的白马湖？原来白马湖就在校园的边上，准确地说，校园一边毗邻白马湖，一边依偎着象山，湖水在寒风中波光粼粼，树木的叶子都已经落完了，光秃秃的。这个湖看似不大，但其实不小，我原本想独自绕湖步行一周，如今看来是不可能的了。这个湖不像旅游景点的那些名胜古迹，反而像极了江南乡下常见的大的湖泊或池塘，没有亭台楼榭，没有环湖栈道，湖的对面有几幢新建的农民房，不土不洋，我用手机拍照都想了半天，不知道要不要把那些农民房照进去。沿着湖边走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湖这样天然朴素的状态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天然，也就少了游客，少了热闹和商业运作，这天然的湖，配上两边并不挺拔伟岸的朴素的山，素素静静，唇齿相依，而又静默无语。

过了一座小桥，湖畔边上有数间小屋，我首先走进的是李叔同先生的“晚晴山房”，据说是由丰子恺等弟子出钱为他建的。这间房比一般的平房地势要高一点，蛮有气势的，我很喜欢。我也喜欢“晚晴”两字，弘一法师有时自称“晚晴老人”，大概是因为他喜欢唐代李义山“人间重晚晴”的诗句吧。弘一法师的文章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耐心品味“晚晴”二字，是那么的平实舒畅，让人有平和宁静的感受，但同时又是那么的浪漫，会让人想到绚丽灿烂的夕阳和晚霞，这很像弘一法师一生的写照。

下一间去到的房子是丰子恺先生的屋舍，丰先生的艺术造就与春晖中学是分不开的，他在这里既教音乐、美术，也教英文，我发现他作曲的春晖校歌也很是好听，颇有“长亭外，古道边”那样一种韵味。他把他的小舍命名为“小杨柳屋”，门前的横匾是典型的丰子恺体，这是我打小就非常熟悉的字体，一看到就觉得特别亲切，看到丰先生的字，会感受到他的可爱，他的童心，他的笑容，这是看别人的字不会有的感觉。

我推开的第三间屋的主人是朱自清，说到朱自清，人们都会想到他的散文《背影》，此文正是在这个小平房里写就的，他的文章中常提到的“闰生”，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他写过一篇在当时很有名的散文《春晖的一月》，我在这里不妨引用几句“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你看，他写得多少自然，又多少不凡呀！

他的近邻是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在这里主要教英语，他坚持在所有课上都用全英文讲授，试想在一百年前如此荒僻的乡村中学居然用全英文授课，现在想来都好似天方夜谭。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文章写得极好，他的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春晖中学完成的，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曾说，“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底。”

再走过去，推开一间比前几间略大的平房，这间房的主人就是夏丐尊先生，夏先生给这间房题名“平屋”，古人讲“从高处站，就平处坐，往宽处行”，“平”是重要的，平的东西一般都比较大，

我喜欢“平屋”这个名字。夏先生的平屋明显比其他人要大一些，房间也多一些，也许是因为他家人口多，也许是因为他当时级别稍高一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夏先生喜欢请客喝酒，所以来往朋友很多，历史上曾经传说的“春晖酒聚”，就是以他为首的，五斤绍兴加饭酒作为会员入会的标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夏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的《爱的教育》就是在这里提出并开始身体力行的。《爱的教育》是我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探讨教育中最有道理的理论之一，我的理解是，真正的教育应该包含三条：其一、人，是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应该是人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专业的教育；其二、教育的内容应该“与时俱进”，这个“时”是指当时的世界，时间与空间都包含在内；其三、教育的素质由教育者的品格而定，而这种品格不用求全责备，要“兼容并蓄”。简言之，“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师者品格”。

我一直走到夏先生家的后轩，这是我最想看的地方，夏先生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完成的，他曾经写道“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我站在这间小屋里不想离开，因为只有这时，我才真正找到了“冬天的白马湖”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夏先生的文章，也因为当年我下乡时的小屋，与之是如此相仿，在冬天夜晚的寒风里，无论用浆糊和旧报纸把窗封得多么严严密密，但那个寒风，从愈是细小的缝里钻进，声音就愈是尖峭怪异……我就是在这样的一间小屋里读书，包括读夏先生的书。夏先生的平屋是这一排教员宿舍平房的终点了，我又往回走，沿着同一排屋上去，又去参观了一下“春社”，这是创办人陈春澜先生聚会的地方。校长经亨颐先生的“山边一楼”，是一座两层楼的西式楼房，进去看看里面的功能就像现时的“校董会办公室”加上“校长府邸”。之后我过桥回到校园里，看看他们当年上课的地方，那座楼叫“仰山楼”，保护得很好，一百年前，人们建一座乡村中学，校舍建得如此讲究，如此端庄典雅，即使在现在都是无法超越的。

当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有一个不太想得通的问题。为什么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贫穷、战乱的时代，会有这样一群人，跑到这么一个荒野偏僻的乡村，建了这么一所学校，而且还能弦歌不辍，延续至今？我多年前第一次去美国 New Haven 的耶鲁大学时，也有过同样的疑问。如果一定要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答的话，我想可能还是——理想。是的，这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想建一所理想的学校，培养有理想的人。

你去看看他们在仰山楼贴着的课程表，上午听朱自清讲散文，朱光潜教英文，张孟闻教自然，下午丰子恺教美术，而后是由蔡元培和叶圣陶主讲的讲座，再后面有《雷雨》的话剧和李叔同讲音乐……你去想一想，这不是一所理想的学校吗？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但那不是空想，他们是用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实施起来的，他们的教育思想领时代之先，别的学校的校训多用“厚德”、“笃学”，他们是“与时俱进”；别的学校是男女分校，他们是男女同校；别的学校用“老古董”做教材，他们是用“新青年”、“语丝”等刊物做课本。

一百年过去了，当人们路过白马湖，回忆当年的春晖中学，是什么东西让他们那么流连忘返？我想还是那个把“人”置于最高位置的教育，如果一种教育不把人性放在首位，只把谋生和应试作为目标，你让受教育者灌进许许多多的所谓知识，心里必然充满了谋生的焦虑，这样会让受教育者愈来愈远离心灵的幸福，与人性意义上的优秀和卓越愈走愈远，最后背道而驰！夕阳，照在冬天的白马湖上，波光闪闪，映着天上一片淡淡的绚丽斑斓的晚霞，像是在与我告别。我呢，目送着这渐渐远去的白马湖，像是看到了我所敬仰的那群有理想的先哲们的背影！一个远去的时代的背影！就像朱先生看到他那略显肥胖的父亲的背影一样，我的两眼不禁潮湿了起来……

书　院

成 长 、 温 暖 与 爱

growth of love
and care

HOME

我心光明

——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院士邓学勤先生

记者 / 蒋紫涵
编辑 / 李一扬
主编 / 吴一鸣

徐扬生校长为邓学勤先生颁授荣誉院士证书及纪念牌。陈鸣 / 摄

邓学勤 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荣誉院士
学勤书院董事会主席
正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邓学勤先生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陈鸣 / 摄

2021 年 12 月 16 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向邓学勤先生颁授荣誉院士衔，以表彰他在专业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对大学及社会的重要贡献。作为深圳第一代创业家，邓学勤先生十分热心公益与教育，2016 年，正中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同年，基金会捐资成立学勤书院。目前，正中公益慈善基金会对学勤书院的累计捐赠金额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各式各样的书院活动也在邓学勤先生的支持下蓬勃开展。

在学勤书院的高桌晚宴上，邓学勤先生提起了他的座右铭“我心光明”。对于好的教育与当今社会的大学，邓学勤先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要分享给同学们。

修己以善群，力行致良知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够好，那么，什么才是好的教育，大学要培养出怎样的人才才能让大家满意？”

邓学勤先生是学勤书院的捐赠者。在书院成立之初，他和多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着“什么才是好的教育”这个议题，反复讨论，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确定了将“修己以善群，力行致良知”作为院训。“修己以善群，力行致良知”，意在教导同学们通过日常的磨练和修行来不断提升自我修养，从而与他人共同构建更好的社会。邓学勤先生希望学勤书院的院训不仅能够教导港中大（深圳）的学生，他也期待着能够将这种教育理念传达给其他学校乃至全社会。

“中国小朋友的童年都是从西游记开始的，这个很重要。”纵观世界，许多文化是从信仰而非修己开始的，但是中国文化教我们从自我修行做起，这非常了不起。而修己的最终目的要落到“善群”两字。学校与社会都是群体的，个人与群体连接，于是个人与社会就能串联起来。这就是邓学勤先生认为的“修己以善群”。

“力行致良知”的关键在于通过身体力行把良知找出来，“这个良知是什么，这很复杂，但是简单地讲，一个人看见老人摔倒了，去把他扶起来，这就是基本的良知，是作为人的善良。现在社会看

邓学勤先生在 2016 年学勤书院高桌晚宴上做演讲。学勤学院 / 摄

不见这些了，大家看见摔倒的老人不敢去扶，我们的教育最起码应该把这些现象提出来。”除了最基本的传授知识，邓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的大学需要从“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角度出发，去持续探索好的教育。“学勤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学习素养要好，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对社会形成正面的影响。”

这些年，邓学勤先生用自己的行动一次次阐述着学勤书院的院训。2016 年，邓学勤先生一手创办了正中公益慈善基金会，基金会始终践行回馈社会、扶贫济困、关注教育事业的公益初心，积极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和捐赠行动，将善念和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提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邓学勤先生表示，个人价值不能违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价值也离不开个人价值。

“一个成功的企业用财富反馈社会，这也是良知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合理地消费、用企业赚的钱继续投资、成立慈善基金会，这些都是邓学勤先生心中回馈社会的方法。同时，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必要过多地表扬这件事，因为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辈子都是做企业，我把企业做好就是最大的个人价值，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企业做不好，欠钱不还、员工失业，这就是对社会不好。”

同时，邓学勤先生强调了我们的社会应当鼓励个人价值，“没有一个个卓越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成功是空洞的。”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包容、鼓励、适合天才发展的地方，让天才一个个涌现出来，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而作为个体，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

搭起大学与社会的桥梁

当前社会，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和学习主要在学校，邓学勤先生并不赞同这一点，“受教育是全生命周期的，我已经工作几十年了，每天的挑战还是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就教育的内容而言，邓学勤先生认为可以分成两大方面：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大学有很多课程教授学生专业知识，但是人文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关乎学生的“德”，却常常缺失。邓学勤先生表示，大学需要传授给同学们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广泛而宏伟的知识，以培育人文关怀。“大学差不多是价值观形成的最后阶段，因此，大学对学生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有好的引导，那就很可能一辈子都受益。”人文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们锻炼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合作能力等，这些都是走上工作岗位后重要的能力。虽然大学的教育把各种知识分开教给同学们，最终我们仍要回归一体，这就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一个人的胸襟和眼界。

“很多同学刚出校园是不适应的，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把专业知识和其他能力统一起来，完整做事，所以，我在想怎么把大学和社会的桥梁搭建好。”邓学勤先生心中有个构想：在学勤书院成立一个模拟公司，里面有不同的职位和部门，同学们先构想怎么让公司运作起来，再到正中集团参观，跟着自己模拟岗位的真正员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这对同学们融入社会很有帮助。”

许多同学询问过邓学勤先生如何在大学的时候做好未来的规划，邓学勤先生表示，这种规划很难做，因为工作后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大学生而言，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阅读习惯，锻炼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发展个人的心智和思维模式，都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学校的教育外，同学们也应当早早地主动学习自己将来工作需要的能力。”邓学勤先生在大学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用来学习学校的课程，另一半根据未来工作的需要来安排。

关于大学生创业的问题，他鼓励同学们有创业的念头和思维，但是真正去做需要深思熟虑。作为深圳第一代创业家，邓学勤先生认为，目前社会里创业的人往往是综合能力较强的，创业思维让大家重视自己需要的技能、发现自身的不足、观察他人的做法，最终全方位地提升自我。但是，是否真正要去创业与我们对失败的看法是紧密相关的，创业不是赌博，不能幻想创业一定是成功的。“许多人在创业的时候非常兴奋，他们已经不理性了，成功的幻觉让他们变得偏执。”创业失败可能耽误我们的时间、损失我们的钱财，但是不应该对我们的心智和心态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我们没必要赌博，创业的成败、失败的善后，这些都要深度思考，做好预案，做人也是这样。”

2021 年 5 月，邓学勤先生专门去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其中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生活的场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优秀的老师生活在同学们中间，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同学们的榜样，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同学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港中大（深圳）的书院也可以邀请更多的老师入住，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教导同学们。”邓学勤先生希望他心中理想的、充满人文氛围的书院，成为中国其他学校可以借鉴和创新之处。

作为一所结合东方与西方的学校，港中大（深圳）在邓学勤先生的心中是十分独特的。除了对书院制的赞许，邓学勤先生也表达了他对同学们的期许——希望港中大（深圳）的同学们能拥有国际化视野，从入学那天起就以国际化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每天的生活和学习。学勤书院也一直致力于连结我们的同学和广袤的世界，希望成为同学们“通往世界的窗”。

湖畔

关乎心灵　栖息烟霞

LAKESIDE

Time to read,
to ponder,
and to appreciate

124 书评

128 光影

142 诗歌

146 散文

151

从《死亡赋格》说开去：诗歌音乐性的一些想法

文 / 魏子贺

保罗·策兰：流浪，苦难和语言

保罗·策兰被认为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最重要、最深刻影响的德语诗人。

1920 年，策兰出生在东欧的泽诺维奇，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归属感都相对淡薄的地域，原属奥匈帝国，在帝国瓦解后归属罗马尼亚，今天却又归属于乌克兰，这也让策兰从一开始在精神层面上成为了一个没有故国和母语的流浪者。他是犹太人，这个身份让他经受了巨大的苦难。1942 年，策兰的父母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并相继死在那里。策兰在朋友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后被强征为苦力修筑公路。战后，他在罗马尼亚从事编辑工作并开始诗歌创作。1948 年，他定居巴黎，此后在西欧各国之间讲学和访问。这时，他远离故土，成为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流浪者。1970 年 4 月 20 日左右，策兰在巴黎塞纳河上从米拉波桥投河自尽；5 月 1 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 7 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便是策兰的一生。

策兰研究者费斯蒂纳尔教授提出一个说法，“现代主义始于波德莱尔，以策兰告终。由于策兰对语言的深度挖掘，对后现代主义诗歌有开创性作用。”所以，我想从策兰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开始我的分享，包括他用来称呼自己的名字和他写作所使用的语言。

策兰原名安切尔（Antschel），最开始以 Ancel 为笔名，后来又将其音节前后颠倒，以 Celan（策兰）作为他本人的笔名，这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笔名的选择，其实也是对他诗歌创作的一种隐喻。

策兰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德语诗人，但是他与德语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正如我们所知，策兰受纳粹德国的迫害而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是他又因为家庭（主要是母亲）的关系而采取德语作为自己的写作语言。这样，在他身上就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依赖德语来表达自己对苦难的反思；一方面，德语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又是造成这苦难的施暴者。他是在用征服者的、发号施令者的、杀人者的语言写作。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该片刻画了“二战”时德国人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

Todesfuge（死亡赋格）：生造词、音乐与死亡

对策兰这首著名的诗歌《死亡赋格》的各种解读已经是汗牛充栋，所以我今天只想和大家聊聊其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诗歌音乐性。

从它的标题开始，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图书馆在翻译这首诗的英文标题的时候，把它翻译成“death of fugue”，在“死亡”和“赋格”中间插进了一个连词。但其实这首诗标题的德语原文是“todesfuge”，是策兰将“todes”（死亡）和“fuge”（赋格）连在一起制造出的生造词。通过生造词的方式，他将音乐与死亡的同构体关系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就是说，在他眼中，音乐和死亡并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关系。死亡和音乐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死亡本身是一种乐器，构成一种乐曲的形式。我们会发现，策兰在诗歌中重复过很多遍“德国来的大师”，这其实是一种很明显的隐喻，因为在整个德国音乐乃至古典音乐史上被称作“大师”的就是巴赫。就像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这种“音乐和死亡的同构体关系”。“德国来的大师”既是巴赫，也是执行屠杀的刽子手。他既可以用文明人的方式欣赏艺术，举办舞会，也可以同时用最反文明、反艺术的方式去摧毁人性。

这首诗具有很多韵律上的音乐性，比如说扬抑抑格的使用，比如说“juden”（犹太人）和“ruden”（狼狗）的押韵。在诗中，代表暴力和命令的纳粹军官吹口哨唤来他的狼狗，也唤来他的犹太人，这种押韵突出了发号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的关系。我自己其实不懂德语，所以我更关注的是意象上通过对音乐的模仿形成的音乐性。其实音乐性并不一定局限于韵律，还有可能是在诗歌的空间和结构上对于音乐的一种复写。

赋格：主体与答题以及对位法

什么是赋格？

“赋格”（fugue）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fuga”，是一种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复调音乐，在它的呈示部当中，一般会有一个“主题”和围绕着“主题”发展的多个“答题”，这个“主题”会重复地出现，但是是在不同的调上，而这些“答题”则在主题周围形成“对位”。这种发展对位的谱曲方式被称为“对位法”。

有了对赋格的基本认识，我们回到诗歌本身。在诗歌的开头，策兰就提出诗歌的主题：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喝，我们喝。之后，清晨的黑牛奶作为主题贯穿全诗，以不同的“音高”不断重复地进入，创造出单调而紧迫的节奏感；主题的每一次重复进入都把之前的对位切断，不断地深化诗歌的节奏，直到最后紧缩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同时，主题和答题的应用更重要的作用是创造了诗歌的空间。在不同的音高下，主题和答题的每一次展开都会创造出空间，主题的每一次展开当中会创造出诗歌纵向的深度。不同的答题围绕着主题形成了对位，在横向上拓展诗歌的空间。

然后我们进入了赋格的另外一个部分：对位法。可以看到，策兰在这首诗歌当中采取了多组对位。比如说，所有的命令、所有的祈使句都来源于“在房子里”的德国军官，而接受命令的客体则是 “我们“（犹太人）和狼狗，这种对位突出了“命令 - 服从”的二元结构。再比如说，“空中 ”和“地下 ”的对位，我们“在地下劳作”，而我们“的坟墓在空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集中营中的焚尸炉把犹太人的尸体烧成灰抛洒在空中的景象。

在所有这些对位当中，我想要着重提及的是“金发的玛格丽特”和“灰发的苏拉米斯”的对位。“金发的玛格丽特（Margaret）”是歌德《浮士德》（Faust）悲剧第一部中的女主人公，也被称作甘泪卿（Gretchen）。她是世界文学中“德意志女性”的代表。“灰发苏拉米斯（Shulamith）”，在《圣经》和希伯莱歌曲中多次出现，是犹太女子的象征。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在原诗中，策兰用来形容苏拉米斯的灰发的词语不是“grau”（灰色），而是“aschen”（从 Asche 而来的形容词，指“灰”、“灰烬”）。这种词语的特殊使用很明显也指向焚尸炉上飘散的灰烬。这一组对位用两个代表各自民族的女性形象把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对应了起来，但并不是在把这两个民族对立起来，而是在试图表达一种融合。正像在赋格当中，答题之间的对位并不是对立的、抗争的关系一样，策兰在这里使用对位时也不是仅仅强调对抗性的。

下面这幅画是德国战后重要的先锋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的作品《玛格丽特》，这幅画是受策兰这首诗的启发而创作的。我们可以看到，基弗在这幅画当中采取了相当抽象的方式来表达这组对位。画中仿佛是在灰烬所构筑的一面墙上生长出了金黄的麦子，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在这组对位中发挥更深远作用的是作用的是“金发“和”灰发“，因为头发和头发之间具有本质的相似性，但是不同的头发颜色则是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同样是作为同胞的人类，仅仅是由于头发颜色的不同，就使得一方成为了杀人者，而一方成为了死者。

《玛格丽特》，基弗，1981 年。

文本之外：《密接和应》

在对这首诗的文本本身进行解读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些文本以外的东西。首先是策兰对待《死亡赋格》的态度。在1947 年《死亡赋格》发表之后，它迅速成为大屠杀幸存者文学乃至德国战后文学的一种象征，《死亡赋格》也为策兰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是策兰对自己的诗作被正典化其实是不满的，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之后就几乎停止了对《死亡赋格》的朗诵、再版与重印的活动，以此来抗议无孔不入的大众文化将自己的作品媚俗化的举动。此后，他写了对《死亡赋格》的所谓“翻案诗”《密接和应》。

“密接和应”（Stretto）是一个在赋格曲中会出现的音乐术语，意为一种“紧缩”，是对主题形式的模仿并与之紧密衔接，从而使答题在主题结束之前进入。正如它的音乐含义，《密接和应》这首诗是策兰对《死亡赋格》的一种紧缩。在《密接和应》当中，策兰抛弃了许多修饰类的词语，转而采取了许多生造词，比如说，“被分开来写（auseinandergeschrieben）”这个词就是策兰自造的连绵词。这种紧缩的趋向是一种试图去除语言之外的修饰，来让语言本身更加凸显的尝试。

诗歌音乐性的本质

很多时候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音乐和诗歌（或者说文学）是不是从最本质的特征上是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的呢？它们都是应用符号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只是符号的种类不同：音乐利用音符来作为基础的符号元素，而诗歌用文字作为表达含义的符号。音乐创作者和诗人都采取各种方式来对各自的符号进行排列和组合，使得这些个体的符号在成为整体的过程当中构建出更多更广泛的意义。进而我会有更多的想法，我会去思考“乐曲”的定义。狭义来看，乐曲是通过组合音符来创作的艺术形式，但广义来讲，只要是通过符号来创作的艺术或许都可以被看作一种“乐曲”。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就是：诗歌音乐性的本质是什么？是对音乐的模仿吗？还是对于诗歌创作者来说，“音乐性”可以不必要将自己置于模仿音乐的次要地位，而启发音乐创作者开拓新的连结符号的模式呢？ 诸如此类，亦希望能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和体悟，感谢聆听！

参考资料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黄灿然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的玫瑰》，北岛著，三联书店
《雪的款待：读策兰诗歌》，王家新
《飞絮游丝间的爱与哀：解读“你黄金般秀发的玛格丽特”》，姜林静

体裁不限，詩意除外

Lalumiere Nuages

陈彦升 摄影作品

#009
#012
产权分界牌
10kV学苑114线
天长中学
11401K

B.DUCK

POETRY
诗歌

唱离散的歌
——与 Nicole，浩轩，师兄于大理

诗 / 马车

我们攀上梯子，季风也刚刚赶到，
许多晦暗都放松下来，安静而宽敞。
从未见过的大熊星座，开始在你我周身
放亮。五月，总有一些手心穿过酒精来握住你。

总有一些暗语让你我都着迷。
受够了颠簸和半自动的玩笑，
前半夜，海浪拍打你额头的棕榈，
我敏感的喉咙拨弄着水草，石头都清凉了。

又听你说起月亮与命运之轮，
不是一些淋淋雨，就自然会懂得的气象预报，
冷和暖，从来都总是因人而异的。
但春风凶猛，有时竟将山顶的松木吹断，
弃绝的声音不被听见就不存在吗？
——你暗中掷出一把越古老就越锋利的柴刀。
在这里，每天都有人向我展示神迹，
那些我们不相信却又却不得不信的东西：

“我要像风一样自由”。
轩，你有意走歪的唱腔
不必苦笑。这风也吹得我心慌。
自由像风，自由的市场风风雨雨，
把人从大连吹到大理。倘若可以心换心，
为何这一代过敏的心思，终于是贱得供过于求了。
但有戒烟戒酒的勇气，“我们都是天使，

我们都是天使，在今夜的微风中”，腰乐队的歌，
我们都自问配得上这一句。还有师兄，
你割席比割肉更容易，你的家却比资本家更冷清，
更伪善的是我。人人都想赢，我只想输个彻底，
只怕是退行性，矫情如中产阶级。
必须给我留些冥币 nft，烧给仇家，解心里气，
幻想有一日，我能拥有你所说的气度，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下的是死生的大棋。然后，山神从山上下来，
像那天在滑坡的草甸，一想到有些人永远都不会
再见，
我也轻松，也忧郁。而夜就是这样的暗下来。
还有些空洞的把戏要留到最后了。友人，
快请你再多说一些动听的话语，但避免过分煽情，
比如说：
旅途愉快，别落下首饰与雨伞。比如想：
危险的高原会有你来打探。

POETRY
诗歌

“幻想”——逆境中的坚强

诗 / 谭钰霖

今日
阳光
似火焰般舞动的精灵
在镜子般闪亮的双眸上歌唱
是新婚曲，歌颂海岛
阳光的恋人
欲向我送来请柬
我炽热滚烫的心，融化在天边的一抹彩虹中
我明白我的归宿
那一片幻想与疯狂，徜徉
明亮，明亮，梦幻般的“灯光”
随之一道强烈的亮光，像一把闪亮的利剑，刺痛了内心
我似乎被传送到了往昔的时光，于是内心逐渐平静下来……

昔日
守望
逝去的痛苦时光，比黑夜还要漫长
我看到——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
在冰冷的心灵牢房里
穿透出内心的绝望
漆黑的到路旁，唯有寂寞无奈的影子
是心灵外层的水晶玻璃墙碎裂的声音，夹杂着尖叫的回音
融合交加， 响彻心房，创伤，无助的凝望，彷徨……
哦，仿佛在一条从往昔通向今日的路上
我何曾的勇气去打碎痛苦的门窗
有一刻，我从无边的黑暗中意识到，我必须改写命运
与不公和压迫的命运做永恒的抵抗
我回过神来，望着那扇“地狱之门”，驻留片刻
转过身，眺望着前方成功和幸福的大门金碧辉煌
我认识到五彩斑斓的命运正在向我绽放
欲往前之时，我又被转送回了现在的时光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的梦里，眼里，心里，我能感受到的一切
是海岛的亮丽和海洋的宽广，
是彩虹的夙望，是迷离的灯光，
是流光溢彩的前方……
投入到了阳光与“海岛”的婚礼之中，终生难忘
我享受着火热般的碰撞产生的激情
明亮，明亮，梦幻般的时光
坚强
极乐世界的芬芳……

在港中深的这四年

文 / 王伊依

王伊依 / 摄

学校依山而建

学校依山而建，人工建筑主要分布在上、下两个园区，环山马路将上下连起。在上下之间，还有中园。中园由一个圆湖和一片草谷组成。之所以叫它草谷，是因为它背靠神仙湖，一扇斜坡下面是绿草地，像一个大漏斗。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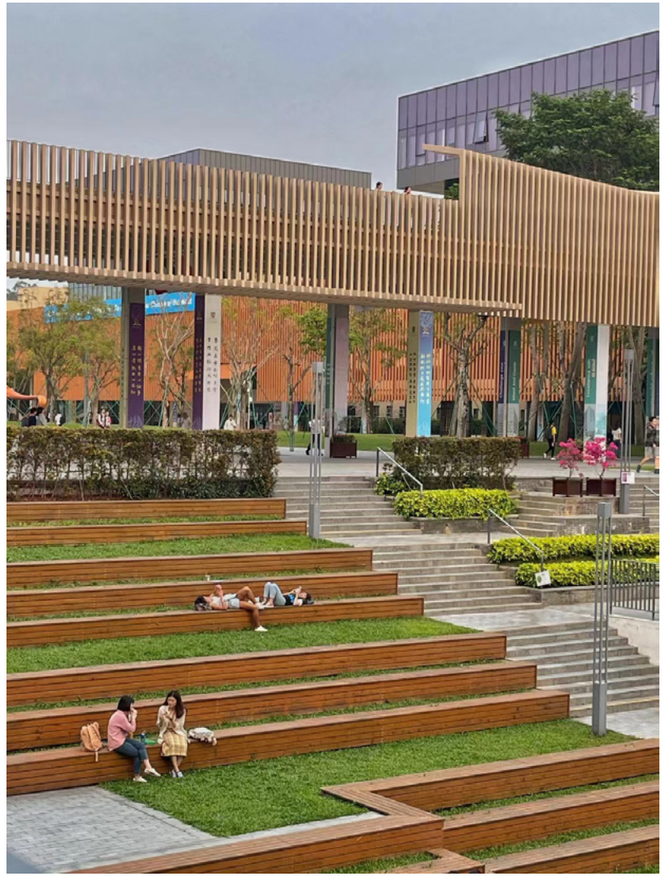
湖和草谷之间隔着一条柏油路。站在这条路正对草谷往前望，可以看到漏斗最低点是地势更低的几片运动场和沟渠。透过这个缺口，远处的高架桥和几栋不太远也不太高的校外建筑冒出了头。龙岗的建筑大多没有市区里的高。

草谷拥有非常神奇的缩小功能，那么大一个人在平地上走，一旦沿着草谷陡峭的台阶往下沉时，就会立刻等比例缩小，周围的绿色开始无限放大放大。于是刚刚还在课堂上高谈阔论的我，进入到草谷就仿佛变成了借东西的小人。和巨大的草谷比起来，我是那么一点点。

草谷左手边是一片小型木林，以及因为有树木遮挡住了中园的道路，于是只能看到仿佛漂浮在半空中的道路右侧的低山。到了晚上，山上树木似乎被天然地被修剪得很齐，它们组成了鸟巢形状的巨大圆弧形，加冕在这条路的头上。

这里简直就是动漫里的场景，它就像学校，这个现实世界的场所之中，凭空出现的一块魔法入口。这片草谷总让我觉得会蹦出宫崎骏笔下的那些主角，而斜草坪，也可能只有在动漫里面才能允许人躺在上面，不滚下去。远看草谷的斜坡很温和，只有站在边上，才会发觉它的陡峭。

港中深的很多地方都因它的地势而显得有些神奇。



王伊依 / 摄

比如说，我所住的书院在一个略高的小山坡上，它跟上园另外两个书院比起来视野更高，也离校巴站更远一点，也因此让我这个不愿走路的懒狗略有不满。

比如坐了四年的校巴，在盘山公路上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转。这条路看着不宽，两车并行时，我总是担心会撞上，不过倒也一次都没撞上。所以，视觉看来时常会骗人。

又比如上园地势最高的地方建着教职工宿舍，于是沿着那条路上去，你的眼睛就变成无人机的摄像头，然后看到了微缩式的学校。

下园的地势则显得平整了许多，不存在太多的因为天然地势高而需要走上去的地方。除了逸夫书院和礼文楼的两段死亡斜坡。前者我没有过多体会，但后者，在我大一大二时，这里总是举办每学期的大型考试。于是我对这个斜坡的记忆就是，我怀着考前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身体，缓缓奔赴那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型考场。

四年前的入学典礼就是在礼文楼举办。当时校长站在台上，他问台下，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学四年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努力是为了什么。

我曾非常迫切得想要寻找到这个答案。

那时我什么也不懂，但意气风发。我想连高考我都完美度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刚入学时我并不适应全英文授课。那时的我，似乎什么都想尝试，又什么都做不好，甚至连小组合作的形式，以及自己该具体付多少的责任出多少的力都懵懵懂懂。现在都会后悔在大一的一门课中我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 free rider。

一学期过后我的成绩很惨淡，是在上大学以前我不敢想象的成绩。但我波澜不惊地接受了，我似乎一直是个对挫折钝感的人。事实证明这项能力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时我不知道，它将陪伴我大学四年无数的“失败”。 在考完试感觉良好却仍过不了平均分时，在明明准备了很久却在 pre 过程中站在教室最前面还是忘词时，在 GRE 考了几次都到不了 325 时，在文书和作品集改了十几版后全部重写时，在大四申请季半个月内收三封拒信时。

我波澜不惊接受的还有自己好像没那么厉害的事实

除了成绩，我波澜不惊接受的还有自己好像没那么厉害的事实。但这种接受在大二上学期还是抵达了情绪最差的边缘。

对于一个习惯了好学生身份的人来说，成绩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但绩点又似乎带有惯性，不论怎么做就是被拽着起不来。更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只能在感兴趣的事上做得格外出色。高考出分后填志愿给了一周，前三天我已经下定决心去上海一个理工见长的大学读文科，后来秉承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想法，我选了金融，希望透过货币的流通观察人类社会运转。

作业里每一个符号都在叫嚣着我看不懂的语言。

那时身边的同学好像都跟上了学习的节奏，学长学姐多彩光鲜的事迹就在眼前，而我有一个差成绩，和一颗因为一贯成绩好还高傲的心。

我非常拉扯，我发觉自己还是渴望写东西，渴望每天泡在文科的书里。但我固执地不愿放弃金融。大一下学期结束我的成绩仍没太多起色。有天晚上我坐校巴回宿舍，我看向窗外，突然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无论我怎么使劲，我的嘴角都完全提不起来。

其实转折发生在哪我是不记得的。也许是我近乎顽固的、盲目的自信。现在的我格外佩服那时的我。因为当我回看，发觉自己还是努力地做了很多事。我开始初涉非虚构写作；发现自己擅长即兴演讲；去北京参加了两场活动营，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认知。我格外感谢学校的传讯公关处，正是通过这里我有了许多说话和写作的机会。

这是港中深一个重要的好处。它其实不设限。课堂内找不到的机会，课外也会有。但前提是一定得去尝试。

大二我上了一门基础金融课。某天晚上在复习 two fund theory 时，我突然决心与它和解，打不过就加入。神奇的是，当我决心同它和解后，它便自然地真的与我和解了。

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作了第一份和金融相关的实习。这份实习开启了我之后每个寒暑假都在类似金融机构实习的旅程。我在实习中找到了激发自己兴趣的细分领域和融合能力的方法，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一再得到了证明。我过于迫切的想要知道毕业之后该进入什么样的公司，该拥有什么样的技能，该怎样适应社会，成为一名有学识且有职业素养的预备打工人。

大三开始各方机会涌来，那年我写了一个文章，我写：

所有思考和努力都不会白费。前两年我经历了大量尝试和积累，在第三年我抓住的每一个机会，都像是之前的铺垫互相联结而成。它们构成了某种因果，开拓我想要的路。所以一切都刚刚好。

能切身悟到这些，或是因为我在大学懂得了你尽全力也不一定有想要的结果。上大学以后体会最多的便是，尽人事听天命。没有哪段路是完整平缓的。于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好一个关关难过关关过。黑暗中突然透出的那点儿光明，从将掉不掉的门牙外头挤着豁口进来。

李玮颀 / 摄

事实证明生活永远有你想不到的坎

事实证明生活永远有你想不到的坎。

站在柏油路上，正对着神仙湖，刚好是太阳落山的西边。这里的两山之间形成了一个缺口，所以经常能看到滚圆滚圆的太阳从缺口这里往下坠，就像是这座山天然设计好为了承接太阳，当太阳的温床。

大四的申请出奇不顺，回头看冥冥中又有定数。今年一月份我第三次考 GRE。那时我甚至还没投什么项目，身边已经有一批同学拿到了理想 offer。我原本决定申请传媒方向，整个申请季下来我写了五万字以上的文书素材。我自认经历独特，写了详细的转专业理由，不断问着自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但在漫长的等待后却连着收拒信。上面说：unfortunately,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转专业申请远比我想象中难，也比我想象中吊诡，给 offer 的甚至是一个比给拒信的排名高许多的学校。亲身经历过申请季的人或许都懂得那种等待中要死不死吊着一口气的状态。而当你看到邮箱里那个写着 There has been an update posted to your application status page 的邮件心跳加速点进去，开头看到了 thank you 时。

我仿佛又回到了大一时的自己。

李玮颀 / 摄

三月份某一天，我看着现有的 offer，凭空生出了勇气。我推翻了之前所有的资料，开始申请英语创意写作专业。一整个月我重新写文书、写作品集，然后在三月底完成后投出去。21 年十一二月刷托福时，我很多次坐在旧图三楼大窗户前的高脚凳上待到闭馆。备考期间一直没准备作文，但作文分数出乎意料地高，我开始投递写作专业的申请时发现它竟完美符合了专业对作文小分的要求。

我常觉得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如何让别人相信你？网上关于这个专业的信息很少，我亦无法评估自己成功的概率。可这一次我无比快乐。写文书时我想的不是招生官希望看到什么，这一段符不符合基本要求。我只是将心底想说的话全部写出来。So how to write something that appears it’s coming from you heart? That is, write from your heart.

很多言论会说三月下旬再投递太晚了。我不否定，这个时间节点确实属于晚的范畴，但这不妨碍你仍然努力。高一时我也考过倒数，在高三最后几次大考时我才终于排到了年级最前面。一月份我还在考 GRE，三月底我还在投申请，投的项目页面写着我们偏好母语者和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时区这个东西真的是相对而非绝对。

申请季于我而言最关键的转折是我想通的那一瞬间：如果我宣称自己热爱某样事情，那就请我不计回报地去做，如此我才有资格称自己真的热爱。同时我是幸运的，两位曾教过我的人文老师格外耐心地帮我写推荐信，我身边的人给了我很大支持。

我投了艺术和综合性两类院校，在投递后收到了几乎所有院校的 offer。生活总是这么奇怪。磕绊时事事磕绊，等真的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时，想要的却又来了。不破不立。

因为我说我喜欢写作啊。offer letter 上学校写：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我想是的，I should be。

四月十九日我回到了学校

四月十九日我回到了学校，距离上一次身在学校里已经过去整整三个月。在来学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以在校学生的身份进入。等到了学校这种不自然感就越发强烈了，每一个地方都在提醒我，接下来的许多事都将是最后一次。

当你长时间不进入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许久后再回去时，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时光穿梭。当我再进入大一经常上课的启动区的那两栋楼时，感觉什么都没过去，又感觉什么都过去了。因为记忆中的细节是伴随着对场景的熟悉度的，当许久不进入到那个场景时，就会丧失细节。而当再度回到那个场景时，细节就会复苏。我突然记起来，我们坐在台阶上听课，记起来那节课老师的口头禅，以及，他提问时一排一排递过去的话筒。

当我解脱了课业、升学压力，暂时性进入到全然望空的时段，我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仔细看掩盖在平时忙碌激烈竞争背后的学校。这些东西就像一层屏障，他们不是笼盖在学校上面，是笼盖在我的眼睛上，而当我暂时抛下他们时，眼睛上的这层薄膜也就去掉了。

于是我看到教学楼不再想到的是数不清的project，而是它有趣的空中人行道。看到图书馆，不再想到的是哪里还有空位，而是今年新开的蓝花楹和图书馆灰色外墙格外般配。

事实上，我依然没找到所谓的答案以及明确的道路。我仍不能肯定自己这样的专业选择在未来会起什么样的效果。

就像草谷，我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也不知道上面能不能躺人，但它就是这样存在着。

我喜欢这里，因为在我们学着怎样子变大，各种意义上的变大时，草谷让我缩小。

有这样的感悟，在我看来有些不易，尤其是在这所竞争激烈的校园里。港中深的许多特质被校内学生诟病，比如苛刻的给分制度，略显单一的升学条件。它不完美，但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我在这里得到的远比我失去的多。得出这样的感悟，我会归功于这个学校教授们的开明和博识，学生思想的多元，氛围的自由。

以及这个学校存在着的一些看起来不必要的细节。就像它的很多地方都有着一些不知道为何存在的设计。正是它们给了我最大的启发。

我仍记得大一下学期的中文课，那是疫情前的最后时代，每个中文课老师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在期末前上最后一节室外课。那次老师带着我们到了行政楼，坐在那片高高的草地上，听老师讲手中的讲义。其实老师具体讲了什么我也记得不十分明确，但那堂课总给我一种最初荷马在大树下唱诗，人们坐下，围着他，于是学校兴起了的故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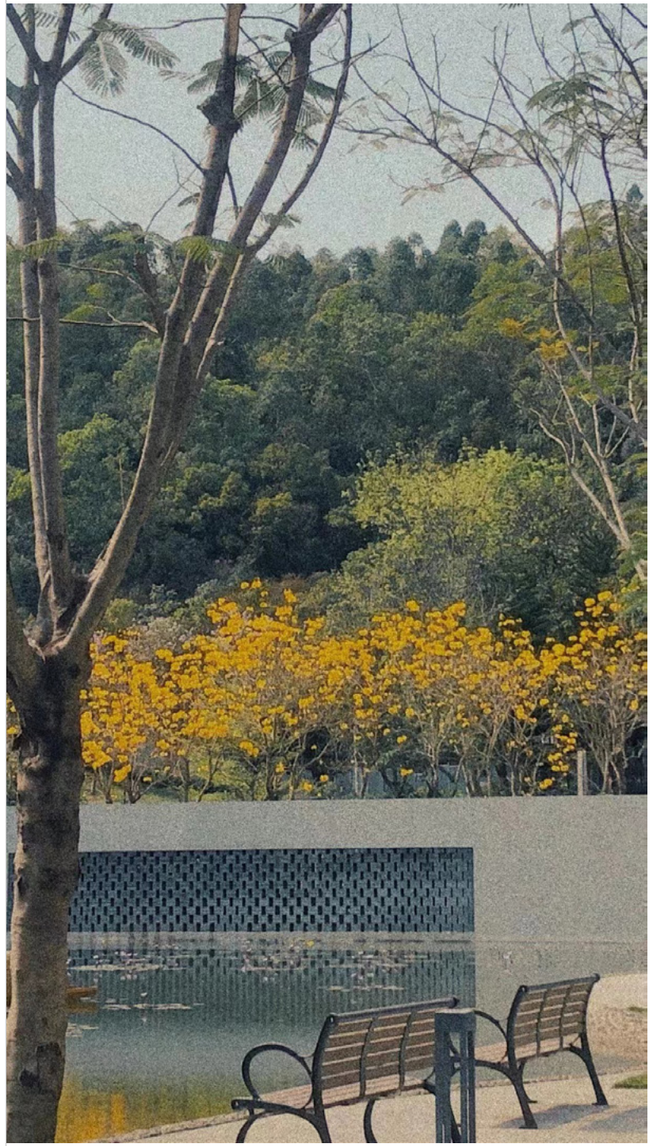
我去逛过很多次大学艺术中心的展览，听学校里各种讲座，见证身边的同学做各种新奇的尝试。他们才思敏捷、敢想敢做。

我在大二曾去过沙田本部一次，那是我在上完中文课，读过余光中的沙田往事之后。那里也是依山而建，它的魔幻感比龙岗更深。也正是在去了那次之后，我突然喜欢上龙岗的山岭。缺点是自然生物多，比如蚊子、青蛙、蜈蚣，还有广东常见的蟑螂，在草谷和神仙湖畔，亦或是晚上的上园行走时，总是能听到旁边草丛里，青蛙一股一股的叫声。

不过生活了四年，我也多少磨砺出了一些胆量。偶尔在雨后看到地上的像枯叶一样的小青蛙，敢凑前一看，还有上园的猫，都非常肆意大胆，走路一低头就会看见白圆圆的一团盘在地上，不留神就要踩上去。这些猫非常“敢”地躺在人们行走的台阶上。

我也想这么敢。

学校还有一些神秘的，不确定有多少人走过的路。我走过许多条，神仙湖上山的路，我住的书院背后的路。这就使得校园无形之中扩大了许多，也甚是满足了我对大学校园的想象。



王伊依 / 摄

进入大学前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定

进入大学前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定要去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可四年下来我对这里产生了浓浓的眷恋。或许因为古老的地方拥有了太多属于前人的故事，于是“我”在这其中更像是一个仰慕者和听故事的人。而这个校园，我看着一些建筑推翻，一些建起来，一些花栽上、又盛开。

大学四年于我而言比高中三年更快速。

就在我站在草谷边上的这一天，晚风还有些凉。有两个女生从我身后唱着周杰伦的七里香路过。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我想起来高三那年我坐在教室的窗边，看着外面盛开的漂亮的红色凤凰花，当时总说凤凰花开得好，考生一定会考得好。

在港中深这四年，学校教给我的最大的或许是，不用什么事都立刻给出答案，我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落后，允许自己去承担风险，负担成本。

于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四年前我迫切想要找到的答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努力是为了什么。

为了站在草谷旁边，什么也不做。

《神仙湖畔》杂志社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旅行者，
不要忘记旅途本身的意义

学生主编

蒲严博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千里快风送我过津关

魏禾
2021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It's not a bug. It's a feature.

董楚珮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每一寸人间都值得被书写

匡子娴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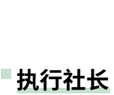
生活是一种飞行
四季是爱的衬景

高逸
2020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察世间真理，落妙笔生花

吴一鸣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和《神仙湖畔》杂志社优秀的老师
同学共事真是超级愉快的体验



杜可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公无渡河

栏目编辑

洪悦彰
2021 级 思廷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骑著白馬入地獄，
叼著紙菸上天堂

张诗悦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我要漂浮在狂风巨浪之上，我要淹死在里面，而不需要有人救我

罗雯静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永远做树上的 Elvira

周诗璟
2021 级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我对于生活有很多猜想与怀疑，并且愿意用行动一一证实证伪。思考才是我的存在方式。

李行健
2022 级 逸夫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黄若瑶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

叶润博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永忆长安月下影，曾教伊人绽芳华。
陌下柳痕红雨落，把酒仗剑走天涯。

张艺骅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花开如火，也如寂寞

季伊忱
2019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人生海海

温诗玥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敢于表达

李一扬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
不必成为别人

美编设计

李玮颀
2021 级 思廷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广告位招租

张育玮
2021 级 思廷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L'Étranger

裴嘉琨
2022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流程编辑

陈铖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余尔
2021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一星陨落，黯淡不了星空灿烂；
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柯承宇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我已经等不到夏天了。就算拨开人群，也想去见你。

唐如璟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在寂静处欢喜，在热闹处饱含理想，
在生命褪色的画卷里，重新涂抹上鲜艳的色彩

肖毅然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A merry heart goes all the way.

宣传部

刘广悦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崔畅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很高兴来到编辑部

张馨元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The more I know who I am and what I want, the less I let things upset myself.

周语璇
2020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today is a gift

高雅
2022 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一叶落知天下秋

学生记者

戴一诺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不知阡陌今何在，
只将东篱作桃源

黄舒旋
2019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Stay Gold

周凯怡
2021 级 学勤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To love one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romance

唐诗怡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

胡曦匀
2018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Wisdom, justice, courage, temperance

王菁
2021 级 学勤书院 理工学院

做温柔快乐的自由鸟

崔语桐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昭昭

刘浩然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希望你再勇敢些，不要过于畏惧失败。
失败是上天对你的厚爱，而非溺爱。

邓栩诺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开心、勇敢、坦然

文玄亦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愿勇敢选择的未来，
能在此刻被光芒照耀

臧元仪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天上风云真似梦，
人间岁月竟如流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书院 逸夫学院

Enjoy yourself and try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it better!

林嘉译
2020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这个家伙很懒……
想等你自己去了解

彭璇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Sometimes ques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nswers

丁凯伦
2022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所冀不过时间赦我麻木与失忆

王焰
2022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上升的生命拥有投入风暴的勇气

张然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沉稳而凶猛

唐可馨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王梓涵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热爱和众望终会殊途同归

2022 年冬季刊贡献者名单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流程编辑

陈　铖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余　尔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柯承宇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肖毅然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唐如璟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封面绘制

陈彦升　2020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美术编辑

李玮颀　2021 级 医学院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裴嘉琨　2022 级 数据科学专业 学勤书院
张育玮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李一扬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宣传策划

崔　畅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周语璇　2020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高　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张馨元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刘广悦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科学说]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周诗璟　2021 级 理工学院 逸夫书院

记者
周诗璟　2021 级 理工学院 逸夫书院

[演讲]

栏目主编
吴一鸣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撰稿人
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 201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主题报道]

栏目主编
魏　禾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蒲严博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栏目编辑
罗雯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洪悦彰　2021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张诗悦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学生记者
戴一诺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王　菁　2021 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季伊忱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胡曦匀　2018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刘玥彤　2020 级 经管学院思廷书院
王　焰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丁凯伦　2022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林嘉译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
柯舒麟　2022 级 医学院 逸夫书院
蔡子玥　2020 级 数据科学学院 祥波书院
贾楚煊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人物]

栏目主编
匡子娴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季伊忱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温诗玥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张艺骅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学生记者
周诗璟　2021 级 理工学院 逸夫书院
周凯怡　2021 级 医学院 学勤书院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唐诗怡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唐可馨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摄影
刘烨州 2022 级 医学院生物科学博士项目 祥波书院

[i 思享]

栏目主编
吴一鸣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栏目编辑
黄若瑶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
刘熙越　2020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臧元仪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校长专栏]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撰稿人
徐扬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书院]

栏目主编
吴一鸣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栏目编辑
李一扬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记者
蒋紫涵　2019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湖畔]

栏目主编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栏目编辑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供稿
谭钰霖
马　车　2017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魏子贺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王伊依　2018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